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老師：郭武平教授

俄中末代帝國政權崩潰原因之比較

A Comparison of the Collapse of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Empires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研究生：鄭皓元 撰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十一月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摘要

比較研究是當前區域研究的趨勢，本文探討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政權的崩潰原因，並針對崩潰原因做一比較。本文認為帝國崩潰是由於在位者人格特質和帝國面臨的內外因素所導致。關於人格特質，尼古拉二世和慈禧太后擁有不利於改革的性格，而光緒皇帝個性有助於改革但欠缺實權。內部因素方面，兩國政治都是中央集權官僚制，軍事實力皆不如西方國家，經濟都是以農業為主的大國，社會中上層階級擁有特權，廣大農民卻是貧窮且沒有地位。外部因素方面，俄羅斯和中國晚期都面臨多次的對外戰爭，每次戰爭皆是失敗結束，並且由於和外國接觸頻繁，兩國都自國外傳入新的思想，造成衝擊。而在內外因素的交互影響下，迫使帝國嘗試改革，但都未能成功，並造成人民群起反抗，導致帝國滅亡。

關鍵詞：俄羅斯帝國、中華帝國、政權崩潰、歷史比較分析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Comparative study is the current trend in regional studies. The article discusses and compares the reason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empires. It is believed that reason why the empires collapsed were due to the incumbents' personalities and the empir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bout the personalities, Nicholas II and Empress Dowager Cixi's characters were not conducted to reform. Emperor Guangxu's personality was conducted to reform, yet he lacked any real power to enact policies. As for the internal factors, these two empires were very similar in the fact that they had a centralized bureaucracy, their military strength was not up to par with Western countries, agriculture dominates the economy, and both had a wide gap between income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classes. For the external factors, both Russian and Chinese Empires had to deal with foreign wars in the late imperial era with devastating results as these wars were lost. In addition, the empires were frequently contacted by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which led to the exchange of new ideas and ideologies which further influenced the popul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these certa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eventually pushed the empires to attempt to reform, however these reforms were largely unsuccessful and caused their people to revolt eventually both empires collapsed.

Keywords: Russian Empire, Chinese Empire, collapse of the regim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alysis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4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9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1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13

第二章 俄羅斯和中華帝國當權者人格特質比較 17

第一節 尼古拉二世的人格特質 18

第二節 光緒皇帝的人格特質 24

第三節 慈禧太后 30

第四節 小結 35

第三章 俄羅斯和中華帝國的內部因素與改革成效之比較 39

第一節 政治軍事結構之比較 40

第二節 經濟社會結構之比較 52

第三節 改革成效之比較 65

第四節 小結 82

第四章 俄羅斯與中華帝國的外部因素與人民反抗之比較 85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節 對外戰爭之比較 86

第二節 思想衝擊之比較 103

第三節 人民反抗之比較 111

第四節 小結 120

第五章 結論 123

參考書目 133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表格目錄

表 3-1：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政治結構之比較.....45

表 3-2：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軍事結構之比較.....51

表 3-3：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經濟結構之比較.....57

表 3-4：中華帝國、日本、俄羅斯帝國和歐洲經濟指標比較 58

表 3-5：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社會結構之比較.....64

表 3-6：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改革成效之比較.....81

表 4-1：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對外戰爭之比較.....102

表 4-2：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思想衝擊之比較.....110

表 4-3：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人民反抗之比較.....119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圖片目錄

圖 1-1：帝國崩潰原因.....13

圖 2-1：沙皇尼古拉二世像.....19

圖 2-2：光緒皇帝像.....24

圖 2-3：慈禧太后像.....30

圖 3-1：亞歷山大二世像.....66

圖 3-2：威特像.....72

圖 3-3：斯托里賓像.....76

圖 3-4：康有為像.....78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人類的歷史，自從形成部落、族群以來，開始出現國家、聯邦等社會單位，而有些國家的強大，會進一步形成帝國。帝國擁有龐大的土地和人口，以及他國望其項背的國力，並且成為歷史研究的重要對象。而身處東亞的我們，身邊就曾經有兩個這樣的帝國，即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

俄羅斯和中國的歷史都淵遠流長，兩國都是由帝國轉型成今天的政治體制。俄羅斯帝國最後一個帝制王朝是羅曼諾夫王朝，於 1613 年至 1917 年之間統治著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也是俄國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在該帝制時期，俄國由東歐的一個小國，擴展成世界的強國霸權之一。而中華帝國的最後一個帝制王朝是滿清王朝，從 1644 年至 1912 年之間統治著中國，[1]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擴張領土、穩固國力，該時期也是清朝發展的高峰時期，其領土和藩屬國的涵蓋範圍，在乾隆時期達到中國歷史上最大面積，清朝成為當時東亞地區的共同霸主。

無疑地，俄羅斯和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都曾經強盛過，並且都維持了相當長的統治時間。然而，滿清王朝由於內憂外患，導致人民群起反抗，最終在 1912 年被革命黨發動的革命而滅亡，改而創立中華民國政府。羅曼諾夫王朝在不久的 1917 年，也被國內外情勢所逼，被迫將政權轉給當時的俄國臨時政府，結束了王朝統治。

俄羅斯帝國和大清帝國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擁有廣大的領土、眾多的人

[1] 清朝雖在 1636 正式定國號為大清並且稱帝，然而清軍是在 1644 年才入關並遷都於北京。

口、都曾經有強盛的國力、都曾統治國家達數百年之久[2]、在政權上都屬於君主專制國家、經濟上都是以農業作為主要經濟來源、兩國後期接皆飽受戰亂之苦……等等；而兩國在滅亡後竟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兩個帝國都是被所謂的民主團體推翻，成立臨時的民主政權，而在推翻帝制後不久，民主政權又快速地被共產政權所推翻，進而漸進恢復以往大國的地位。兩個鄰近的大國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不免讓人思考兩個帝國的滅亡是否有其共通點。

然而，無須諱言，俄羅斯帝國和大清帝國亦有其相異之處，例如，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的結構上，都可以看出兩國有著些許的差異；對外政策上，兩國的做法與思維亦不盡相同。所以，兩個末代帝國崩潰的原因，也不難想見可能有其差異性，而這也是研究者必須去思考的問題。

因此，基於以上因素，筆者希望能比較兩個帝國覆滅的原因，進而發現帝國滅亡的原因，期盼至少在研究過程中，能找到接近真實的歷史。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滅亡之原因，並進行比較分析。羅曼諾夫王朝和滿清王朝的滅亡，是否有主要的原因，或是許多原因都佔有一定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有一般研究者沒有提及的原因，對本研究而言皆是研究重心。了解真正的歷史是必要的，而要能清楚呈現歷史的真相，就必須得先釐清因果關係。

本研究期盼能找到接近真實的歷史。歷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真實性，然而「真實」總是複雜、矛盾的，並且常常讓人感到模糊不清。[3]俄羅斯和中國目前的社會及學術環境尚不夠開放，目前官方提供的歷史資料可能多有偏頗，進而還可能影響當前歷史研究者的判斷。因此有必要參考各方、各界的說法，才能讓歷史事件以接近真實的方式呈現。

---

[2] 羅曼諾夫王朝約統治俄羅斯 305 年，大清帝國約統治中國 269 年。

[3] 理查・馬里厄斯、梅爾文・佩吉 著，黃煜文 譯，**如何寫歷史**（台北：五南，2010 年），頁 15。

本研究之所以將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政權的崩潰做比較，是希望探討及解釋兩個帝國滅亡原因的相似處與相異處。而比較研究是目前學術研究常見且熱門的研究方式，將兩國做比較研究是當前區域研究的趨勢。俄羅斯和中國在歷史上的發展有許多相似之處，並且在國界上有大面積是相鄰的。然而，在歷史議題上，目前少有研究者將其做系統性比較，而將俄羅斯和中國的末代帝國政權做比較者更是少之又少，未免可惜。因此本研究嘗試將兩國做比較研究，以開拓此歷史議題未來之發展。

簡而言之，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兩大方向，分別為：

俄羅斯的帝國政權為什麼會崩潰？中國的帝國政權為什麼會崩潰？

俄羅斯和中國的帝國政權崩潰上的相似處及相異處為何？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為了配合本文之研究，筆者依主題分類文獻，分別為：「俄羅斯帝國政權崩潰原因之研究」、「中華帝國政權崩潰原因之研究」和「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政權崩潰原因之比較」三大類別，每個類別依研究需要，盡可能參考不同的立場與觀點。

一、俄羅斯帝國政權崩潰原因之研究

《羅曼諾夫王朝覆滅》(*The Fall of the Romanovs*)[4] 的作者是由馬克．斯坦伯格 (Mark D. Steinberg) 和弗拉基米爾．赫魯斯塔廖夫 (Vladimir M. Khrustalev) 共同完成的歷史著作。本書以羅曼諾夫王朝最後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人格特質、內心層面和周邊的重要人士為軸心，探討羅曼諾夫王朝面臨革命浪潮來臨時，在位者的心態與作為對於事件的影響。作者大量蒐集並引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其妻子、軍官或其他重要人士的書信，以及沙皇自己的日記、對民眾演講時的講稿等第一手的資料，進而研究尼古拉二世的人格特質，以及對革命和革命後的種種影響。作者力圖屏除感性的方式來敘述事件，盡可能依照獲得的史料來解讀當時的歷史，然而事實上，史料容易因人而異，不同的人可能會對相同史料有不同解讀，是本書較為難以克服之處，但這點並不會掩蓋本書的重要價值。其中書中的第一章〈革命〉，作者除了解釋尼古拉二世面臨革命來臨時所做出的行為外，也附上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對於本研究而言是非常難得且重要的資訊。

賀允宜是專精於俄羅斯史的台灣學者，其所著的《俄國史》[5]堪稱是中文閱讀者要了解俄羅斯歷史的重要書籍。作者自俄羅斯歷史的緣起、基輔公國開始，介紹到羅曼諾夫王朝滅亡與尼古拉家族被殺害。對於俄羅斯史有興趣的研究者而言，是本偉大的教科書。加上作者本身也是以中文為母語的學者，在敘述俄羅斯

[4] Mark D. Steinberg & Vladimir M. Khrustalev, *The Fall of the Romanovs: Political Dreams and Personal Struggles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United St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5] 賀允宜，**俄國史**（台北：三民書局，2004 年）。

的歷史事件時，讀者可以清楚理解事件的本質，並且思考俄羅斯的歷史、文化和中華歷史、文化之間的異同。雖然本書敘述的時間相當長遠，然而內容上卻保有著豐富且重要的細節，並且為了使讀者易於理解，在需要之處作者也常使用列點、圖表、附上原文與翻譯等方式來補充，可說是在台灣學術環境中，研究俄羅斯歷史的難得著作。筆者在本論文的觀點，部分受到這本書的影響。

由大衛．麥肯齊 (David Mackenzie) 和麥克爾．科倫 (Michael W. Curran) 所合寫的《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6](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也是一本完整的俄羅斯史。作者自俄羅斯民族的起源——基輔羅斯的興起開始敘述，一直敘述到西元 1991 至 1992 年蘇聯瓦解。其時間點比賀允宜的《俄羅斯史》更長，對於歷史事件的敘述也是鉅細靡遺。本書的特點在於，除了對於歷史有細部的著墨外，部分章節後面還有作者提出的「議題」供讀者思考，例如關於俄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作者就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沙皇主義崩潰？」這樣的議題，並且分別簡單敘述了「蘇聯的立場」、「美國的悲觀主義者」和「西方學者的樂觀主義者」三方觀點，最後有作者試圖整理出的結論。本書可以說是研究俄羅斯歷史的優良教科書，參考麥肯齊和科倫的共同著作，對本研究的研究主題相當有幫助。

二、中華帝國政權崩潰原因之研究

在中華帝國的近代歷史研究中，筆者首推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7]。郭廷以可說是中國近代史的開拓者，此本著作為其晚年的巨作，影響台灣學術界深遠。本書的前半部與本研究的時間點相近，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敘述中國滿清王朝遇上西方勢力的開始，帶來的衝擊與動亂，最後走向衰亡的過程；本書後半部則講述辛亥革命成功後，之後面臨到的袁世凱復闢、軍閥割據、二次革命、對

[6] 大衛．麥肯齊、麥克爾．科倫 著，蔡百銓 譯，**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 年）。筆者另外也有參考原文：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United States: Wadsworth, 1993).

[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 年）。

日抗戰、中共崛起、中國大陸政權改變等重大事件。將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到二十世紀中葉約百年的歷史，完整且細膩的呈現在讀者面前，對於本研究關於中華帝國的部分也影響甚大。

另外，著名的歷史學者茅海建所著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8]，亦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相當重要的著作，並開啟了研究者對於中國近代歷史的新觀點。作者對於十九世紀中葉發生的中國和英國的鴉片戰爭有相當深度的研究，並且認為，可以將鴉片戰爭視為是滿清王朝政權的崩潰前兆的起點。本書探討中國戰敗的原因，並提供大量戰事史料，如滿清當時軍力的調查，戰爭詳細的過程，以及戰敗後雙邊簽訂合約的過程與分析。作者也力圖用當時的道德觀念、思維方式及行為模式理解歷史事件，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帶來很大的衝擊。不過，對於滿清王朝政權崩潰的起點，學界有多種說法，茅海建認為中英鴉片戰爭為起始點，僅是其中一種，究竟是否較為接近歷史事實，還需要時間與學界的考證。

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9]，同樣也是中國近代史相當值得參考的著作。然而與郭廷以所寫的《近代中國史綱》不同，郭氏所寫的中國近代史，是按照時間順序，將史料判斷真偽後分析整理而成，將褒貶的問題留給讀者判斷，可說是傳統史學普遍的撰寫方式；唐氏撰寫的風格則以個別歷史事件為主軸，再加以論述自己的見解，或與其他相似歷史事件加以比較。唐德剛的著作有助於給予讀者直接的思考方式，但也可能在無意間流於自己的主觀意識加諸在讀者身上，因此較適合已對中國近代歷史有一定背景知識的讀者參考。不過這並不表示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只是一家之言，相反的，唐氏在論述時也參考許多各家之言，力求其論述較為正確。惟筆者才疏學淺，在研究時不敢大意，為求研究的客觀性，必須多參考其他史料與其他史學家的言論。

[8]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年）。
[9]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台北：遠流，1998 年）。

三、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政權崩潰原因之比較

《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10](*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是一部相當宏觀的史學相關著作，作者巴頓．摩爾 (Barrington Moore) 對於近代國際社會各國的政治發展道路，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建構出三條主要的脈絡，該書主要分別為英、美、法的西方民主道路；德、日、義的法西斯主義道路；和俄、中的社會主義道路。[11]摩爾認為這三條道路有著因果聯繫，並強調農民的影響力與農民和貴族之間的連繫。在中國的發展歷史上，作者特別將〈中華帝國的衰亡和中國共產主義的勃興〉特成一章，細膩分析中國當時的政經社會因素，並廣泛以其他國家做比較。其中由於俄國當環境、背景和中國有諸多的相似因素，因此作者在本章也有許多中國和俄國農民與革命的比較。摩爾的創見，也使本書甫出版便風靡歐美的文化思想界，被譽為是二十世紀社會科學的三大名著之一。

《國家與社會革命》[12](*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是作者斯科克波 (Theda Skocpol) 將其博士論文改編而成的專書，本書探討革命的發生原因，並將法國的波旁王朝、俄國的羅曼諾夫王朝和中國的滿清王朝所面臨到的革命衝擊，分別敘述並針對這三國發生革命的前因後果進行比較。作者本身是社會學學者，亦是位歷史社會學家。[13]作者透過歷史社會學的觀點，提出此三國發生的革命皆屬於「社會革命」(Social Revolution)，並且都發生在以農業為主的帝國，而革命的結果都是改變了該國原本的體制與社會結構，成為中央集權、官僚體制、大眾參與的民族國家。該書不但是作者的成名之作，也是歷史社會學難得的一部經典。

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J. Hobsbawm) 是學術界裡享譽國際的歷史學者，對於世界的歷史事件和歷史問題，他都有自己獨到、宏觀的見解。作者在思考問題

---

[10] 摩爾 著，拓夫 譯，**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台北：桂冠，1991 年)。
[11] 同前註，頁 ix-xvi。
[12] 斯科克波 著，劉北成 譯，**國家與社會革命**(台北：桂冠，1998 年)。筆者另有參考原文：Theda Skocpol, *State &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 歷史社會學一般被認為是社會學的分支之一。

時，會跨越國界，針對世界的趨勢或共同現象來探討歷史事件，這點明顯與多數的歷史研究者不同。霍布斯邦的著作頗多，其中《帝國的年代：一八七五—一九一四》[14](*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一書中，探討了許多與本研究相近時期的歷史問題，有助於本研究的深化與廣化。例如書中的其中一章〈走向革命〉，作者將十九世紀的革命作分類及解釋，將當時的革命主要分成「逐漸破壞經濟、社會結構」和「摧毀其固有政權和政治制度」兩大類，並且將俄羅斯、中國、波斯、土耳其的革命全都一併探討，有助於讓讀者比較當代各國革命爆發的異同。[15]霍布斯邦的這些著作，其視野之廣、思慮之深，為筆者所不能及。然而，在探討歷史的問題中，單獨敘述一個國家固然有其意義，將所有相關的世界各國全部探討也會出現不同的意涵，而挑選特定的國家來做比較，自然會出現有別與前二者的視野。單獨探討一個國家，恐怕容易使歷史事件流於國別史，僅有一家之言；而將所有相關國家全部分析，除了需要有相當程度的知識背景外，要避免探討的問題失焦及保有可比性，是相當困難的。因此，筆者在學識不夠廣泛的情況，以及希望讓歷史問題可以清楚呈現，還是將採用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兩個民族國家來探討歷史事件。但不可否認，霍布斯邦宏觀的歷史研究，是本研究相當值得參考的觀點。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4] 艾瑞克・霍布斯邦 著，賈士蘅 譯，**帝國的年代：1875-1914**（台北：麥田出版，1997 年）。
[15] 同前註，頁 403-435。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

本研究將採用「歷史研究途徑」，歷史研究途徑係指，一個問題的發生以及演變，是具有長時間研究的性質，藉分析該問題有關的既存資料，可歸納出一種解釋與預測的理論。此種研究途徑，主要是希望從錯縱複雜的歷史事件中，發現其因果關係，以了解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發展。[16]透過此研究途徑，將有助於本研究分析羅曼諾夫王朝與滿清王朝政權崩潰的原因，並可能歸納出一種解釋。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所謂文獻分析法，係指用有系統性和客觀性的方式去界定、評鑑、證明的方法，來確定過去事件的確實性，或是確定結論。其方法的主要目的，在於了解過去、觀察現在、預測將來。該方法可以幫助研究者釐清研究的背景事實、理論發展和研究方向。使用文獻分析法前必須先對文獻進行檢視，確定資料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完成該階段後始進行分析。[17]

本論文選擇此研究方法之目的，是希望在分析和主體相關的原始資料和間接資料後，可以歸納、整理，並從中尋求可以解答問題的答案，並能增加論點的正確性。本研究在使用該方法上，主要蒐集國內外有關歷史學、史書，以及和本研究相關的專書、期刊論文和學術論文等資料。

---

[16] Alan C. Isaak 著，朱堅章 主譯，**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台北：幼獅文化，1990 年），頁 36。

[17] 使用文獻分析法比須注重文獻的可靠性與可信度，不同類型的文獻，會對研究產生不同的幫助或限制，例如官方資料多半是從正面、應然的角度去解釋事實或數據，但也可能會過於樂觀或誇大應然面的功效。請參考：鍾倫納，**應用社會科學研究法**（香港：商務，1992 年）。

（二）歷史比較分析法

所謂的歷史比較分析法，通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歷史社會進行準確地和系統性的相互對比，其目的在於將它們的相同處和相異處進行檢視和考察，這種研究方法目前普遍和廣泛地得到了歷史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的認可。[18]根據斯科克波（Skocpol）的定義，這種方法「通常泛指任何對兩個或更多的民族國家、制度系統或文明的歷史軌跡相提並論的研究。……特別適用於對只有少數實例的宏觀歷史現象進行解釋。……是一種多變項分析方法，當變項太多而實例不多時，人們就可以使用它」[19]。其特色在於，它比其他方法都能更好的去解釋歷史變遷的多樣性和矛盾性，並試圖從歷史環境和條件中尋求解釋或歸納，透過比較也可將歷史發展做出更精確的證明。歷史比較必須注意的，是需要對時間和空間做限制，應該要是對同一時代的不同社會進行比較，[20]並且一般以民族國家為單位，或至少必須是一個有共同特性的地區為單位，否則很可能會失去比較的意義。另外，歷史比較分析法也重視全面、整體性的論述，因此得盡可能考慮到所有經濟、社會、文化、法律和政治等因素。[21]

本論文選用此研究方法之目的，在於筆者認為若要探究俄羅斯和中華帝國政權覆滅之原因與比較，使用比較分析法是較為妥當且方便的方法。本研究在使用此方法上，除了運用大量的俄羅斯、中國近代史的史料外，亦會參考社會學和政治學對於當代兩國歷史的觀點，使歷史事件有充分且整體的敘述。

---

[18] 哈特穆特．凱博 著，趙進中 譯，**歷史比較研究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5。
[19] 斯科克波，**國家與社會革命**，頁 40-41。
[20] 哈特穆特．凱博，前揭書，頁 7。
[21] 同前註，頁 86。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將在時間上、空間上進行規範。

在時間的範圍上，本研究限定於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初。其原因在於，19 世紀下半葉，是俄羅斯皇帝尼古拉一世在位之時，並且是克里米亞戰爭爆發時間，一般被認為是俄羅斯帝制崩潰之最先徵兆；至於中國方面，19 世紀中葉乃是鴉片戰爭爆發之時，而 19 世紀下半葉亦為中國太平天國興起之時，也是清朝同治皇帝即位、慈禧太后掌權之時，被認為是中國帝制政權不穩的關鍵點。 而將時間斷在 20 世紀初，則是當時俄羅斯和中國的帝國政權均已瓦解。在空間的範圍上，本研究限定於俄羅斯和中國兩個國家，並排除第三國加入研究。疆域上，俄國以當時俄羅斯所被公認的疆界為主，中國以當時滿清政府所被公認的疆界為主。本研究因為研究方向，並不希望有其他國家進入研究範圍。

另外，由於本研究限定於與帝國崩潰有關之重要議題，因此在討論內部與外部因素之部分，若與帝國崩潰無重大相關性的議題，亦不在本研究的範圍內。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由於經費、時間有限，本研究在資料蒐集上，無法特別前往俄羅斯和中國大陸當地，尋找歷史檔案檢閱。另外，也無法前往該國訪問當地居民、學者與歷史相關研究者，即田野調查和深入訪談無法適用於本研究。然而，由於科技之進步，加上筆者對中文、英文和俄文之學習程度，尚可運用此三種語言，因此除了盡量找尋相關文獻的譯本外，也會透過蒐集此三種語言的文獻與史料，來彌補無法前往當地之遺憾。筆者透過中央研究院、國家圖書館和國內各大專院校的近代史研究所等機構，以及利用網路媒介，做為資料蒐集的重要管道。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此外，本研究為了將議題深化，因此放棄其他有類似歷史情況的國家，而只探討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的政權崩潰。這可能導致由於樣本數之不足，而無法保證所有帝制政權的滅亡，都存有共同之原因。因此此研究還有待時間考驗，其他相似古老帝國的崩潰原因，亦有待其他相關研究者做討論。

其三，本研究由於偏向宏觀研究，為避免研究重點失焦，將歷史事件只做重點敘述，無法鉅細靡遺交代完整的歷史事件。然而，把所有事件的事實都放進論文是沒有必要的，加上由於本研究相關的歷史，不論是中文或外文文獻，都不乏知名且負責任的研究者之研究。因此，本研究所敘述之歷史內容，若有不夠詳細或待補強之處，可參考筆者註釋中推薦的文獻，或是針對本文議題閱讀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歷史的相關著作。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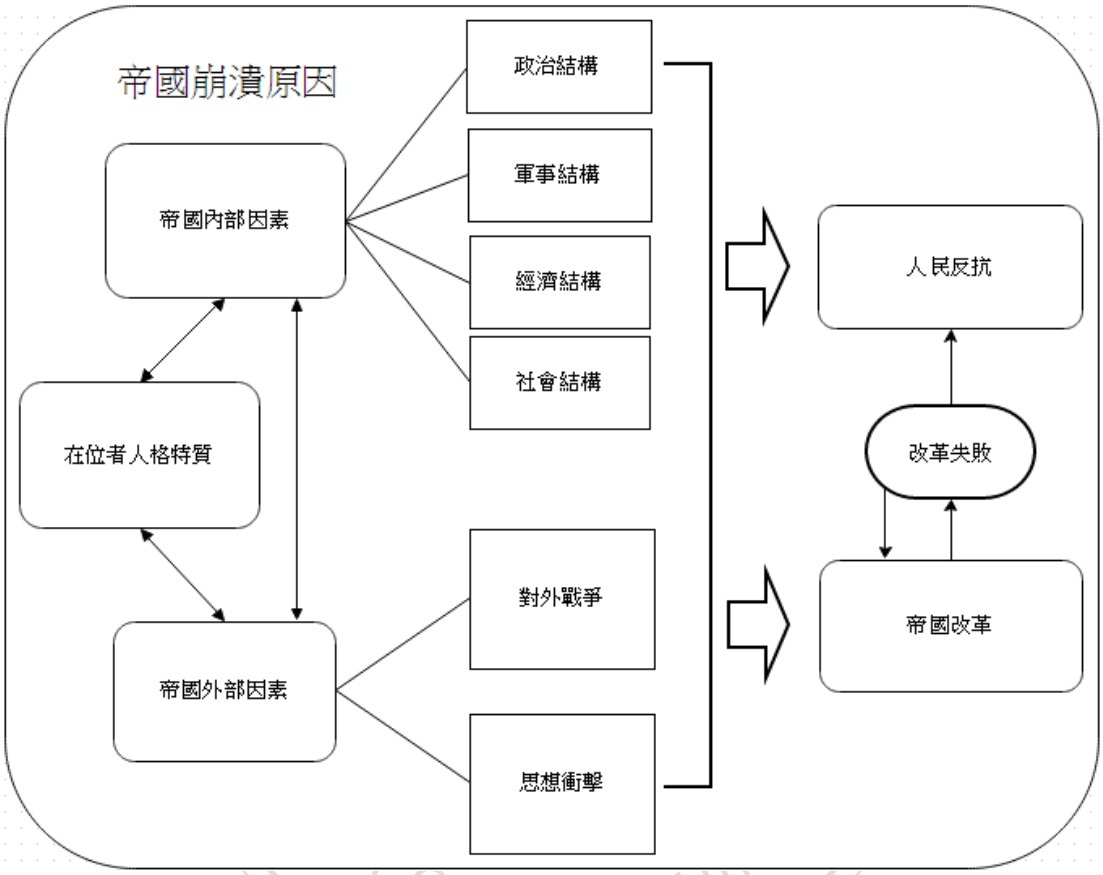

圖 1-1：帝國崩潰原因

（圖片來源：筆者自製）

從圖 1-1 可以得知，帝國在位者的人格特質，是和帝國的內、外因素三者相互影響的。其中內部因素包含政治結構、軍事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四個面向，而外部因素則有對外戰爭和思想衝擊兩大要素。在此三者互相影響下，導致內部因素無法適應外來因素的變化，造成帝國必須改革以試圖改變內部因素，使內部因素能夠適應外部因素的衝擊。而在這個時候，除了帝國會進行改革之外，

帝國的人民很可能也會因為內部因素的混亂而起身反抗帝國。此外，帝國在改革時，基本上都是失敗的，失敗的改革可能會讓帝國重新思考改革方向，也可能會導致帝國人民對國家失去信心，導致人民反抗的機會增加。

二、章節安排

本研究之章節架構將分為五大章，分別為：緒論、帝俄與滿清政權當權者人格特質比較、帝俄與滿清的內部因素與改革成效之比較、帝俄與滿清的外部因素與人民反抗比較，最後一章為結論。每章依需要及目的另外再分數小節，每章節撰寫原因分述如下：

（一）緒論

本章為本論文之前言，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以及章節安排等，以方便讀者清楚本研究之架構，並能了解本研究之價值與目的。

（二）俄羅斯和中華帝國當權者人格特質比較

本章首先探討當權者人格特質對於國家所帶來的影響。本文認為俄羅斯帝國的當權者尼古拉二世擁有極大的權力，因此在俄羅斯帝國方面，僅探討尼古拉二世的人格特質；[22]然而在中華帝國方面，由於慈禧太后在滿清後期實掌大部分的權力，光緒皇帝則是名義上的君主，但依然有部分權力，是以在中華帝國方面，將分別探討此二人的人格特質。滿清末代皇帝宣統，則因時間過短而不進行探討與比較，以聚焦本研究之重心。[23]

---

[22] 雖然皇后亞歷山德拉和拉斯普廷在俄羅斯帝國崩潰前夕有掌握國家大權，然而他們的權力依然是經由尼古拉二世所同意的，因此尼古拉二世還是掌握權力重心的人，和光緒皇帝的處境並不一樣。

[23] 光緒皇帝之前的同治皇帝，雖然也屬於清朝後期的皇帝，然而由於同治皇帝亦是受到慈禧太后的控制，並且 6 歲登基、18 歲名義上親政、19 歲即駕崩，因此對於中華帝國政局影響有限，故不在本研究的重心。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三）俄羅斯和中華帝國的內部因素與改革成效之比較

本章接著針對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自身的內部因素進行比較，以及探討兩國在面對內憂外患下所做的改革。內部因素方面，包含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四種面向的結構組成，改革成效方面，則比較兩個帝國所做出的重大改革議題。本文認為，前述四項也可視為是帝俄與滿清政權崩潰的內部因素，而改革是兩個帝國為了讓原有的內部環境適應外部壓力所做的嘗試。

（四）俄羅斯和中華帝國的外部因素與人民反抗之比較

本章重點在於比較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所面臨的外部因素，以及兩國人民在內、外部因素下起而反抗帝國的事件。在外部因素方面，包含兩國的重大對外戰事以及歐美所帶來的文化思想衝擊，接著比較兩國人民面對這些內外因素所做的反抗。本文也認為前二項可視為是帝俄與滿清政權崩潰的主要外部因素，而人民反抗是綜合上一章的內部因素與本章所提及的外部因素的結果。

（五）結論

本章將總括上述各章節之內容，並將研究的發現提出，最後做一系統性和有價值性之結論，並回應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章　俄羅斯和中華帝國當權者人格特質比較

統治階層對於國家的興衰有重要的決定性作用，而在專制的國家，握有極大權力的在位者，更是宰制國家走向的重要人物。因此，本章特別注重在位者人格特質的比較，針對羅曼諾夫王朝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滿清王朝晚期的光緒皇帝，以及在滿清晚期握有比光緒皇帝更多實權及勢力的慈禧太后，三者進行比較。關於尼古拉二世，一般被認為是「沒有能力的皇帝」，無法面對新的變局與挑戰，並且殘暴又迷信，帶領國家往錯誤的方向；光緒皇帝，一般則認為是沒有實權、軟弱的皇帝，處處被慈禧限制，想有作為卻又欠缺膽識；慈禧太后，則被普遍認為是握有極大權力，但在處裡國家問題上，是殘忍且專制的，並貪圖個人榮華、眼光短淺，導致屢屢出現荒唐、錯誤的政策。然而，此三人的歷史形象，是否真是如此？以及是否還有其他更細膩的人格特質？這些是本章所要研究的重點。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節　尼古拉二世的人格特質

尼古拉二世（1868 年 5 月 18 日（儒略曆 5 月 6 日）－1918 年 7 月 17 日（儒略曆 7 月 4 日），Nikolay II Aleksandrovich；俄文：Николай 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94 年登基，是俄羅斯帝國最後一位沙皇。自幼學習許多專業的教育，例如外語方面，學習過英語、法語和德語，而歷史、地理、數學和化學也是在基礎教育中就已經學習的。十七歲開始，許多重要的政治、軍事和學術界的人士，也被請來當他的老師。許多專業課程與理論，如政治經濟學、財政學、國際法、民法和軍事科學等等，他都能學習的很好，被認為是聰明的學生。[1]這點與傳統歷史上給予的「能力有限」這樣的評價看似有所不同，然而，尼古拉二世所受的教育，實際上可以發現只是知識的灌輸，而沒有培養思維的能力。但這並非尼古拉二世自身的問題，而是羅曼諾夫王朝一直以來的傳統教育方式，因此塑造出沒法應付世局變革的皇帝，是很自然的事。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 Mark D. Steinberg & Vladimir M. Khrustalev, *The Fall of the Romanovs: Political Dreams and Personal Struggles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p. cit.,* p.4.

圖 2-1：沙皇尼古拉二世像

（圖片來源：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nglish Online*, <http://www.english-online.at/history/russian-revolution/russian-revolution-and-civil-war.htm>）

至於尼古拉二世的政治觀，以及統治方針的形成，則可以簡單用「傳統道德」和「宗教信仰」兩者來解釋。

所謂的傳統道德，以「遵守現有制度下的秩序」，和「服從上位者」兩項最具代表性，而這與尼古拉二世曾經有過的軍事生活很有關聯。尼古拉二世很喜歡他青年時期的軍官生活，並增強「軍隊即是俄國政治傳統的核心」這樣的概念，而事實上俄國的歷史也的確就是一部軍事擴張的歷史。尼古拉二世相當嚴守軍紀，並且有著自我約束和高道德標準，他自己也認為這是君主最需要的品德。其中一個例子，是尼古拉二世對於整潔的要求，根據他的熟人說，尼古拉二世擺放生活用品，如桌子上的筆、浴室的沐浴用品總是要擺放整齊。另外，尼古拉二世也很

要求秩序，他登基後的生活都是有一定的順序：用餐、審理文件、會見官員、運動和陪伴家人，而且每項活動都有自己規定的時間。[2]換言之，尼古拉二世對自己和他人都嚴格要求要井然有序。這樣的態度在面對政治時，尼古拉二世的政治觀很自然的就是認為「士兵服從軍官，軍官服從沙皇」、「人民為貴族服務，貴族為沙皇服務」是不容質疑的秩序，而沙皇則會愛戴他的家族和子民，就像上帝愛著世人那樣。對他而言，當俄國的沙皇是一種「義務」，而不只是一種權利。所以，在 1905 年爆發的革命，尼古拉二世堅信，只要當權者都認真得履行自己所該負的義務，社會動亂就會得到控制，他也不斷向人民呼籲，要他們「老老實實的工作」，因為這就是他們的義務。[3]而他的義務，就是要維護俄國原有的專制制度，並堅信這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俄國和上帝。

至於所謂的宗教信仰，指的是俄國傳統信仰的東正教，尼古拉二世自幼就受到母親費奧多羅夫娜（Maria Feodorovna；俄文：Мария Фёдоровна）和宗教會議總監波別多諾斯采夫（同時也是尼古拉的導師之一[4]，Konstantin Petrovich Pobyedonostsyev；俄文：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的影響，深信沙皇是依靠神所賦予的智慧來行使權力，並且是神聖且公正的，沙皇的一切作為需要為上帝負責。另外，尼古拉二世的妻子，皇后亞歷山德拉（Empress Alexandra Fyodorovna；俄文：Императрица Александра Фёдоровна）也在嫁給他後改信東正教，並且也是個虔誠的信徒，她常常要尼古拉聽從自己的「本能」和「靈魂」來做判斷，要他相信這就是上帝要他做的選擇。[5]深受皇后重視的拉斯普廷（Grigori Yefimovich Rasputin；俄文：Григорий Ефимович Распутин），也鼓勵沙皇用本能的方式來做推理與抉擇。因此，尼古拉二世常常認為他所做的決定，就是上帝的旨意，聽從自己的直覺來做判斷，對俄國的未來才是最好的。即使是面

---

[2] ***Ibid.,*** p.6。

[3] ***Ibid.,*** p.10.

[4]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Российский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портал,* <http://museum.edu.ru/catalog.asp?cat_ob_no=12615&ob_no=12774> (17/3/2013)

[5] Mark D. Steinberg & Vladimir M. Khrustalev, *The Fall of the Romanovs: Political Dreams and Personal Struggles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p. cit.,* p.34.

對國家內部動亂，他也將其視為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要給俄國的「磨難」，而俄國應該接受上帝選擇要它承受的苦難，並相信一切都會變好的。

家庭也是尼古拉二世的生活重心，甚至可以說，對他而言家庭才是最重要的。從他日常與家人的書信，或是從他本人的日記中，都可以看出他對妻子、小孩、母親和兄弟姊妹有著真摯、深厚的親情。尼古拉二世和亞歷山德拉的婚姻關係十分幸福美滿，亞歷山德拉是德國的公主，然而她的德國人認同卻很薄弱，因為她所受的是英國式的教育，這讓她更像是一個英國人。尼古拉二世和亞歷山德拉之間的書信往來通常也都是使用英文，並在信中都是用親暱的暱稱來稱呼對方。他們之間的情感也讓他們在政治觀、宗教觀和世界觀是站在同一陣線。尼古拉二世也十分疼愛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排行最小的兒子阿列克謝（Alexei Nikolaevich；俄文：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阿列克謝也是尼古拉二世唯一的兒子，但卻患有血友病，因此也最得亞歷山德拉的關愛。[6]不難發現，尼古拉二世心裡真正想當的是個好父親、好丈夫，而不是一位好君主。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 1894 年尼古拉二世得知他父親去世時所說的話：「我沒有做沙皇的準備，我從不想做沙皇。」他甚至寧願去剷雪或陪伴妻兒，也不願去治理國家。[7]然而，如前面提到，不論是從傳統道德的秩序來看，或是宗教信仰的為上帝負責來看，尼古拉認為當沙皇是種義務。

很明顯，尼古拉二世的人格特質，就是遵守規律、相信直覺、看重家庭。這些特質絕對不能說是缺點，但在面對變動的世局時，遵守規律就會變成墨守成規，不願意按照時空背景適當改變政策和制度，就會讓危機繼續擴大；過度依賴本能的直覺，欠缺理性思考和接受多方意見的能力，就會讓政局充滿危險和不確定性，做錯決策的可能性也因此提高；此外，因為看重家庭而把國家大事放心交給家人，

[6] 事實上，怪僧拉斯普廷正是透過成功控制阿列克謝血友病的病情，而深受皇后喜愛，被亞歷山德拉認為是上帝派來的使者，從而開始干涉羅曼諾夫王朝的政權。請參考：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Баханов, *Николай II,* (Москва: АСТ-ПРЕСС, 2000), стр.120-123.

[7] Mark D. Steinberg & Vladimir M. Khrustalev, *The Fall of the Romanovs: Political Dreams and Personal Struggles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p. cit.,* p.10.

或是只信任家人而不信任官僚，[8]在政治上是難以服眾的，這也是尼古拉二世晚期得不到重要官員和其他皇室支持的重要原因。

不過，尼古拉二世對於官員、平民和軍隊也有自己的看法。首先，尼古拉二世並不是非常相信官員，甚至認為官僚的存在本身就是沙皇與人民之間的障礙。在當時，這其實是種很普遍的看法，官僚被認為只顧自己的利益，而阻礙沙皇去了解人民的需要。在傳統上，人民也有這樣的感受，尤其自從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Nikolaevich；俄文：Александр II Николаевич）解放農奴的政策並未完全落實，更導致了沙皇和人民對官員的不信任。尼古拉二世甚至有時會故意不採納官員們的建議。

其次，尼古拉二世認為自己是愛護著人民，就像愛自己的孩子那樣。他也深深相信一般的俄國人民是愛戴他的，例如 1902 年尼古拉二世在寫給亞歷山德拉的信件中，描寫他在觀看軍事演習的途中，經過農村時看到「善良的農民們抱著簡單的麵包和鹽，所有人都跪在地上，流露出如孩子般的快樂」。[9]而在 1913 年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周年的慶祝典禮上，尼古拉二世到處受到歡迎，使他更加相信俄國人民仍然愛著他們的沙皇。1914 年，人民普遍支持戰爭的熱情，[10]似乎又給他更強大的信心，甚至正式宣戰的那天，尼古拉二世和皇后在冬宮的陽台上，人民則在冬宮前的廣場，他向人民低著頭致意，傳統上這代表著他忠於人民，而人民也在此時高唱國歌。這種沙皇和人民一致的團結感，更讓尼古拉相信衝突已經不存在，而他堅持的傳統道德和宗教信仰是絕對正確的。因此也更不可能屈服立憲改革的要求。[11]

最後，如前所述，軍隊在俄國政治有著重要的地位，而尼古拉二世也對軍隊有著浪漫的想法。在他的軍官生涯中，他享受著同袍之間的友誼，舉行無數次的

---

[8]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尼古拉二世讓皇后和拉斯普廷處理國家大事，自己前往督戰，平時則不信任杜馬和支持杜馬的官員。

[9] Mark D. Steinberg & Vladimir M. Khrustalev, *The Fall of the Romanovs: Political Dreams and Personal Struggles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p. cit.*, pp.17-18.

[10] 即第一次世界大戰，俄羅斯帝國當時對德國、奧匈帝國宣戰，人民剛開始普遍是支持的態度，具有高度愛國意識。詳見本文第四章第一節。

[11] 關於沙皇面對人民要求改革的問題，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閱兵典禮和慶功宴會。登基之後，他也常帶著他的家人，穿著軍服參加軍事活動。並且從他的書信和日記中，都可以看出他相當喜悅能參加類似的軍事活動，並都帶有濃厚的浪漫色彩。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的期間，尼古拉二世甚至曾想到前線指揮，認為應該要和軍隊一起分擔戰爭的艱苦，並且認為自己到前線可以鼓舞士氣。1917 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尼古拉二世又再次想親上前線，但在許多官員的勸阻下放棄念頭。

面對俄國的都市化和工業化，人民要求民主改革，尼古拉二世和亞歷山德拉卻因此更相信俄國要存活就必須維護傳統的社會和政治關係，認為「美好的傳統道德」正是他們當時的社會所欠缺的。[12]因此，羅曼諾夫王朝的崩潰，也可以說是在位者與人民之間思想衝突的必然結果。因為從尼古拉的角度看來，1905 年和 1917 年的革命並非是民主改革的政治信號，而是要恢復專制制度的信號。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2] Mark D. Steinberg & Vladimir M. Khrustalev, *The Fall of the Romanovs: Political Dreams and Personal Struggles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p. cit.,* p.5.

第二節　光緒皇帝的人格特質

愛新覺羅•載湉(1871 年 8 月 14 日－1908 年 11 月 14 日)出生於同治十年，醇親王奕譞的兒子，屬努爾哈赤後代的愛新覺羅家族，道光皇帝為其祖父、咸豐皇帝是其大伯、而同治皇帝是其堂兄。同治皇帝駕崩後，慈禧便將年僅四歲的載湉推上皇位，是為光緒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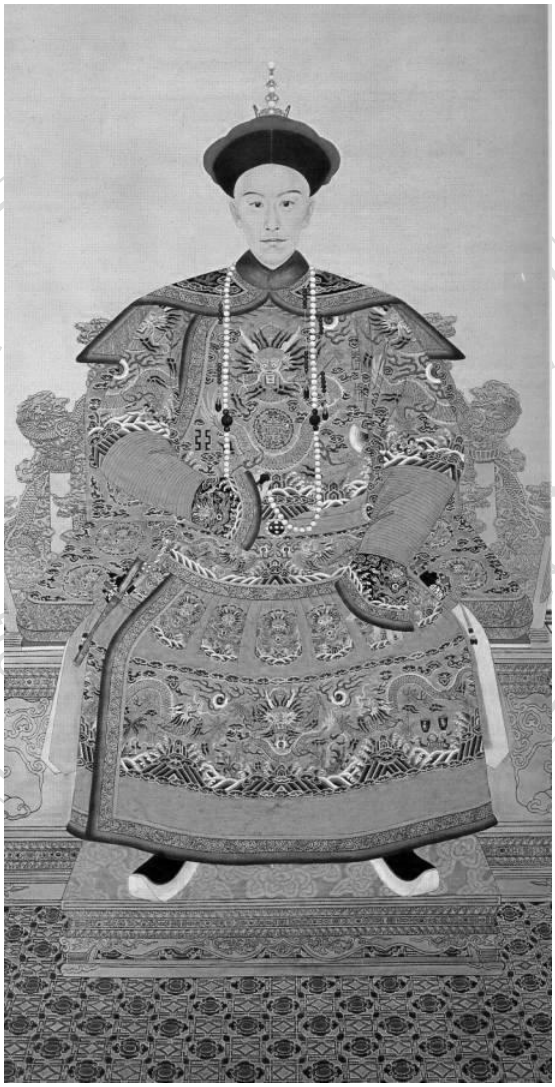

圖 2-2：光緒皇帝像

（圖片來源：「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1871-1908)」，**清朝紀真**，<http://ns100.newsbook.net/~yiuyeeling/page05.htm>）

光緒本是慈禧的外甥，但過繼之後，慈安和慈禧共同成為光緒的母親，光緒自幼離開親生母親身邊，非常沒有安全感，而慈禧又是嚴肅且具威嚴的太后，因此光緒從小就叫慈安為「皇額娘」，但稱慈禧是「親爸爸」，表示慈禧在他心裡更像是個嚴父。[13]慈禧也希望光緒這樣叫她，因為在男尊女卑的傳統社會，叫親爸爸正代表著慈禧的地位是高於慈安太后的。[14]很明顯，慈禧並沒有給予光緒所需要的母愛，光緒和慈安太后較為親密，慈安太后是個仁慈、溫和的皇后，常常盡可能地去保護光緒。然而，慈安並沒有慈禧的政治野心，在宮中和朝廷的實權也沒有慈禧多，自然只能保護一時的。光緒喜歡慈安，反倒讓慈禧對他更加嚴格，並且越來越不喜歡光緒。慈禧對光緒的態度，也讓太監們不把他放在眼裡，常常沒給皇帝應有的膳食，甚至還總是拿剩菜或冷掉的食物，光緒如果向太監抱怨，太監反而去慈禧面前說皇帝太過挑剔，結果讓光緒又被慈禧責罵一頓。[15]因此，原本身體就不太好的光緒，在身心都受到傷害後，更是常常疾病纏身，導致之後身心出現缺陷。

但這正是慈禧所希望的，她就是要光緒懼怕他，並且服從她的意思。慈禧對幼小的光緒來說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每每在朝政時，光緒看起來不像是個皇帝，而是個只能聽從西太后教訓的「兒臣」。於是，光緒變得膽小且沒自信，此外，光緒幼年身體就不好，瘦弱多病、經常腹痛頭疼，說話也結結巴巴，可說是慈禧對他極為嚴厲並疏於照顧的結果。帝師翁同龢是這樣形容的：

「西太后待皇上無不疾聲令色，少年時每日喝斥之聲不絕，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積威既久，皇上見西后如對獅虎，戰戰兢兢，因此膽為之破。至今每聞鑼鼓之聲，或聞吆喝之聲，雷輒變色云。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請安，惟西后與皇上接談甚少，不命之起，則不敢起。」[16]

---

[13] 王日根，**光緒 VS 明治天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頁 12。
[14] 林宇杰，**光緒帝**（台北：名田文化，2005 年），頁 18。
[15] 同前註，頁 20-21。
[16] 王日根，**光緒 VS 明治天皇**，頁 14。

翁同龢是同治皇帝的老師，慈禧頗信任他，認為翁同龢可以按照她自己的意思來教導光緒，慈禧最希望光緒能聽她的話，好好「孝順」她，因此特別要求翁同龢要格外傳授「孝道」給光緒。曾擔任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德齡如此形容：

「因為光緒皇帝究竟不是她親生的兒子，將來長大成人，未必會怎樣孝順她，為未雨綢繆起見，特地再三教人去傳諭翁同龢，要他格外側重於孝的教育……孝經那一部書，也是最注意的。她命令翁同龢非使光緒皇帝讀得嫻熟不可，甚至他自己還要隨時考試。假使考得不好，那當然連翁同龢也得受責了。」[17]

光緒在五歲時，也就是登基一年後，開始接受翁同龢等人的教導，學習漢文、滿文、蒙文、騎射等清朝帝王傳統應有的學識，[18]光緒也很依賴翁同龢，因為翁同龢很能同情光緒的處境，除了教導他許多知識外，也關心光緒的身心狀態，盡可能撫慰他，加上翁同龢當了光緒二十多年的老師，兩人關係極為密切。事實上，光緒長期生活在封閉的宮廷，對外事務的了解幾乎都是透過老師翁同龢和之後的康有為等人來了解。因此，翁同龢對光緒的影響並不亞於慈禧。翁同龢教導光緒要有古代帝王的品德，其中節儉、愛民、憂國等特質，可以說正是翁同龢帶給光緒的。[19]另外，在光緒「親政」後，翁同龢也增加許多和西學有關的課程，開拓光緒的國際視野，以及對西方的興趣。[20]這使得光緒比起中國傳統的皇帝更能接受外來思想，例如有一次，光緒曾接觸在《聖經》後，下喻西洋宗教是在培育民德、增進民智，因此大清子民可以信奉基督教，除此之外，光緒也親自做過類似基督教的禱告儀式。這在傳統上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光緒自幼受到的教育，是

[17] 德齡 撰，秦瘦鷗 譯，**瀛台泣血記**（香港：百新書店，1954 年），頁 103。
[18] 光緒十五年時，光緒受到翁同龢的推薦，讀有關西方的書籍，光緒也從這時候開始學習英文。
[19] 光緒五年，慈禧生日時按慣例要在宮廷內演戲連演七天，所有大臣都前去聽戲，但光緒卻一個人默默回書房看書，太監勸他一塊去，他回說只有鐘鼓聲才是高雅的聲音，唱戲的曲調僅是靡靡之音。在幼年就說出這樣的話，可見得是翁同龢所教導。此外，光緒在戊戌變法時不只一次提到要以人民為主，君權並不是最重要的，和孟子所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念很相近，也是翁同龢盡心教導他古代帝王品德的成果。
[20] 賴盈如，「翁同龢對光緒皇帝之教育」，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頁 54。

中華傳統文化所能接受的思想，也就是以儒家思想為重，並充滿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思維，這樣的環境下，是不太可能輕易接受外來、且被認為是「夷狄」的思想。然而，光緒願意大量接受西方事物，與當時的局勢很有關聯。光緒是在封閉的宮廷內長大，對外界的了解通常得靠老師或其他大臣告知，當光緒想追求更多知識時，就會想依賴書本。在晚清動盪的社會，光緒也曾大量閱讀中國古老的經典，但是，光緒並沒有辦法在古書中找到解決當前王朝困局的辦法，因此「上怒甚，謂此皆無用之物，命左右焚之。太監跪請不許。」[21]之後，常常去總理衙門要書，並接受康有為等人的思想，這才有之後的戊戌變法。正因為光緒受到慈禧控制，讓光緒願意去思考自己能改變現狀的方式，並且願意接受傳統以外的觀念。

至於在幼年時另一個影響光緒性格的，正是他的生父弈譞。弈譞前兩位孩子都早夭，好不容易又有了光緒，卻為了當慈禧的傀儡而被送入宮中，讓他相當心痛。然而，弈譞本是慈禧身邊的臣子，個性極為恭順，他不願意與慈禧作對，於是想盡辦法讓慈禧滿意，最後獲得慈禧信任，讓他去管理光緒學習的相關事務。[22]弈譞時常會到書房看看皇帝的學習情況，光緒看到生父前來也會有所敬畏，並激勵自己讀書。[23]慈禧會讓弈譞管理，也是希望光緒能像他生父一樣恭順，然而，這卻為光緒的矛盾性格埋下伏筆，由於弈譞知道慈禧的心思，因此特別要求帝師要教皇帝親睦宮廷、嚴守家法和孝敬皇太后。但另一方面，由於弈譞多年執掌要政，對王朝的局勢也相當了解，知道滿清正面臨著內憂外患，因此他也希望帝師能讓皇帝留心世務，不要只是專注辭章，希望自己的兒子能改變清朝的命運。這就造成光緒出現得服從慈禧，又想做出改革的矛盾心理了。

由於光緒一直在慈禧嚴密的監控下成長，處處受制於慈禧，並且在慈禧的眼裡一直是個不成器和有惡疾的皇帝。這讓光緒因此一直對慈禧心懷不滿，且個性

[21] 葉林生，「論光緒」，**社會科學**，第 3 期（1981 年），頁 63。
[22] 林宇杰，**光緒帝**，頁 40-46。
[23] 鄭仲烜，「清朝皇子教育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218。

變得乖戾又任性。人格特質上則出現既懦弱又倔強、既畏縮又抗爭的矛盾性格，因此較難以讓人理解。不過事實上這是很自然的事，若一個人長期受到壓迫和限制，就容易對施壓者產生懼怕的心理，可是，一旦有機會可以脫離這樣的壓迫和限制，受壓者就會力求反抗，即使自己知道幾乎不可能反抗成功的情況下，也不免會出現抗拒的心理。

光緒試圖抗拒慈禧的一個例子，是在光緒大婚的時候。按皇宮的規矩，慈禧本當要在光緒成年時還政給他，然而，慈禧還是想要控制著光緒，於是硬是將自己的外姪女葉赫那拉氏嫁給光緒當皇后。[24]光緒原本不想選自己的表姊為后，因此在大婚之禮時，光緒借口有病，停辦照理應當宴請「國丈」和整個皇后家族的「筵宴禮」，甚至把宴桌分給王公大臣時，未提「后父、后母」，藉此來表達自己心中的不滿。[25]

另外，由於受到宮廷內部鬥爭和晚清變局的影響，光緒在面臨一些重要的事件所做的決定或態度，有時會出現看似矛盾的作為，讓史家常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事件，當屬光緒極力贊同，康有為和梁啟超主導的戊戌變法。此外，引發八國聯軍的義和團事件，也可以看出光緒存在多種性格。

關於戊戌變法，有人認為光緒是在和慈禧爭權，但事實上，光緒也確實是想要有所改革。光緒很羨慕鄰國的日本，他看到日本漸漸由弱變強，很想學習日本。在實施變法上，光緒很能接受康有為的建議，例如「伸民權、開議院」他都很能接受，大臣提到這會降低君權時，光緒說：「吾變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權之替不替何計焉！」在這裡，不能說光緒軟弱，或是存有專制的思想，反而像是願意傾聽人民聲音，看清世局變遷，並勇於改革的皇帝。

至於義和團事件，有人認為光緒堅持議和是軟弱、賣國的行為。但其實光緒是只是客觀的將事件看清，並理性判斷不可和列強為敵。當慈禧等人想要利用義和團對列強宣戰時，光緒曾說：

---

[24] 即後來的隆裕皇后。
[25] 林宇杰，**光緒帝**，頁 86-98。

「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鮮之役，創鉅痛深，效亦可睹以。況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合而謀我，何以禦之？」

「寡不可敵眾，弱不可敵強，斷未有以一國能敵七、八國者。」

「戰非不可言，顧中國積衰，兵又不足恃，用亂民以求一逞，寧有幸乎？」[26]

因此，光緒不願意義和團對抗列強，並非懦弱的表現，而是光緒能夠清楚地看到清朝所面臨的問題，他並非反對對抗列強，而是希望慈禧等人能夠看清客觀條件，而非意氣用事、不顧實際狀況去和敵人對抗。另外，光緒也很在意人民的生死，他主張議和也是希望人民可以不受戰亂之苦。

但是，即使光緒試圖力挽狂瀾，卻還是無法扶持將倒下的中華帝國，他受到慈禧的控制，大臣間也沒將他放在眼裡，此外，國庫空虛、軍紀腐敗、設備落後、人心思變等問題一一浮現，光緒要能「中興」或是成為翁同龢等人期待的古代聖君，是幾乎不可能了。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6] 葉林生，「論光緒」，頁 66。

第三節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1835 年 11 月 29 日－1908 年 11 月 15 日），出生於北京，葉赫那拉氏，滿洲鑲藍旗人，乳名蘭兒。1852 年（咸豐十二年）被選入皇宮，之後成為咸豐皇帝妃，咸豐駕崩後，和慈安太后共同「垂簾聽政」，慈安被稱作「東太后」、慈禧被稱作「西太后」，然而在東太后仙逝後，慈禧太后成為光緒時期實際的最高統治者。[27]

圖 2-3：慈禧太后像

（圖片來源：“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Turns 175 (Picture of the Day),” *Britannica,* <http://www.britannica.com/blogs/2010/11/the-empress-dowager-cixi-turns-175-picture-of-the-day/>）

[27] 吳浩然，**慈禧的政治學**（台北：國家圖書館，2007 年），頁 3。

慈禧最明顯的人格特質是缺乏安全感，並且表現在許多事情上面。慈禧會缺乏安全感，可說是環境所造成的，慈禧家中祖父和父親都是監生出身，[28]雖然不能說是奢華富有，但肯定是衣食無虞。然而，在慈禧 13 歲時（1843 年，道光廿三年），祖父因案入獄，家中為救祖父籌錢賠款，導致家中經濟發生困難，造成慈禧認為權力和金錢是生活的保障，因此慈禧喜歡追求權力和金錢，是因為她內心缺乏安全感，認為只有權力跟財富才能讓她安全。

根據陳仁勇的分析，慈禧的這些人格特質，在分類上具有「自戀型人格」（Narcissistic Personality）和「強迫型人格」（Compulsive Personality）的特徵，而以自戀型人格為主，強迫型人格為輔。[29]具有自戀型人格者，常會有如後所述的特徵：誇大自己的重要性、專注於權力、渴望許多讚美、無法有同理心、妒忌他人或認為她人正在妒忌自己。首先，慈禧自己曾經說過：

「我常常自以為是世界最聰明的人，誰也不能和我相比，雖然我曾看過中譯的關於維多利亞皇后的許多事蹟和生活，我仍覺她的生活趣味和事業還不及我的一半呢？」[30]

從慈禧的自白中足可看出慈禧的自命不凡，並認為自己是很偉大的人物。除了自我認同感很高以外，也希望能受到他人讚美，這點也可在慈禧的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

「頤和園的一切，——不僅是頤和園，都要迎老太后心意。老太后晚年以慈治天下，以為萬民都受她的恩澤，就連花鳥蟲魚都要向她表示祝福，李蓮英吩咐太監們要千方萬計地把魚和鳥訓練好，討得老太后的喜歡。……老太后遊湖牠們

[28] 清朝中葉後，捐官風氣盛，可以捐錢成為監生，再用監生的資格得到官職，通常是擔任低階官員，但只有滿洲旗人才能擔任，主要做些翻譯、擬稿或抄寫等文書工作。
[29] 陳仁勇，「慈禧太后與晚清改革」，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年），頁 71-74。
[30] 同前註，頁 73。

（鳥群）隨著龍舟叫，老太后遊山牠們跟著轎子叫，不用說這都是太監們訓練出來的。……剛一上岸，李蓮英就揮手攆走了御船（嫌御船礙事），狗搖尾巴似地向老太后說：『啟稟老佛爺，您老人家今天遊湖，連魚都高興！老佛爺您伸出御手來，往水皮上一沾，魚會往您手上跳。』……果真，老太后向前一伸手，半尺長的大魚就前擁後擠，白花花的一片，在水皮上潑剌剌地亂跳，水點濺了老太后一身。老太后非常高興。」[31]

在權力追求上，慈禧自入宮以來就積極想得寵，23 歲時就已經母以子貴，成為貴妃，之後更是充分表現對政治的熱愛，辛酉政變後，也垂簾聽政、掌握大權，同治和光緒皇帝實際上都受制於她。慈禧也樂於接受他人的讚美，根據慈禧宮女的說法，從早晨梳洗開始，宮女和太監必須盡可能地讚美慈禧，即使天天如此，慈禧也不會覺得厭煩。[32]慈禧愛美是廣為人知的，事實上，慈禧相當注重自己的容貌，可由宮女的形容得知：

「臨窗東南角有一架梳妝台，這是老太后最心愛的東西，她親自研製的化妝品，都放在這裡，她早、中、晚要在這裡消磨兩、三小時。老太后是個愛美的人，也教別人愛美。她常說：『一個女人沒心腸打扮自己，那還活什麼勁兒呢？』」[33]

有關慈禧愛美，筆者認為有一部分原因其實也是因為想得到他人的讚賞，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想靠容貌獲得權力。另外，慈禧常常只顧自己，無法體察別人的辛苦。每當慈禧聽戲時，身邊伺候的宮女都苦不堪言，因為聽戲常常是好幾個時辰，照規矩，宮女伺候肯定得站著，長時間下來，慈禧也不覺得宮女辛苦，完全不想也叫宮女們坐下一塊聽戲，可見慈禧絲毫沒有同理心。最後，慈禧善於妒忌

[31] 金易、沈義羚，**我在慈禧身邊的日子**（台北：智庫，2001 年），頁 200-205。
[32] 陳仁勇，「慈禧太后與晚清改革」，頁 72。
[33] 金易、沈義羚，前揭書，頁 60-61。

也為人所知，曾受咸豐皇帝寵愛的麗妃，原本每年除夕都會照例贈與乾果盤，然而咸豐駕崩後的第一個除夕，慈禧便以太后的身分撤了應給麗妃的乾果盤，[34]足以看出慈禧善妒且度量狹小。

至於強迫型人格，通常會專注許多細節、要求完美、要他人完全照自己的要求做事、處事僵化且頑固，以及無法表達溫情。關於追求完美、注重細節方面，可從慈禧的日常生活明顯看出，慈禧所穿的衣服式樣，都得親自看樣圖並親自修改，宮廷製作的胭脂，慈禧也都親自過目，在修建頤和園時亦是如此，甚至有一次西狩回京時，慈禧堅持要在特定的吉辰良時回京，[35]對行李和開車時間都親自叮囑。慈禧也要他人完全照自己的想法做事，例如她曾先後干預兒子同治皇帝和繼子光緒皇帝的婚姻，完全不考慮當事人的意願。此外，慈禧發動戊戌政變的原因之一，就是光緒所做的事已經超出她的規則。不過慈禧並沒有處事過於僵化頑固，相反的她是可以接受改變的，例如戊戌變法、戊戌政變、庚子拳亂到清末新政等政策改變，恰好說明她是願意改變的。事實上，慈禧垂簾聽政本身就是改變清朝祖制的做法。最後，慈禧雖然對身邊的人都很嚴厲，無法表現出溫情，但根據慈禧宮女的說法，慈禧很愛小動物，「從來不跟小牲口發脾氣，對花鳥蟲魚、古玩玉器都愛」。[36]由此可見，慈禧只有部分的強迫型人格，因此是以自戀型人格為主、強迫型人格為輔的人格特質。

其他還有人形容慈禧是個聰明、有恆心的人，但是貪財和迷信。慈禧學習能力很強，且善於思考、工於心計。平常生活也很規律，幾乎日常上對自己的要求都能做到。或許這些特質也是讓她自戀的原因之一。至於貪財部分，如前文所述，是因為慈禧沒有安全感使然，沒有錢就跟沒有權力一樣，會讓她沒有安全感。

至於關於慈禧的迷信程度，可由侍奉其多年宮女的口中得知：

[34] 陳仁勇，「慈禧太后與晚清改革」，頁 66。
[35] 光緒念七年（1901 年），慈禧從西安回京，堅持要在吉時從西安啟程，入北京時也堅持要是吉時才能入京。慈禧也被批評太過迷信，像壽辰吉慶時演戲，不可以有不祥的詞語出現。
[36] 陳仁勇，前揭文，頁 65。

「據說，中元節是鬼節。宮裡對這事傳說得很盛，聚談起來，添枝加葉，越說越玄虛。……老太后是十分迷信的，並不是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模糊態度，她是真信，不是假信。一過七月初十以後，丟失的東西就不許再找了。……老太后認為這幾天到處有鬼，鬼看見喜愛的東西，就許借去玩幾天，所以不要找。」[37]

慈禧的怕鬼心理，或許和中華帝國的歷史記載有關，《史記・呂后本紀》就有寫到，呂后參加一次宗教儀式，回來後看見一個像是黑狗的東西，鑽進自己的身體，就不見了，沒多久呂后生了重病而死。呂后在劉邦死後握有重權，慈禧和她一樣是太后專權的人，自然有可能也是其迷信、怕鬼的原因。總而言之，貪財和迷信，則都顯示出慈禧缺乏安全感的特質，因為慈禧自從祖父入獄後就認為沒有錢會難以過活，導致慈禧沒有錢就會沒有安全感，而過度迷信也是自知自己握有權力和傳統期待並不一致，導致沒有安全感的一種表現。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37] 金易、沈義羚，**我在慈禧身邊的日子**，頁 264-265。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節探討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晚期在位者的人格特質，尼古拉二世和光緒皇帝，可說是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真正的「末代皇帝」。[38]在教育方面，可以看出兩人都是自幼就受到自己帝國皇族傳統的優良教育，其中語言學習也是相當重視，尼古拉二世的教育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學習歐洲大陸較為盛行的英語、法語和德語，光緒皇帝則受到文化傳統的影響，接受滿文、漢文和蒙文的學習，英語是其認為西學重要而主動學習的。其他學科方面，由於俄羅斯帝國受西方文明影響較早，因此現代科學和國際關係等重要科目都在其成年後學習完畢，光緒則只學習中國傳統經學以及滿族傳統的騎射，此是環境所造成。然而兩人都被老師認為是聰明的學生，事實上兩人的表現確實不能說是駑鈍。

兩位帝王的性格最大的差異點，在於尼古拉二世是守規矩、愛整潔、重視傳統的人，這點和慈禧太后反而較為相似；而光緒皇帝則是不重禮節、重視外來或新奇事物之人。此外，尼古拉二世被認為欠缺思維能力，更精確一點說，是缺少理性、客觀的角度去判斷事實，一味的相信宗教和皇后的觀點，運用直覺去決定事情，而光緒則擁有理性、客觀判斷的能力，可以看出清朝宮廷內的大臣和慈禧所看不清的事物。另外，尼古拉二世重視家庭，甚至認為家庭優於國家；而光緒自幼就離開生父生母，在宮廷也缺乏家庭的溫暖，就連成親也充滿著政治的算計，對他而言，家庭一點也不重要，體察民心、取得政權、保護國家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換言之，光緒比尼古拉二世更有身為一國之君的體認，也更有領導變局的能力。然而尼古拉二世握有絕對的權力，而光緒卻處處受制於慈禧。

除此之外，尼古拉二世和光緒皇帝所處的背景不同，成長的過程也有很大的差異。尼古拉二世在還是皇儲時就常到各個國家遊歷，光緒則只能待在宮中，靠

[38] 尼古拉二世原本想將皇位傳給兒子，後來擔心兒子的病情，又想退位給弟弟，但都未能如願。光緒之後的宣統皇帝，登基時年僅 3 歲，加上即位 3 年後大清帝國就正式崩潰了，因此宣統皇帝只是名義上的末代皇帝，實質上並沒有什麼作為。

大臣和帝師給予消息。尼古拉二世登基時受所有大臣認同，並且受到人民的愛戴，相反，光緒皇帝只是慈禧的傀儡是眾所皆知的事，連太監都敢欺負他。光緒逃脫不了慈禧的掌控，甚至恐懼著慈禧，要有所作為也是極為困難的事。若從這些觀點來看，尼古拉二世又比光緒皇帝擁有先天上的優勢，然而卻還是無法避免帝國崩潰的命運。

若把慈禧太后當做是中華帝國晚期實質的統治者，並與俄羅斯帝國的尼古拉二世做比較，可以發現兩人最大的共通點是迷信、注重細節和重視傳統三點。首先，尼古拉二世對東正教信仰的虔誠本不是壞事，然而在面對國家大事時，或是社會出現改革聲浪時，尼古拉二世都以直覺的方式去處理，並且認為這是上帝所要他做的判斷。此外，他與皇后亞歷山德拉只因為拉斯普廷似乎能有效讓皇子阿列克謝的血友病有所好轉，就認為他是「聖人」而幾乎言聽計從。至於慈禧的迷信，則表現在她害怕超自然的事物，以及過度重視時辰等等。過於迷信的統治者，反映出他是無法理性看待事物的，自然也就容易在政治上做出錯誤的判斷。

第二，尼古拉二世每天的生活都有規定要做的事，就連自己最重視的家人也有限定時間和順序，生活上的瑣事也十分在意。慈禧也是這樣的人，身上穿的衣服，一定要親自看過、修改，其他生活上的小事也通常得一一確認。在意細節固然不是缺點，但確實並非是上位者所需要的特質。俗話說「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過度在意細節者，眼光難以遠大，為政者必須掌握大局、度衡時勢，才能給予國家正確的方向。

其三，尼古拉二世的君權神授觀是根深蒂固地烙在心中，並且認為「傳統道德」是俄羅斯所必須堅持的道路，在國家面臨危機時，更應該去保有這項「美德」。因此，當俄羅斯的社會出現問題、人民渴望改革的時候，尼古拉二世反而認為應當回到「美好的過去」，而非創造新的未來。慈禧太后雖然自己改變滿清宗法，開始「垂簾聽政」的創舉，然而這些改變畢竟只是宮廷內的政治鬥爭，在談到最根本的傳統觀念上，慈禧可以說依然是個守舊的人，所以她要光緒盡「孝道」，

眾臣要守「君臣之禮」，在人民要求開放民權的時候，慈禧堅持要維護君權。所以，尼古拉二世和慈禧太后，由於重視傳統，甚至認為是不可有所改變的時候，自然無法順應潮流。

專制的政體中，在位者的人格特質，對國家的走向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力，尤其在變革的時代更是如此，透過在位者的人格特質，去分析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崩潰的原因，也就較為清晰。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三章　俄羅斯和中華帝國的內部因素與改革成效之比較

本章重點在於探討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政權崩潰的內部因素與兩國的改革成效，並進行比較。有關內部因素，筆者依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四種面向分別研究。首先，在政治結構上，將比較兩國的政治模式、官員任命方式、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及各機關權力分配方式等議題；軍事結構上，則比較兩國的陸、海軍的作戰能力，兩國的兵制，以及武器裝備等；經濟結構方面，比較兩國的農業、工業，以及對外貿易和經濟限制等議題；社會結構方面，本章探討兩國的等級或階級分類與流動，另外也會觀察兩國的家庭結構、人口流動、民族問題和宗教差異等議題。最後，有關兩國的改革成效，俄羅斯帝國有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以及帝國崩潰前尼古拉二世在位時的改革，中華帝國也有兩次重大改革，分別是自強運動和戊戌變法，而不論俄國和中國，改革的發生似乎都和戰爭失敗有一定的關係。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節　政治軍事結構之比較

一、政治結構

（一）俄羅斯帝國

俄羅斯帝國的政治制度，是中央集權官僚制（centralized bureaucracy），權力集中在沙皇身上，可以說「俄羅斯國家建立的歷史，就是沙皇集權制的歷史」[1]，從 18 世紀初期到 1906 年，沙皇是俄羅斯帝國唯一擁有立法權的主體，並握有行政權和司法權。[2]

不過由於國家行政相當龐大且繁雜，除了沙皇外，還有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一同決策內政和外交事務，這種權力機構的名稱和職責是由沙皇來決定的，例如亞歷山大二世時期主導的機構是大臣會議。另外，俄羅斯帝國在 19 世紀以後是透過部門來管理國家，各部大臣由沙皇任命，到 1917 年以前共有 12 個部。但行政各部門並不協調，這可能是因為沙皇想握有所有的管理權，致使各部門只聽命於沙皇，而不注重和其他相關部門協調。

關於立法權，1810 年成立立法諮詢機構，稱為國務會議（俄文：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在法律交給沙皇批准前，由國務會議進行討論，到了 1906 年才改由國家杜馬（俄文：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和國務會議兩院組成。[3]因此俄羅斯帝國的政治結構是有議會的，儘管和現今的國會概念並不相同。在沙皇之下的國務會議，主要是用來討論和制定法律、審查預算等等，重大的議題交由議會審議，但是議會只有諮詢性的表決權，而且是由沙皇任命議會內部的

---

[1] Anatole Leroy-Beaulieu 編，劉增泉 譯，帝俄和俄羅斯（台北：國立編譯館，2000 年），頁 581。
[2] Maureen Anderson, Anne Low, and Ian Keese, *Retrospective Year 11 Modern History,* (Australia: Jacaranda, 2007), pp.43-44.
[3] 即改為類似上、下議院制的制度。

成員所組成，並由沙皇決定議會可以執行的職務。[4]換言之，國會不是代議機構，而是官僚機構。而在遇到一些重要的政策需要制定時，沙皇可能會選擇成立一些特別委員會，把特殊的議題交由特別委員會處理，許多的大改革，如農奴解放運動就是使用特別委員會的方式來執行。

司法權方面，除了法院可以行使司法權以外，參政院也是最高的司法機關，並有檢察機關的職能，同時也是行政機關，是俄羅斯帝國相當重要的國家機關，基本上俄國的國家機關都必須聽命於參政院。[5]簡而言之，沙皇擁有一切的管理權力，而國務會議有立法諮詢權，大臣會議與各部門擁有行政權，法院有司法權，而參政院則握有行政、司法和監察等功能。

另外，雖然俄羅斯帝國是個專制的政體，但必須承認，俄羅斯帝國在 19 世紀時已有法制國家的概念，法律保障個人的權利，以及保障個人自由避免遭他人侵害。例如解放農奴就是在這樣的概念下產生，不過這時並未限制國家侵犯個人的權利，人民也還沒有參政的權力，因為這時俄羅斯帝國認為國家就是提供和保障個人自由的主體，[6]事實上俄國的人民也認為如此，「19 世紀末期以前，俄國的大多數民眾都信奉君權，而農民的君權思想則一直持續到了 1917 年。」[7]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由於俄羅斯帝國幅員遼闊，常常給予地方相當多的權力以方便管理，中央會任命貴族或菁英為地方上的省長，代表中央行使政權，原本規定不可徵收雜稅，但事實上被派去治理的官員多半都會巧立名目來貪污。不過在 19 世紀時，參政院的參政員常受到沙皇指派，以欽差大臣（俄文：Имперский посланник）的身分去其他地方行省，巡視各地行政，為中央的監督帶來一些效果，當地居民可以向欽差大臣投訴任何一位地方官員，帶給地方官員一定的限制與牽制。在 19 世紀上半葉，參政院曾派員 80 多次巡視地方，之後到 20 世紀初

---

[4] Anatole Leroy-Beaulieu，**帝俄和俄羅斯**，頁 587-588。

[5] 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米羅諾夫 著，張廣翔 等譯，**俄國社會史（下卷）：個性、民主家庭、公民社會及法制國家的形成（帝俄時期：18 世紀至 20 世紀初）**（北京：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03。

[6] 同前註，頁 137。

[7] 同前註，頁 138。

則有 40 多次以上。除了監督地方外，巡視也促使地方行政改革，將各地的問題帶回中央。

（二）中華帝國

中華帝國的領土，是由有一定任期的官吏來統治，土地也是私有制，人民之間可以自由買賣。[8]因此，可以說中華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一樣，也屬於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

另外，由於中華帝國改由外族（滿人）來統治，因此清朝的政治結構雖有中華帝國的傳統，但又有一些滿族才有的特色，其中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八旗制度。所謂的八旗制度，是努爾哈赤建立的一種兵民合一的制度，每個旗約有 7,500 名的武士及其家人、奴僕，每個旗的首領都是努爾哈赤的親人，分為鑲邊或不鑲邊的紅、黃、藍、白四種不同顏色組成的八面旗幟。[9]清朝入關後，又擴大成 24 旗，其中包含蒙古人和漢人，[10]這些人被統稱為「旗人」。這代表著清朝採取接受多民族的政治體制，願意容納少數民族。旗人裡的上層階級被教授滿文和漢文，這也讓兩個的不同民族間比較能夠融洽相處。事實上，滿人很快適應中國原有的官僚制度，但他們的原有生活，也會改變帝國原有的政治結構，並且使其更加完善。例如 1661 年成立的內務府，就是為了解決中華帝國長期出現的宦官干政的現象，內務府負責監督宦官，並管理宮廷內的日常事務，除此之外，內務府之下還有負責出版學術著作、重新分配土地、管理專賣的貨品等事務（如人參、鹽、御用織造和瓷器等），而這些活動都不受正規的官僚機構控制。[11]換言之，是在原有的官僚體系之上再建立一個官僚體系。

---

[8]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頁 34-35。
[9] 韓書瑞、羅友枝 著，陳仲丹 譯，**十八世紀中國社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2。
[10] 即滿人八旗、蒙古人八旗、漢人八旗，共廿四旗，各旗都由滿族將軍統領。
[11] 韓書瑞、羅友枝，**十八世紀中國社會**，頁 5。

不過基本上清朝的官僚體制是沿襲明朝的，中央政府依然由六部和都察院所構成，其中六部屬於行政機關，[12]都察院為監察機關。到了 1729 年，因為雍正皇帝感到事務越來越繁雜，清朝另外設立了「軍機處」，由八至十名的高級官員組成，用以幫忙處理公文（奏摺），幾乎每天和皇帝見面，並為國家重大事務提出建議。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的皇帝會安排自己私人的僕從，去制約地方官員，並透過這種方式取得非正式管道得來的訊息。[13]而除了內務府、軍機處、六部和都察院以外，中央還設有內閣、大理寺等機構，內閣是主要的諮詢機構，也是行政的中心，[14]大理寺則類似最高法院，擁有司法權。[15]

至於選拔官員的方式，中國自從隋唐以後，主要都是透過科舉考試來作為人事考核的制度。清朝基本上也是按照明代的科舉制度來選拔人才，[16]然而，由於考試的內容除了四書五經外，還被要求以八股文作答，這種僵化的文體較容易選出平庸的人，有才能或是有想法的人才反而無法進入要職。[17]這也造成中華帝國在面對世局發生大變化時，有先天上無法立刻適應的問題。此外，由於清朝是滿人做為統治階級來統治以漢人為主體的中華帝國，為了要讓統治階級保有優勢，清朝實行滿漢二元任職制，使六部的堂官和其他重要官職設定滿人、漢人各一，並在戰略要地大量安置旗人，此舉顯然不利於漢人在官僚體制中的地位。

在與地方的關係上，清朝最低的行政單位是縣和所，[18]平均七至八個縣成為一個府，七到十三個府成為一省，省通常由一個巡撫擔任，但他同時受到管理幾

---

[12] 六部即「吏、戶、禮、兵、刑、工」，分別擁有官員任命、財政收入、教育考試、軍事國防、司法考察、地方建設等職能，其中吏、戶、兵又較為重要，各部按其職責共同處理與國家有關的事物。

[13] 韓書瑞、羅友枝，前揭書，頁 5-7。

[14] 然而在軍機處設立之後，內閣地位下降，逐漸變成虛設。

[15] 六部中的「刑」部同樣也有司法權，類似法院的職能，但大理寺可以否決刑部的司法決議。

[16] 基本上明代以後的科舉考試都是由最底層的生員（即秀才，府一級），再上到舉人（省一級），最後是進士（國家一級）。

[17] 清朝康熙年間事實上有發現八股文的缺陷，然而當時因部分漢人抗議而未能廢止。八股文讓考生最後專注在詞藻的華麗上，而忽略四書五經的內容本質。科舉制度真正沒落，始於鴉片戰爭後，傳統科舉制度凸顯出中國與世界嚴重脫軌，西學開始盛行後才被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不過由於科舉制度深得民心，科舉一直到 1905 年才正式廢除。

[18] 「所」是只有在需要特別警戒的戰略重地才會設立的行政單位。

個省的總督監督。[19]這種相互重疊的管轄、獨立的監察體系和模糊的官僚體制界線是中華帝國的官僚制度的特點，這種體制在當時可說是相當完善的。這是因為中華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在管理上有類似的困難，同樣因為國土遼闊，中央難以完全控制地方。由於地方的菁英勢力龐大，中央政府必須與其保持良好的關係，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尊重地方的意見。

（三）政治結構比較

將兩國的政治結構做一比較，可以發現兩個帝國都屬於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但是兩國對於地方的掌控都是有限的。俄羅斯帝國的做法，是給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權力，但這也造成地方貪腐嚴重，俄國中央雖會派官員前往視察，然而實際效果有限。中華帝國實質上一樣得重視地方，不同的是通常領導地方的菁英都是自己家鄉的傑出人士，因此雖然有貪腐產生，但實際上地方確實有積極地進行地方建設。

至於官員的任命方式，俄國斯帝國傳統上主要是從受良好教育的貴族中選出，加上農民受教育程度低，受教育的資源也不多，因此即使不是貴族，也是農民以外的等級任命官員。而中華帝國則是用科舉的制度選拔，不論是平民或是上層階級都有可能擔任高官，即使無法依靠考試來取得官位，也可透過買官的方式得到地方官員的職務。但必須承認，由於大清帝國是由少數民族統治，因此在官員的分配上是滿漢各半的二元制，對主體民族而言並非是公平的政策。

行政機構方面，由於國家事務龐雜，不可能只靠皇帝一人決定所有事物，兩個帝國都有官僚式的機構協助處理，如俄羅斯帝國的大臣會議（或大臣委員會），中華帝國的軍機處和內閣等，都是協助國家內政、外交的重要機構。立法事務方面，俄國有國務會議做立法諮詢，改革後又有國家杜馬，中華帝國則沒有特定的機構做立法的討論，而是將其放入「內政」事務類，法律同樣由行政機構所決議。

[19] 韓書瑞、羅友枝，**十八世紀中國社會**，頁 6。

不過在監察方面，則俄羅斯和中國分別有參政院和都察院等機構監視官員和地方事務。至於司法權，俄國參政院有最高司法權，法院也擁有司法權，中華帝國則是大理院有最高司法權，而六部中的刑部也有司法權。

表 3-1：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政治結構之比較

	政治運作模式	官員任命方式	中央與地方關係	重要機關
俄羅斯帝國	中央集權官僚制	沙皇選出貴族或菁英擔任	給予地方高度自治權力，中央派員監督	行政：大臣會議（大臣委員會）、各部門（帝國最後增為 12 部）、參政院； 立法諮詢：國務會議、特別委員會 司法：參政院、法院； 監察：參政院
中華帝國	中央集權官僚制	科舉制度產生（較為公平的考試）；八旗制度選出（只任命旗人）；滿漢二元制	地方自主權力高，中央必須重視和依賴地方勢力，中央派員監督	行政：內務府、軍機處、內閣、六部； 立法：與行政重疊 司法：大理寺、刑部 監察：都察院

（表格：筆者自製）

二、軍事結構

（一）俄羅斯帝國

俄羅斯的軍事方面有幾項特色，其中最明顯的特點是軍隊人數不斷增加，這是由於俄國作戰時常常沒有足夠的人力。18 世紀初時，全國總兵力有 27 萬人，到了 18 世紀末成長至大約 50 萬人，[20]1850 年時又成長至 85.9 萬人，[21]在 1874

[20] 戴逸、張世明 著，**18 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軍事卷**（北京：遼海出版社，1999 年），頁 55。
[21] 大衛．麥肯齊、麥克爾．科倫 著，蔡百銓 譯，**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505。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年俄羅斯由募兵制改為徵兵制後，軍隊人數又持續成長。然而，這些帝國的士兵主要是由農奴所組成，通常未受到良好的訓練與待遇，致使俄國沒辦法組成有效的後備制度。

換言之，雖然在 1874 年俄羅斯改為徵兵制後，確實有改善俄羅斯軍隊的人力問題，但軍隊還是有訓練不足的問題。例如，在 1914 年俄羅斯的現役軍人（active army）約有 140 萬人，後備軍人（active reserve）約有 260 萬人，而地方上的民兵（militia）則有 600 萬人，[22]但地方上的民兵少有受到專業的軍事訓練。而且俄國的軍事傳統相當重視對沙皇的忠誠（loyalty）甚過軍事的競爭力（competence），使得軍隊常常只是為了讓沙皇檢閱而努力，而不是針對實戰做訓練。不過這和俄羅斯多民族的特性有關，俄國因為是多民族的國家，帝國事實上很擔心各地軍人不效忠國家。[23]如 Fuller 所形容：

「俄羅斯並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多民族的帝國，以效忠於羅曼諾夫王朝的方式來結合成國家，而不是像有些國家是用抽象的崇拜方式來凝聚。」[24]

另外，領導層的訓練和數量也是不足的。由於俄國軍官的薪水並不高，無法吸引有才識的人領導，軍官的領導能力不足，甚至還會貪污和欺壓士兵，使得官兵之間存在許多潛在衝突，導致俄國的軍事無法發揮有效的戰力。

除了缺乏人力與訓練外，俄羅斯帝國也常常沒有足夠的軍事預算，使得軍隊的武器裝備和軍事上所需的基礎設施都不足。俄羅斯帝國的武器裝備，和西歐各國比較起來，雖然質量還算相當，但在數量上處於明顯劣勢。軍事所需的基礎交通設施也是不足的，俄羅斯帝國幅員廣大，但鐵路卻不夠發達，尤其在擴張遠東

---

[22] William C. Fuller, Jr., "The imperial army," in 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Ⅱ Imperial Russia,1689-1917*(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45.

[23] Mark von Hagen, “The Limit of Reform: The Multiethnic Imperial Army Confronts Nationalism, 1874-1917,” In David S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 & Bruce W. Menning ed., *Reforming the Tsar’s Army: Military Innovation in Imperial Russia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Revolution*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35-40.

[24] William C. Fuller, Jr., "The imperial army," *op. cit.,* p.548.

地區後，更凸顯俄國軍事預算的問題，例如日俄戰爭時期，俄羅斯只有一條西伯利亞大鐵路可以到遠東打仗，不但無法有效運輸軍隊，也造成補給上的困難，造成俄羅斯在遠東地區也面臨嚴重的軍事威脅。[25]

海軍較強亦是俄羅斯帝國的軍事特色之一。由於海軍是俄國相當重視的議題，所以即使俄國軍事預算不足，海軍還是有所發展。雖然在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前，當西歐已經使用蒸汽機發動的軍艦時，俄國海軍還是以木製船為主，甚至還沒有一艘新式主力艦。[26]但俄羅斯帝國是相當重視海軍的，尤其帝國後期受到帝國主義影響，認為海軍強大才能進行侵略。因此儘管國家財政有問題，還是努力製造艦隊，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建造海軍的預算約佔軍事總預算的 40%。並且艦隊裡增加了潛水艇，除了原有的波羅的海艦隊和黑海艦隊外，在遠東也成立了太平洋艦隊。然而，在日俄戰爭時，俄國艦隊受到重挫，證明除了船艦硬體本身有需要改善的問題外，軍事的行政效率和訓練確實是有缺陷的。

事實上，俄羅斯帝國本身在對外戰爭失敗後，都有意識到這些問題，也有想積極改革。例如，亞歷山大二世的軍事改革，主要就是向西方國家學習，並發展與軍事有關聯的基礎設施和工業，如鐵路、汽船、電報等軍事工業。在 1860 年代至 70 年代，俄國主要作了以下的軍事改革：首先，是將俄國的兵制由募兵制改為徵兵制，擴大兵源，幫助俄國解決軍隊人力不足的問題；另外，建立軍區，加強地方指揮能力，以減輕中央的負擔；第三，改進武器裝備，除了向外國進口外，也有自己生產新式的武器。海軍方面也有加強，開始有現代化的裝甲戰艦，但不能遠航，且速度緩慢，不過總體而言還是提升俄國的作戰能力；最後，帝國希望加強軍事訓練，但效果不佳，主要是因為沙皇認為軍隊必須絕對服從沙皇才能鞏固其專制政權，因此軍隊重視「檢閱」甚於作戰的觀念依然存在。在日俄戰爭失敗後，俄國依然試圖改革，儘管財政有極大的困難，在 1903 年俄羅斯帝國還是挪用了 7 億 900 萬盧布作為改革的軍費，但並沒有來得及完成改革就面臨失

[25] ***Ibid.,*** p.542.
[26] 吳春秋，**俄國軍事史略**（北京：知識出版社，1983 年），頁 201。

敗。[27]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時，由於工業和科技的進步，軍隊火力比以往增強許多，但軍事發展還是很慢，這是因為此時俄羅斯帝國正忙於阻止和鎮壓國內革命的發生，而沒能重視軍事現代化的問題。

簡而言之，俄羅斯軍隊的問題，可以簡單歸結出四個原因：[28]首先，俄羅斯多半的軍隊受訓不足、教育程度低落，導致軍隊的效率不佳；第二，俄羅斯有其民族問題，各地的軍隊可能是不同的民族所組成，使軍隊內部有潛在的衝突性；其三，俄羅斯軍隊的領導層不足，這主要是因為俄羅斯帝國自從徵兵制以後，軍官的薪水被固定，然而隨著時空背景的不同，生活所需的費用增加，使得軍官的薪水不如其他職業，無法吸引高階的人才；最後，俄羅斯帝國本身財政的問題，導致其無法提供更多的軍事預算，但隨著科技的進步，各國的軍事預算需求是增加的，導致俄羅斯無法跟上西方各國的腳步，此外，同樣由於經費的不足，俄國基礎運輸設施不發達，在廣大的國土上無法有效的運輸軍隊到需要的地方。

（二）中華帝國

大清帝國的軍權是由皇帝所掌握，在 18 世紀時建立軍機處後，提高了軍事行政事務的效率，並增加軍事的機密性。其軍事力量，除了前文提到的八旗軍，還有所謂的「綠營兵」，綠營兵是由漢人所組成的軍隊，主要來自於前朝歸附的軍隊，因為用的旗幟是綠色而得名，屬於各省督撫控制，由各省提督統領。[29]根據史家的考證，八旗軍大約有 20 萬人，而綠營軍約有 60 萬人。[30]事實上，滿洲的興起，可說是全仰賴八旗軍的武力，不過，滿清入關後，八旗軍就因為安逸而日漸失去力量，例如大清大國在處裡三藩之亂時，綠營才是實質的主力。事實上，

[27] 德國選擇在 1914 年向俄國發動戰爭，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在俄羅斯軍事改革完成之前給予重創，贏得勝利。

[28] 這裡筆者主要參考 William C. Fuller 的論點，請參考：William C. Fuller, Jr., "The imperial army," *op. cit.,* pp.545-550.

[29]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10。

[30] 戴逸、張世明，**18 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軍事卷**，頁 54-55。

雍正、乾隆時期綠營在實質上已經取代八旗，成為主力。[31]而八旗軍和綠營兵到了滿清後期，都已經漸漸腐化，紀律渙散、裝備落後，無法成為保護中華帝國領土的主力。大約在 18 世紀末開始，中華帝國就有依靠地方武力的現象，19 世紀時更能明顯發現這樣的現象，帝國透過這些地方上的武力，來幫助維持帝國的秩序，如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等。

至於海軍方面，傳統上中華帝國的海軍重要性並不高，這與中華帝國傳統的海防政策很有關聯，因為在西方各國到中國之前，中華帝國的海防只是要防止海盜騷擾，而非具規模的軍艦。當時大清帝國稱海軍為「水師」，主要有福建水師和廣東水師，據記載種類有數十種，數量有數百艘之多，但船身小且功能有限。[32]不過在自強運動時期，中華帝國軍事改革成就最高的當屬北洋海軍。19 世紀後，中國受到西方軍事的體制影響，許多體制都是移植西方。[33]

在兵制上，中華帝國的依照軍隊類型和時代背景有不同的兵制。大清帝國傳統的八旗制，是一種「族兵制」，也就是依照部族來做區分，並且也是軍事的單位。八旗也是兵民合一的制度，沒有戰事時會從事農耕。而由於時間遷移，八旗的下一代也繼承原有的身分，使得這種族兵制也成為「世兵制」，即世代為兵。[34]至於綠營的兵制，可以說是一種募兵制，他們是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成為軍人，但被規定沒有選擇退伍的權力，必須從事軍人為職直到終老。

另外，必須注意的是，大清帝國的武器裝備，在後期和西方各國是有明顯的差距。19 世紀時，中國軍事武器多半還是停留在傳統兵器為主的階段，在鴉片戰爭爆發時，中華帝國用來對抗大英帝國的槍械，還是仿造明朝時的槍械，「究形制樣式而言，與英軍相比，整整落後了 200 餘年。」[35]此外，由於槍械的數量不足，也無法像西方的槍械可以裝上刺刀，以及軍隊訓練上都還停留在原本的訓

[31] 同前註，頁 75。
[32]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頁 39-41。
[33] 戴逸、張世明，前揭書，頁 33。
[34] 同前註，頁 37-39。
[35]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頁 34。

練方式，都被認為是無法抵抗西方軍隊威脅的重要原因，一直到甲午戰爭後，中華帝國才有具規模地模仿西式的陸軍出現。

（三）軍事結構比較

將兩國的軍事結構做一比較，可以發現兩國都是以陸軍為主的國家，但是軍事上卻有兩大問題。首先，兩國軍隊實力較弱，俄羅斯有軍隊人力不足的問題，而中華帝國有軍隊無力作戰的問題，其兩國軍隊在訓練上都明顯不足，惟俄羅斯帝國的正規軍隊還是有一定的作戰實力，後備軍和民兵的訓練無法發揮明顯功用，而中華帝國的八旗、綠營到後期都已無作戰能力，反而是地方的鄉勇比較有抵禦的能力。第二，俄國和中國的武器裝備較為落後，兩國的軍事預算都不足以應付科技越來越強的軍事武器，新的軍事裝備需要更高的經費，預算不足的情形下只能擁有較差的裝備，或是造成裝備的數量有限，使得兩國的武器裝備均落後於西方列強。此與兩國的財政收入有很大的關係，在西方各國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之下，兩個帝國都不再能被稱作是富有的國家。

海軍方面，俄羅斯帝國比中華帝國更早重視海軍，這與兩國的政策很有關係。俄羅斯帝國傳統上施行擴張政策，國家有能力時會進行領土擴張，加上帝國主義的影響，加深俄羅斯想向外擴張領土和領海，而要想擴張領土，在當時勢必需要依賴海軍作為後盾，因此俄羅斯帝國相當注重海軍的發展，並將許多重要港口設置軍艦，如黑海艦隊、波羅的海艦隊，以及在遠東的太平洋艦隊。中華帝國方面，傳統上海軍對其而言是防禦外來的海盜或武裝商人，因此海軍的設置原本只是保護領土的作用，作戰能力有限，如福建水師、廣東水師等。但由於和西方國家發生戰事後，始發現海軍的重要，開始創建艦隊，如北洋海軍、南洋海軍等。然而，不論是俄羅斯或中國，海軍都敗給同樣經由軍事改革而成立的日本海軍，證明兩國的海軍實力還是不如其他強國。

兵制上俄羅斯是由募兵制轉為徵兵制，暫時解決了軍隊人數不足的問題，而中國的八旗軍從族兵制演變成同時是世兵制的制度，至於綠營則屬募兵制。我們在這裡無法推論何種兵制較為優良，因此只能做事實上的敘述。然而在武器裝備上，很明顯兩國的武力都是落後於西方國家的，其中中華帝國又比俄羅斯帝國落後。兩國由於軍事力量的不足，自然在對外戰爭中都難以抵抗其他國家的攻擊，不論是俄國或中國的學者，多半都將帝國對外戰爭失敗的原因主要歸咎於軍事因素。[36]

表 3-2：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軍事結構之比較

	陸軍	海軍	兵制	武器裝備
俄羅斯帝國	現役軍人； 後備軍人； 地方民兵	黑海艦隊； 波羅的海艦隊； 太平洋艦隊	1874 年後由募兵制轉為徵兵制	落後於西方各國
中華帝國	八旗軍； 綠營兵； 地方鄉勇	福建水師、廣東水師； 北洋海軍、南洋海軍	八旗原來是族兵制，後來也是世兵制； 綠營屬募兵制	落後於西方各國

（表格：筆者自製）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36] 如俄國學者帕夫若夫認為自克里米亞戰爭到日俄戰爭，俄國的軍事問題都是戰爭失敗的主要因素，請參考：Дмит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Павло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секретные операции на суше и на море* (Москва: Материк, 2004), стр.348. 另外，中國學者茅海建也認為中國的軍事制度未能及時改善，使得鴉片戰爭後的對外戰爭依然無力抵抗，請參考：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頁 566。

第二節　經濟社會結構之比較

一、經濟結構

（一）俄羅斯帝國

有關於經濟結構方面，俄羅斯帝國是個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國家，在 18 世紀時就是以農奴制來進行農業生產。農奴制的建立，和當時農業經濟生產效率低落有很大的關連。傳統上，由於氣候的關係，農業生產量低，造成農民通常只求溫飽，並不注重提高農作物生產量，勞動日數過低。例如在 1850 年以前，農奴一年大約有 230 天不工作。[37]農奴勞動低，使貴族地主們採取壓迫的方式，逼迫農奴工作，讓農業產值能提升一些，加上農奴的教育程度普遍低落，通常對於貴族和地主有敬畏之心，漸而對地主言聽計從，奴化的情形越趨嚴重。簡而言之，地主對農奴的權利，很多都是約定俗成的。農奴必須依附主人，被限制住所和等級，財產和民事權利受到嚴重限制，就業也受到限制，是缺乏社會保障的一群體。

農奴對國家和對地主分別有不同的義務，對國家上，農奴必須繳納稅金，通常是按照人數來徵收的人頭稅，並且需要提供軍事服務。對地主方面，則必須繳納地租或是服勞役。相較於農奴，貴族和地主事實上對國家沒有義務，也不需繳稅。此外，俄國由於地廣人稀，勞動力的價值高於土地的價值，因此農奴才是地主資產的象徵，這點和中華帝國相當不同。1858 年，俄羅斯帝國約有 2,250 萬名農奴，約占當時全國總人數的 37.5%。[38]

但 1850 年代以後，由於科技的提升，這種農奴制度不能滿足農業生產的需求，加上國家開始重視農奴的權利，盡量要求貴族和地主不能責罰農奴。而當地

---

[37] 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米羅諾夫 著，張廣翔 等譯，**俄國社會史（上卷）：個性、民主家庭、公民社會及法制國家的形成（帝俄時期：18 世紀至 20 世紀初）**，頁 417。
[38] 周雪舫，**俄羅斯史**（台北：三民書局，2007 年），頁 115。

主不再有強制的權力壓迫農奴時，農奴會盡可能的不工作，導致農業生產效率低落。亞歷山大二世於是決定將農奴制的廢除，使農民脫離依附地主的關係，可自由選擇居住地，和自由的社會流動，有財產權、就業自由，農民有了社會保障。但是解放農奴後，農民因為沒有新的科技來提高生產力，不懂施肥、深耕、多樣化和輪作作物，反而是再去租更多土地，增加負擔。[39]因此實際上農民還是受到控制。不過，沒有足夠土地的農民開始嘗試去開發新的耕地，或是轉而往工業發展，成為勞工。由於 20 世紀初期，政府鼓勵農民移民西伯利亞，以及透過農民銀行（Peasant Bank）鼓勵人民購買土地，1914 年時大多數的可耕地已經屬於農民。這些是解放農奴後為帝國帶來的重大改變。

工業方面，18 世紀西歐發生工業革命，俄羅斯帝國此時雖然還是以農奴制為主，但在工業上已經小有成就。[40]亞歷山大二世改革後，外資大量進入，許多工業的大財團因而興起。[41]莫斯科的企業開始領導工商業的發展，而聖彼得堡成為金融中心。在 19 世紀初期，已經有 3,000 多座工廠，工人約有 11.9 萬人，19 世紀中期，更是成長到超過 10,000 座工廠，工人增至直 56.5 萬人。[42]但此時農村人口還是佔總人口九成以上，而且生產效率低落。到了 1900 年還是如此，工人雖然成長至 237 萬人，但農業人口還是佔絕大多數，城市人口只有 13%。[43]

另外，在 1890 年以前，俄國主要還是以傳統手工業為主，但已經有一些工業基礎，尤其以紡織業、食品加工業等輕工業為重。[44]1890 年以後，國家大規模修築鐵路，開始重視重工業的發展，[45]但也造成人民稅賦變得更重。不論如何，這些舉措確定為俄羅斯帝國的工業建立基礎，到了 20 世紀初期，鐵路建設依然是俄國工業重點。

---

[39] 李邁先，**俄國史（上卷）**（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 311。
[40] 劉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國現代化研究(1861-191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89-90。
[41] 大衛・麥肯齊、麥克爾・科倫，**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665。
[42] 吳春秋，**俄國軍事史略**，頁 188。
[43] 同前註，頁 257-258。
[44]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United States: Wadsworth, 1993), p. 422.
[45] 劉祖熙，前揭書，頁 114-115。

不過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勞工的問題漸漸浮現。國家在工業成長的同時，雖然也試圖建立法律來保障勞工權益，以及改善其工作環境，但實際上遵守法令的企業很少，[46]加上此時還沒有工會的形成，勞工權利無法有效伸張。[47]直到 1906 年到 1914 年時才有明顯改善，勞工和農民的工資都有提高，並有更多的權利，社會的不平等雖然依然存在，但逐漸降低。

對外貿易方面，俄羅斯傳統以農產品出口為主。1913 年出口超過 15 億盧布，進口約為 13.74 億盧布。但是依然以農產品為主（穀物約 44%，牲口與森林產品約 22%），工業出口只佔 10%。[48]

亞歷山大二世時期決定降低關稅和引進國外的產品與資金，並修築鐵路，但也造成國家龐大赤字。[49]俄國進行現代化和工業化後，1890 年代經濟和工業發展快速，在帝國崩潰前依然快速成長，不過依然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到了 1913 年農業人口還是佔總人口的 86%，農業產值佔國家總產值的 58%。[50]此外，工業雖然成長，但工人的待遇遲遲沒有改善，導致工人罷工和抗爭頻繁。而且追求快速發展的結果，也造成國家舉債無數，人民負擔比以往更高。例如 19 世紀末期，由於國家大力推展重工業，需要資金，開始提高關稅，並提高人民的稅金，但還是欠下龐大的債務。

（二）中華帝國

中華帝國方面，同樣在傳統上是以農業為主的封建經濟體系，農業上以糧食種植為主，經濟作物以茶葉、麻、棉為主，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八成以上，[51]和俄羅斯帝國一樣是農業大國。但其制度與俄羅斯帝國是不盡相同的，中華帝國的

---

[46]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pp.426-427.

[47] Reginald E. Zelnik, “The Peasant and the Factory,” in Wayne S. Vuchinich ed., *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United Sta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59.

[48] 大衛．麥肯齊、麥克爾．科倫，**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666。

[49] 同前註，頁 569-570。

[50] 吳春秋，**俄國軍事史略**，頁 303。

[51] 廖代茂、楊會國 編著，**中華百年祭：經濟**（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 年），頁 34。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農耕的絕大部分是地主所有，包括地主、貴族和皇室等，[52]部分農民有少部分的土地，而多數農則民向這些地主階級承租土地，至少以四成的收穫，或是用勞役、貨幣、實物等作為地租。[53]主要生產小型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即傳統上「男耕女織」的工作分工，兩者結合成自給自足的經濟。[54]不過必須注意的是，由於中華帝國農業生產工具和耕作技術都沒有太大的改革，雖然在鴉片戰爭前，中華帝國在長江以南已經種植一年兩熟的稻作，但其生產力大體而言還是低的，加上每個人的平均耕地面積小，事實上每個人的農業產值並不高，甚至有無法有能力飼養牲畜（牛、馬）的農民，是用自己的力量在耕田。

至於手工業，也都是完全依賴手工生產，其品質雖然不錯，但產量也是不高的。中華帝國的手工業是為了滿足人民日常生活所需，例如建築、生產工具的製造、日常用品製造、製作服飾等，而以紡織、瓷器等最為有名。但由於手工業大多僅是為了滿足生活的需求而發展，加上中華帝國傳統上並不鼓勵工商發展，各項手工業的產值並不高。真正的現代工業化要到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進行自強運動後才漸漸有工業基礎。

關於對外貿易，中華帝國原有的貿易特色，是對於鄰近友好國家有著朝貢貿易。由於中華帝國視自己的文化和物質生活都遠比其他國家來的高，因此要求想和中國往來或貿易的國家都必須臣服於中華帝國的皇帝。若願意臣服者，依照彼此的關係，給予不同的朝貢頻率，臣服的國家會在朝貢時送上本國的禮物，而中華帝國也會給予回饋，一般而言回饋的價值都是遠高於來者進貢的禮物。這些來往的貢禮和回禮，就形成一種貿易，臣服的國家收到的禮物，也被允許交易出去，此外，在朝貢的時期，朝貢的使團通常會在中國邊界進行貿易的行為。不過西方工業革命後，來到中華帝國的外國人帶給中國商業很大的轉變，開啟了大規模的國際貿易，發展出洋行，中華帝國主要是出口茶葉和絲，鴉片戰爭後則大量進口

---

[52] David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United State: Transaction, 2013) p.85.

[53] 廖代茂、楊會國，**中華百年祭：經濟**，頁 8。

[54] 陶維達，「清季洋務運動的改革思潮(1861-1894)與越南改革思潮(1863-1895)之比較」，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頁 21。

鴉片，甲午戰爭後，進口的商品變得多樣化，棉織品反而成為主要進口物品。由於這些變化，讓原本國內封閉的市場開放，商業活動日漸頻繁，使得「自給自足」的中國成為世界貿易體系的一環。

（三）經濟結構比較

將兩國的經濟結構做比較，可以很明顯地發現兩國都是以農業為主的大國，並且以生產糧食作物為主。然而不同的是，俄羅斯的糧食是有出口國外的，相較於中華帝國則是屬於自給自足，並把多餘的生產力量（包含多餘的人力和土地）用來種植經濟作物。此外，俄羅斯帝國的農業很長的時間是處於農奴制，加上技術不良、氣候不佳，導致生產效率普遍低落，即使解放農奴，問題也依然沒有改善，反而讓許多農民生活更為困苦，甚至連貴族也受到嚴重影響。相較之下，中華帝國的農民較為自由，除了納稅之外，其餘生產為農民所有，加上氣候較為適宜農作物生長，產值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與工業為主的國家相比，經濟實力是明顯不足的，這也是為何兩國在面對西方各國的衝擊時，會致力於工業化的發展。然而，由於無法快速提升農業的產值，導致產業轉型困難重重，因此兩國在崩潰之際，依然還是屬於以農業為主的國家。

工業方面，兩國進行工業化的時間相近，都是在 19 世紀中葉以後才起步，相較於西方國家已經慢了許多，而效果也都有限，這與兩國都缺乏資金有很大的關聯。[55]在工業化之前，兩國都僅有傳統手工業，產值同樣低落。

至於對外貿易，俄羅斯帝國主要貿易對象為西歐國家，產品以農產品為主，能獲得的利潤有限。中華帝國方面，傳統上和鄰近友好國家有著朝貢貿易，是帶有政治意涵的貿易行為，對大清帝國而言朝貢只是「宣揚國威」，而非互通有無。西方各國前來貿易後，開始將中國的茶和絲出口，進口則以鴉片為主，使中國也加入了國際貿易的體系。

[55] 趙士國、劉自強，「中俄兩國早期工業化道路比較」，**史學月刊**，第 8 期（2005 年），頁 114。

經濟限制上，俄羅斯帝國最明顯的經濟限制就是農奴制，受到農奴制的影響，俄國農民不能自由流動，而農業產值也無法提高，使國家內部的經濟無法成長。不過，在亞歷山大二世進行改革之後，除了解放農奴使人口較為能夠自由流動外，還引進外資與產品進入國內，並加強基礎建設，有助於國家工業化。中華帝國方面，由於傳統觀念輕視工商業，加上不了解西方國家強盛的真正原因，一開始並沒有重視產業的轉型，停留在以農業生產為主的方式。

表 3-3：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經濟結構之比較

	農業	工業	對外貿易	經濟限制
俄羅斯帝國	農業大國；糧食生產為主；農奴制，解放農奴後依然沒有解決問題	1890 年以前依然以手工業為主，但輕工業已有基礎；1890 年後重視重工業	以農產品銷售為主，主要貿易對象為西歐國家	農奴制帶來諸多限制，農奴解放後經濟限制變低
中華帝國	農業大國；糧食生產為主，經濟作物（茶葉、棉、麻等）為輔；農民階級	手工業是為了日用品所需；自強運動後開始發展工業，但產值低、受限制	朝貢貿易；英人前來，鴉片戰爭後始活絡	傳統限制多，不利工業化和現代化

（表格：筆者自製）

根據表 3-4 的資料，可以試著分析中華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當時的經濟情況。首先，中國方面，可以發現，在 19 世紀初期，國民生產毛額（GDP）是遠高於俄國的，甚至高於鄰國日本與歐洲各國。然而這與中國人口數量有一定的關聯，因此若以人均 GDP 來看，中國在 1820 年時是當中最貧窮的國家。在 1890 年時，此時中華帝國的自強運動已到達一定階段，俄國也開始走向工業化，可以發現，中國的 GDP 和人口沒有太大的差別，只是略微下滑，但俄羅斯帝國此時的 GDP 和人口都以倍數增加，人均 GDP 也有上升。至於與兩者對照的日本和歐洲，也

有快速成長，日本由於維新運動到達一個階段，GDP 和人口同俄羅斯一樣有所成長，歐洲則由於科技進步快速且帝國主義盛行，人均 GDP 甚至是 1820 年的兩倍。很明顯，這裡只有中華帝國的經濟是沒有成長，甚至略為倒退的。

表 3-4：中華帝國、日本、俄羅斯帝國和歐洲經濟指標比較[56]

國家	項目	1820 年	1890 年	1913 年	1933 年
中國	GDP	219,000	206,000	242,000	289,000
	人口	381	380	437	500
	人均 GDP	575	541	553	579
日本	GDP	22,000	39,000	69,000	137,000
	人口	31	40	52	67
	人均 GDP	704	974	1,334	2,042
歐洲	GDP	188,000	630,000	997,000	118,100
	人口	167	271	327	362
	人均 GDP	1,123	2,324	3,044	3,260
俄國	GDP	34,000	99,000	229,000	237,000
	人口	45	107	154	159
	人均 GDP	751	925	1,488	1,493
GDP 單位：百萬美元(1990 年) 人口單位：百萬人 人均 GDP 單位：美元(1990 年)					

（資料來源：廖代茂、楊會國 編著，《中華百年祭：經濟》，頁 10。表格：筆者自製）

到了 1913 年時，中華帝國此時已經崩潰，而各經濟指標還是只有略為上升，且人均 GDP 還是沒有比 19 世紀初期高。這與中華帝國之後面臨多次對外戰爭有關，將在下一章再作探討。俄羅斯帝國方面，GDP 又繼續成長數倍，而人口也有穩步成長，人均 GDP 也與同年的日本相近。可以發現，俄羅斯帝國的經濟成長情形是比中華帝國良好許多的，但是與歐洲國家相比，可以發現俄羅斯無法追趕上歐洲各國，不論是 GDP 或是人口，都不到歐洲各國的一半。因此可以想見，中華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內部的經濟壓力是很高的，中國此時看到鄰國日本的快速

[56] 本表資訊僅是估計值。

成長，而俄羅斯則看到歐洲的快速成長，或許是促使兩國政府改革以及人民反抗的因素之一。

二、社會結構

（一）俄羅斯帝國

18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俄羅斯帝國的社會結構，主要可分為「等級社會」和「過渡到階級社會」兩個階段，[57]大致可將 18 世紀末期到 19 世紀中葉認定是等級社會，19 世紀 60 年代至 20 世紀初期是由等級社會過渡到階級社會。俄國的社會等級，主要有貴族、僧侶（教士）、城市和農民四個等級，貴族可以擁有領地和農奴，通常也有官階，貴族等級者通常積極參與政治和國家事務，被視為是高貴的等級；[58]僧侶等級則可分為「修道院僧侶」和「教堂僧侶」兩種，最明顯的差別在於可否結婚，修道院僧侶不能結婚，但在宗教上是有領導的地位，約占僧侶等級的一成人口，並且由於僧侶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文化，擁有很高的自治權，他們也是享有特權的一個等級，並且通常受到很高的教育；[59]至於城市等級，則包括商人、市民、手工業者等等，都是居住在城市裡，他們必須繳稅和負擔義務，但他們有在城市進行工商業的特權（一直到 19 世紀前期時才失去壟斷權），並准許他們成立自治公社，即他們有城市的自治權；最後，關於農民等級，其內部一樣細分很多層級，大體上可分為耕種國家土地的國有農民，以及歸屬貴族和地主的農民，通常國有農民比較自由一點，但也是備受限制。[60]事實上，農民一直是

[57] 依照米羅諾夫的定義，等級社會指的是一個社會中各等級的職能在法律上有明確的定義，權利基本上是世襲的，例如俄羅斯帝國的法典在 1832 年明定有貴族、教士、城市和農民四個等級。而階級社會，指的是在職業、收入、權力和社會影響力皆不同的各大團體所組成的社會。請參考：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米羅諾夫，**俄國社會史（上卷）**，頁 66-70。

[58] 貴族中還會依照其收入、財產、教育程度和威望來細分數個階層，因此存在富有貴族和貧窮貴族的差別。

[59] 然而事實上，俄羅斯帝國的貴族是輕視僧侶的。

[60] Geroid T. Robinson,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A History of the Landlord-Peasant World and a Prologue to the Peasant Revolution of 1917* (United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 p.65.

俄羅斯帝國人數最多的等級，但權力卻是最小的，並沒有享有特權。不過，在1860年代後，由於改革的關係，各等級逐漸失去其特權，法律地位接近，雖然基本上還是等級社會，但已經朝階級社會的方向前進，例如僧侶等級者開始尋求其他職業，而城市等級者轉而成為企業家或是工人。此外，貴族的地位開始下降，商人的地位漸而提升，「1895年，在尼古拉二世加冕儀式上，莫斯科商人不僅拒絕站在貴族後面，而且堅持站在前排，他們的要求被滿足，加冕儀式被更改。」[61]這是由於改革後貴族失去農奴，並且失去許多土地，加上不善經營管理，財產急速下滑，地位也隨之下降。

社會流動上，俄羅斯帝國存在跨等級的流動，不過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的流動並不大，主要是僧侶和農民等級流出，流入貴族和城市等級，一般而言是僧侶等級流入貴族或城市等級，而農民等級流入城市等級。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雖然跨等級流動人口是增加的，但主要流動的方向卻沒有改變。

民族議題上，俄羅斯帝國是多民族的國家，這與該國的歷史有很大的關聯，俄國透過領土擴張來增強自己的國力，但在領土擴張的同時，也造成更多的各地民族進入帝國的體系。如果擴張的地方原本就是民族國家，那麼俄羅斯帝國會和其有類似條約的約定，而如果是還沒形成國家的民族，那麼俄羅斯帝國也會給予其高度的自治權，前提是他們必須忠於中央政府。[62]這些少數民族不會成為農奴，男子也不需要入伍，並且享有較少的稅金和享有優惠政策。不難看出，俄羅斯帝國對待其他民族是較為寬容的，甚至可以任命少數民族的菁英為官員。俄國的民族政策，在1830年以前，俄羅斯採取相當寬容的政策，主要是希望俄國社會能夠穩定和安全，但在1830年和1863年發生波蘭起義，使得俄羅斯帝國在1863年後開始強行推動「俄化政策」，也就是希望對少數民族同化，如禁用民族語言授課，希望把各民族都能同化成為統一的俄羅斯民族。當然該政策並沒有成功，不過這項政策確實使1864年至1905年之間大多數的新興民族運動受到限制。至

[61] 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米羅諾夫，**俄國社會史（上卷）**，頁131。
[62] 同前註，頁13-15。

於歷史存在較久的民族運動，如波蘭人、亞美尼亞人的上層階級，反而更加反對俄國，加劇其革命運動。

在家庭生活方面，一般認為俄羅斯帝國是以小型家庭為主，所謂的小型家庭，就是由父母或父母與未婚子女所組成的家庭，子女婚後通常都會離開父母另組家庭，這與中華帝國的宗法制家庭相當不同。不論是農民、僧侶、城市或是貴族等級，也都是以小型家庭為主。[63]在家庭關係上，基本上女性要服從男性，晚輩要服從長輩，而全家人都應該服從一家之主。很明顯，婦女的地位非常低，而子女必須對父母言聽計從，通常人口越多的家庭（部分屬於複合式家庭的農民家庭）越有這種情形，例如在管教上，有權力的男性通常會採取嚴格且暴力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妻子和子女，有時在家庭關係上充滿緊張。但 19 世紀中葉後，許多複合式家庭漸漸轉為小型家庭，家庭關係由專制變成較為民主。貴族家庭由於主要都是小型家庭，但也是妻子服從丈夫，子女服從父母的型態，管教上也是相當嚴格，父母和子女之間很少有真正的感情。[64]

最後，在宗教議題上，俄羅斯民族主要是信仰東正教，其他少數民族則各自信仰不同的宗教。一般而言，無論等級，帝國的俄羅斯人皆虔誠地信仰東正教，即便是沙皇亦是如此。

（二）中華帝國

中華帝國的社會結構，除了貴族外，仕紳（Gentry）、地主也是屬於上層階級，尤其貴族和仕紳和皇帝或政治權力中心有密切的關係，仕紳、地主又和人民有著密切的關係，所謂的仕紳，包含傳統的知識份子與退休的官員，在地方上，有使上層階級和人民聯繫的作用，在中華帝國的傳統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仕紳不一定有官職，但在地方上擁有一些特權，例如不用負擔勞役，不用向官員下跪等。同時仕紳也會進行地方建設，興辦地方教育，召集團練保衛地方等活動，通

[63] 但必須注意的是農民家庭也存在許多複合式家庭，城市家庭也有很多屬於單身家庭。
[64] 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米羅諾夫，**俄國社會史（上卷）**，頁 258-259。

常地方仕紳是為自己的家鄉服務，在地方上和人民的關係通常是融洽的，有時也代表著多數的民意，和執政階級者有溝通與協調的作用。[65]至於一般人民，主要以農民階級為主，有的農民會兼做手工業或是商業的活動，不過更重要的，是中華帝國的階級流動是頻繁的，不論是下層階級向上流動，或是上層階級向下流動。中華帝國的社會有一種觀念，就是認為農民出身的男性，也有可能成為國內重要的官員。透過科舉的做法，讓大多數的男性可以有機會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此外，大清帝國也允許人民用捐錢的方式買到官職，使得有財力的人也能夠輕鬆改變自己的階級。不過，在上層階級的人們，可能會因為子女分家後財產的繼承問題，[66]而無法保證這些人能一直待在上層階級，最後甚至可能會向下流動。

在民族議題上，由於大清帝國的統治階級屬於少數民族，這讓統治者在政策上有著矛盾，一方面，他們不希望自己的文化受到影響，但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能夠融入群體之中。不過在長期的統治下，事實上滿人是漸漸被漢人所影響，並且在統治的效果上也較容易成功。[67]

中華帝國的社會還有項特色，即重視家庭觀。家庭是中華帝國基本的社會單位，其組成除了血緣和婚姻關係外，也可能來自收養。家庭內部有共同的財產，而由於中華帝國是父系社會，父親在家庭中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家庭的組織和財產的繼承，都是由父系成員決定，家族成員中也以男性較為重要。中華帝國的家庭觀強調倫理，成員中必須尊敬長者，而長者也對晚輩有照顧、提攜的責任。對於個人而言，家庭提供生活上的保障，而越富有、越強大的家庭甚至會成為地方上的重要勢力。但家庭也具有排他的性質，即不同的家族之間，彼此會相互競爭或排擠對方，因此不利於社會和諧。

有關宗教議題，中華帝國基本上是允許多元文化的存在，並希望能夠達到公平。中華帝國的宗教發展，以道教、佛教和民間信仰為主，並且都得到執政者的

---

[65] 摩爾 著，拓夫 譯，**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頁 166-168。

[66] 由於中華帝國允許男性娶妾，通常有財力的男性會娶更多的妻妾，這也造成之後的財產繼承分配容易出現問題。

[67] 韓書瑞、羅友枝，**十八世紀中國社會**，頁 14。

鼓勵。而在中國各地，還有伊斯蘭教、西藏喇嘛教、和有些滿人會進行的薩滿教也都得到保護，並沒有特別的反對，可以說，中華帝國的宗教信仰是較為自由和多元的。事實上，西方各國在地理大發現後到中國進行的傳教活動，一開始也沒有遭到執政者明顯的反對，但涉及到政治議題時，統治階級就會打擊宗教。這是因為，中華帝國的政治權力是高於宗教的，執政者希望透過宗教來安定社會，可是一旦宗教勢力想挑戰政治權力時，就容易遭受統治者的打擊，這點和俄羅斯帝國是完全不同的。

（三）社會結構比較

首先，可以發現俄羅斯帝國是個等級社會，而中華帝國是個階級社會。俄羅斯主要有貴族、僧侶、農民、城市四個等級，而中國則是由貴族、仕紳、地主所構成的上層階級，而由農民、工人、商人所構成的下層階級。俄國的等級社會不利於社會流動，容易阻礙社會的進步，而中國的社會流動較為容易，使得有能力的人才不但可以改變自身階級，也可以促使國家發展。至於地區流動上，儘管兩國都是國土廣大的國家，然而俄羅斯帝國受到地形和氣候的影響，運輸基礎設施不完善，民族問題和農奴制度，使人口之間的流動受到限制，也沒有流動的誘因。反觀中華帝國，除了少數邊疆地區外，各地的人口流動頻繁，有助於地方社會的了解與和諧。

家庭方面，俄羅斯帝國以小型家庭為主，即使是貴族亦是如此，子女在結婚後會另外成家，財產也會因為男性長者死亡而分產。中華帝國則主要為宗法制的家庭，而且通常勢力越大的家族越重視家庭觀，使得容易凝聚勢力，親子關係較為良好。不過兩國的家庭都是以父權為重，即男性擁有主導地位，婦女的地位不高，而年長者又比年幼者地位高。

民族議題上，兩國都是多民族的國家，然而俄羅斯帝國的民族問題較為嚴重。這是由於俄羅斯主體民族以外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習慣，反觀中華帝

國的主體民族在許多層面上或多或少將其他民族同化了。即使大清帝國屬於少數民族統治，滿人和漢人確實存在一些衝突，但彼此也互相影響彼此的文化和生活，在平時是處於祥和的狀態。因此，俄羅斯帝國在社會動亂中必須更加重視各地的民族問題。

最後，在宗教上，俄羅斯信仰以東正教為主，連統治階級也相當虔誠信仰。宗教和政治常有關連性，例如克里米亞戰爭爆發的遠因之一，就是俄羅斯希望同樣是信仰東正教的希臘人脫離土耳其獨立。而中華帝國的宗教信仰上是多元的，以道教、佛教和民間信仰為主，然而在中國，政治和宗教的關聯性是不高的，甚至可以說，宗教只是政治的利用工具，在不利於自己的時候會禁止。例如雍正時期由於教士干預政爭而禁止西教傳入，而慈禧曾想利用義和團來對抗西方各國。

表 3-5：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社會結構之比較

	社會等級/階級	等級/階級流動	家庭	地區流動	宗教
俄羅斯帝國	貴族（通常也是地主）僧侶（教士）；農民（包含農奴）；城市	有，但較少；農民跨等級流動較為困難	小型家庭為主，子女結婚後分家	地區之間受地形和氣候限制難以流動，農奴階級沒有遷徙自由	俄羅斯人信仰東正教為主；宗教和政治有密切關係
中華帝國	貴族、仕紳、地主（上層階級）；農工商（農民階級為主）	除了較下等的階級受限制外，其餘階級可透過科舉或捐官自由流動	宗法制家庭，重視家庭觀，家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大家族常多代同堂	地區之間可以自由流動	以道教、佛教和傳統民間信仰為主，宗教多元且較自由；政治權力高於宗教

（表格：筆者自製）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三節　改革成效之比較

俄羅斯帝國後期曾有二次重大改革，其中亞歷山大二世（Aleksandr Nikolaevich；俄文：Александр II Николаевич）從 1861 年開始實施許多改革，例如對俄羅斯帝國的法律、地方政府、農奴制度、軍事制度等議題進行大力改革，尤其廢除農奴制度是其最重要的改革行動。另一次則是尼古拉二世期間，在帝國崩潰前的大改革，主要是針對議會與立憲等政治體制上的改革。中華帝國方面，後期也有二次重大改革，分別是自強運動（或稱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或稱百日維新），[68]但基本上可以說都是失敗的改革。由於時間點較為相近，本文首先敘述亞歷山大二世改革與自強運動，再將尼古拉二世時期的改革與戊戌變法一同敘述，最後將此四次改革的成效作一綜合性之比較。

一、亞歷山大二世改革與自強運動

1649 年俄羅斯帝國確立了農奴制度，俄國農民失去自由，農奴沒有辦法受高等教育，地主可以任意鞭撻或監禁農奴，甚至可以當作牲畜買賣。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 Pavlovich；俄文：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雖然曾下令禁止，但還是無法阻止，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 Pavlovich；俄文：Николай I Павлович）也只能禁制地主將農奴全家人分開出售。[69]但在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後，亞歷山大二世決定要改善農民的生活，1856 年，沙皇說：「自上廢除農奴制度要比等待農民自下廢除來得好。」[70]1861 年 2 月頒布〈農奴解放令〉（The Emancipation Reform of 1861 in Russia；俄文：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реформа 1861 года），此令有 17 份文件，針對農奴的自由提供法律上的保證。例如，在關於人身自由上，《關於脫離農奴

[68] 事實上在八國聯軍之後，慈禧於 1901 年有施行變法，史家一般稱為「庚子後新政」，和原本戊戌變法的理想相似，較特別者為設立北洋警察和 1905 年廢除非人道刑罰，但由於其主要改革內容成效不彰、影響有限，動機偏向對外國人虛應故事，因此本文未予細談。

[69] 蕭文煜，「恐怖主義與晚期俄羅斯帝國民粹派革命運動之研究(1861-1917)」，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俄羅斯研究組碩士論文，2012 年 1 月，頁 51。

[70] 周雪舫，**俄羅斯史**，頁 114。

依附關係的農民的一般法令》（以下簡稱〈一般法令〉）規定，脫離農奴身分的農民，享有其他自由農民同等的權利。至於財產權方面，〈一般法令〉也規定，農民可以擁有不動產和動產作為私人財產。

圖 3-1：亞歷山大二世像

（圖片來源：“АЛЕКСАНДР II НИКОЛАЕВИЧ,”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http://www.pravenc.ru/text/АЛЕКСАНДР%20II%20НИКОЛАЕВИЧ.html>）

雖然解放令讓農奴脫離地主的束縛，但仍必須要為地主執行「傳統服務」兩年，此外，農民由於獲得土地配給，必須繳內補償金來彌補地主的損失，在未還清補償金前由村社負責監督農民，且必須在 49 年內還清。家事奴因為沒有土地，可以立刻獲得自由。至於國有農民，可以獲得之前所有耕種的土地，但必須繳納更高的地租。這些規定讓農奴相當失望，因為所分到的土地比原有的耕地小，讓大約一半的農民不足以維生。另外還得負擔一筆補償金，甚至無法再使用地主的

森林地或牧草地。[71]因此，農奴得先持續兩年的過渡期，接著必須要繳清補償金後才能真正獲得自由。很明顯，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並沒有帶給農民實際上的幫助，地主和貴族依然有著影響力。[72]此外，這項改革也帶給貴族和地主很大的經濟危機，這是因為解放農奴後，這些特權階級原有的經濟制度解體，而原本不需要負責經濟問題的貴族，不懂得利用補償金，也不會投資，就僅是將這些補償金揮霍掉，於是一樣面臨經濟上的壓力。[73]

不過，被稱為開創「大改革時代」（Great Reform）的亞歷山大二世並非只有農奴的改革，事實上，在財政、地方行政、司法、軍事和教育等層面，俄羅斯帝國也在此時作了一些改革。首先，在財政改革上，1860 年，俄羅斯帝國建立了國家銀行，不久又建立國庫制度，使得全國預算和收支都在財政部的管理下。在地方上，也建立國家監督局，來檢查地方的收支情形，並且取消原有的私人承包稅務制，也就是稅務由國家自己徵收，這使得國家稅收大增，也有效避免地方官員的貪污行為。在地方行政上，改變原本完全由貴族擔任地方行政官員的做法，1864 年成立了自治局，由地方自治議會選出地方自治的官員，到了 1870 年，頒布〈城市法〉，允許各城市有自己的「城市杜馬」[74]，使官員較能夠了解地方上的需求，並讓地方建設大為改善。在司法改革上，主要是仿效西歐國家，改行較為公平的法律程序，並使司法獨立，但對於革命份子依然沒有公平待遇可言。至於在軍事改革上，俄羅斯帝國改募兵制為徵兵制，全國男性都有服役的義務，這使得俄國的軍事力量得到保證，但也增加人民的負擔。最後，在教育改革上，俄羅斯帝國教育風氣漸漸開放，例如大學擁有廣泛的自治權，而非貴族的子女也可

[71] 蕭文煜，「恐怖主義與晚期俄羅斯帝國民粹派革命運動之研究(1861-1917)」，頁 53。
[72] 段昌國，「社會分解下的沙皇王權與政治參與：1861-1905」，**空大人文學報**，第 9 期（2000 年），頁 114-115。
[73] 根據學者研究，雖然無法有確切的證據證明解放農奴前後農民的生活水準究竟是變好還是變差，但是可以得知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的政策是失敗的。請參考：Tracy Dennison & Steven Nafziger, “Micro-Perspectives on 19th-century Russian Living Standards,” Economics at Williams College, <http://web.williams.edu/Economics/wp/nafzigerMicroLivingStandards_WilliamsWorkingPaper_Nov2007.pdf> (29/8/2013).
[74] 城市杜馬的概念類似現今市議會。

入學，甚至開創了數間女子學校。

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相當廣泛，其帶給俄羅斯帝國的意義，誠如周雪舫所言：

「大改革的意義在於使非貴族出身的人民參與公共事務、自由思想的傳入、教育的普及、激勵輿論的發展以及平民知識份子的崛起。」[75]

自從彼得大帝西化後，加上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俄羅斯帝國邁向工業化，但社會的變遷卻和西方並不相同。俄羅斯帝國的中產階級，並沒有發展出足以影響社會的規模，而是朝向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兩個極端的發展，最後形成越來越嚴重的階級對立。此外，俄國領土廣大、民族複雜，各民族除了和俄羅斯文化有明顯的差異外，各民族之間也暗藏許多衝突。[76]

中華帝國方面，在面對內部太平天國的動亂，以及西方的船堅炮利，感受到強大的威脅，部分知識份子想要做些改革，以適應外來的變異。這些知識分子對中西之間的關係有新的了解，認為和固有「蠻夷之邦」是全然不同的，此外，外國人曾幫助大清帝國打擊太平軍，讓清朝官員認為外國人有心為善，並非只是要侵犯中華帝國。不過這時候的知識份子主要著重在外交和軍事的改革上，認為中華帝國無力對抗西方，和內部動亂無法自行解決的主要原因在於武力實力上的不足。

此外，中華帝國還存有強烈的文化優越感，無法輕易認同西方國家的一切。部分的知識份子，引用中國傳統的一些概念，如「經世致用」和「變易」等傳統觀點，將其運用在改革的思潮。[77]也就是遵循傳統文化去結合西方。如龔自珍主

[75] 周雪舫，**俄羅斯史**，頁 117。

[76] 蕭文煜，「恐怖主義與晚期俄羅斯帝國民粹派革命運動之研究(1861-1917)」，頁 76。

[77] 「經世致用」是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屬於儒家思想的一環，其思想是認為知識份子除了必須培養個人品德之外，也要把所學的知識加以應用、貢獻社會，如果不能把所學用於社會，那就缺乏學習的目的。「變易」則屬於《易經》的概念，《易經》中談到「不易」、「變易」、「簡易」三種觀點，其中「變易」認為，宇宙萬物，時時刻刻都在變化，人所處的事物亦是如此。請參考：陶

張「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些人通常被稱為「經世派」或「洋務派」，以實事求是為基礎，致力於研究實際的事物，和西方的科學觀有些近似。這種用傳統方式來認識西學，有助於減少社會上的反對勢力。例如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認為運用西學才可以和西方列強對抗。經濟方面，主張要學西方鼓勵人民從事工商業致富，嚴格限制官員參與經濟行為，經濟發展以民用與民營為主。科舉制度方面，則主張局部改革開始，例如要求考選水師的人要有造船和駕船的能力。[78]

在外交上，由於鴉片戰爭後，中華帝國和西方國家的接觸日益頻繁，於是決議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門處理各國事務，不過後來也處理和西洋有關的新政。[79]另外，由於通商口岸增加，中華帝國設置「通商大臣」職務來專門處理各口岸的事務，並且針對海關做出改革。而由於中華帝國感受到外國人清楚自己的實力，自己對西方國家則沒有概念，因此也派遣學生前往西歐各國，1866 年第一次有前往西洋的觀光團，增加中華帝國對西方國家的認識。軍事方面，以練兵和製器為重，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海軍的創建，1875 年開始興辦海軍，隔年成立「北洋海軍」，由 22 艘現代化兵船組成。而除了造船製砲外，也生產其他器物，開始設廠製造機器，民生工業，如煉鐵、紡織等工業也漸而興起。而兵輪、商輪的製造，也帶動「漕運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80]對中華帝國的政軍、社經等層面，都有所幫助。此外，由於要學習西方事物，教育也引進西式教育，如 1862 年成立教授外語的「同文館」，1866 年在同文館內再設教授天文和算學的「天文算學館」，此外還有許多教會學校，西方教育至此在中華帝國生根。

不過，經世派的觀點自然有其缺陷，最大的問題是太過注重實用和功利，導致只重視西方的物質層面的學習，而不了解其他背後的精神。自強運動失敗的原

維達，「清季洋務運動的改革思潮(1861-1894)與越南改革思潮(1863-1895)之比較」，頁 51-55。

[78] 陶維達，前揭文，頁 54。

[79]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222。

[80] 同前註，頁 234。

因主要有下列因素。[81]第一，中華帝國領土廣闊，內外戰爭不斷，很難統一全國一同改革。第二，中華帝國內部還是存有很濃厚的封建思想，並且還是有強烈的儒家思想與文化優越感，例如守舊派主張要學孟子「用夏變夷」，而非被「夷」同化。保守勢力的強勢，也使得輿論偏向保守觀念，很難吸引人才投入自強運動，甚至推動改革的傑出人才都被視為「漢奸」。第三，洋務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士，存在內部的個人衝突。例如李鴻章和左宗棠因為鎮壓太平天國時出現嫌隙，而張之洞和李鴻章原本就是朝中的政敵。加上地方的官員難以合作，例如 1894 年爆發的甲午戰爭，和日軍打仗的海軍只有北洋艦隊，南洋艦隊竟然因為害怕自己的船隊被毀而維持中立。第四，洋務派自己本身就還存有封建思想，只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了富國強兵只學習「船堅炮利」，但不明白富國強兵的背後，還必須要有健全的制度來發展和維持。

然而，這並非表示自強運動對中華帝國的改革沒有幫助。首先，軍事上中華帝國在這次洋務運動改革有了基礎，引進大型機器，可說是中華帝國軍事第一次現代化。其次，經濟上，洋務企業的興辦，讓中華帝國「稍分洋商之利」，例如上海輪船招商局和其他西方列強的輪船公司展開競爭，以及天津電報局的開辦，都顯示中華帝國經濟上保護國家的利益，並延緩中國朝向半殖民化的速度。加上採礦、鐵路、電線的發展，讓中華帝國漸漸走向現代化，此外，這時的資本主義也漸而被人們所接受，對未來的社會發展帶來很大的助益。其三，在政治上，自強運動讓越來越多人要求政治地位。最後，在教育上，自強運動培養許多新式教育下的人才，這些人出國留洋，開創留學風氣，學習許多西方事務，讓他們逐漸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對中華帝國的發展帶來正面幫助。例如赴英學習西洋海軍的嚴復，對中華帝國的北洋水師、外文館、教育帶來很大的貢獻，此外還翻譯許多西方著作，開拓中華帝國知識分子的視野。

[81] 自強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多參考陶維達之分析。請參考：陶維達，「清季洋務運動的改革思潮(1861-1894)與越南改革思潮(1863-1895)之比較」，頁 92-94。

二、尼古拉二世改革與戊戌變法

俄羅斯帝國另一個重要的改革，是在日俄戰爭的影響下，帝國即將崩潰前的改革。日俄戰爭原本是俄羅斯帝國想要用來轉移和阻擋革命的手段，然而卻在俄軍戰爭失利下讓國內各地革命四起。其中「社會革命黨」透過暗殺的方式來對抗帝國政權，[82]例如 1902 年槍殺俄國內政部長西辟亞金(Dmitri Sergeyevich Siptagin；俄文：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Сипягин）繼任的內政部長普列維（Vyacheslav Konstantinovich von Plehve；俄文：Вячесла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фон Плеве）也在 1904 年被炸死。尼古拉二世感受到高壓統治無法解決革命的問題，以及認為確實有改革必要，於是讓墨斯基親王（Dmitry Petrovich Svyatopolk-Mirsky, Prince Svyatopolk Mirski；俄文：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繼任內政部長。

墨斯基比前幾任部長都來得溫和，並且支持改革，被認為是能開啟「政府春天」的人物。墨斯基想要加強鄉土議會的權力，使其能夠真正發揮功能，於是要求各地的鄉土議會派人到聖彼得堡討論改革事宜。不過，墨斯基事實上只希望鄉土議會改革地方的問題，並不希望他們插手中央的事務，鄉土議會卻開始大談如何組織國家議會等議題。這讓尼古拉二世相當不滿，墨斯基只好取消推動鄉土議會，只允許他們分散到當地代表家中集會，進行非正式的交談。在 1904 年 11 月，其中一個集會地通過一項決議，要求政府保障人身自由、個人豁免權和民選代表擁有立法權等權力，[83]希望俄羅斯可以發展憲政體制。墨斯基於是將這項決議案轉呈尼古拉二世，希望他能同意。然而，此決議案嚴重挑戰君主專制，[84]讓尼古拉二世難以接受。為了回應鄉土議會代表的要求，沙皇召開御前會議，並讓部長會議的主席威特（Sergei Yulyevich Witte；俄文：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Витте）來

[82] 社會革命黨認為自己代表農民的聲音，以激烈的恐怖行動作為革命手段，含有濃厚的社會主義成分。請參考：郭武平，**俄羅斯的政黨政治**（台北：五南，1999），頁 16。

[83] 這些權力事實上就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不過當時為了避免尼古拉二世與其勢力的不滿，當時提出議案的人於是避免提及「憲法」二字。

[84] 該議案中聲明，現代沙皇是代表公共利益和輿論的元首，不再是過去將國家當作私人財產來管理的最高統治者。

草擬改革方案，最後決議鄉土議會代表只需管理地方事務，反對組織國家議會，但答應會盡速制訂關於言論自由、避免宗教迫害、改善少數民族生活和地方選舉改革等法案。

圖 3-2：威特像

（圖片來源：“Витте 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Академик*, <http://dic.academic.ru/dic.nsf/es/11108/Витте>）

不過，由於之後爆發「血腥星期日」事件，終止了俄羅斯帝國政治春天的機會。1904 年年底就有許多聖彼得堡的工人持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和縮減工作時數。1905 年元旦，俄國對日戰爭失敗的消息傳來，罷工工人更加激動，希望能見到沙皇，表達他們願意為沙皇效忠，一同對抗敵人，並且希望沙皇能幫助他們的生活。同月 9 日，在加朋神父（Georgiy Apollonovich Gapon, Father Gapon；俄文：Георгий Аполлонович Гапон）的領導下，約有十二萬人聚集在聖彼得堡，舉著十字架和沙皇的畫像，到沙皇居住的冬宮請願。不過冬宮附近廣場的騎兵隊，

卻突然開槍警告，人民驚恐慌亂，造成 40 人被殺，上百人受傷。[85]其他地區的請願活動也有類似的情形，事後人們稱此為「血腥星期日」。此事件也讓人民不再信任沙皇，原本在他們心中沙皇是慈悲愛民的聖父，如今則認定尼古拉二世是位「嗜血者」。[86]而在這次事件後，尼古拉二世也撤換掉墨斯基，改由布里金（Alexander Grigorievich Bulygin；俄文：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улыгин）擔任內政部長。

另外，由於 1905 年 2 月，莫斯科總督瑟爾格（Grand Duke Sergei Alexandrovich；俄文：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87]被革命黨炸死，俄羅斯帝國漸漸體認到必須向革命份子妥協。於是對外宣布承認國家能力不足，有志者可以向國家建議改革的事項，結果各地來的建議大量湧入，俄羅斯帝國無法應付，只好拖延，改革陷入無限延期。此舉讓鄉土議會的代表很不滿，1905 年 4 月召開第二次全國大會，要求沙皇頒布憲法。[88]同年 5 月，又發生參與日俄戰爭的波羅的海艦隊有水手兵變，城市的工人繼續罷工等事件，沙皇不得已在 8 月 6 日宣布組織「皇家杜馬議會」（Imperial Duma），希望能夠平息眾怒，然而卻沒有改變人民的態度。工人持續罷工，其中鐵路工人的罷工導致全國鐵路系統癱瘓，其他民生工業的工人也參與罷工的行動。尼古拉二世只好再重新任用威特，要他做部長會議的主席。威特則建議他重視民權，建立保障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等權利，召開不分種族、宗教的議會來立法，並且不要干涉議會的選舉。[89]尼古拉二世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接受改革的建議，並在 10 月 17 日公布〈十月十七日宣言〉（Manifesto of 17 October 1905，簡稱〈十月宣言〉），承認人民有「民權自由」，承諾人民有選舉杜馬的權利，並且規定法律必須經由國家杜馬的同意，但並不承

---

[85] 賀允宜，**俄國史**，頁 480。

[86] 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Хрусталев, *Романовы.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Вели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Книга на сайте: < http://bookmate.com/r#d=iqCz99Z5>, (Litres, 2013) Глава II, стр.2.

[87] 瑟爾格同時也是尼古拉二世的叔叔，也是尼古拉二世妻子的姊夫。

[88] 此會被稱為「立憲議會」（Constituent Assembly）。

[89] 當時威特告訴尼古拉二世，俄羅斯帝國只有兩種選擇：第一，是任命一個「獨裁者」，讓他高壓統治鎮壓各地的動亂；第二，是立刻採取成立杜馬議會等改革的建議。請參考：賀允宜，**俄國史**，頁 484。

諾君主憲政的體制。另外，讓部長會議的地位提昇如西方的內閣，而威特任命為主席。然而，由於沙皇對威特逼他選擇改革相當不滿，一直希望威特的改革失敗，加上鄉土議會的代表很多認為沙皇只是在敷衍他們，拒絕和威特合作。另外，〈十月宣言〉也帶來擁護沙皇者的反擊。沒多久，威特就被沙皇撤職了。

但是不可否認，〈十月宣言〉確實掀起了政黨活動，鄉土議會根據彼此內部意見的不同，分成數個政黨。[90]此外，〈十月宣言〉也造成邊區的激烈反應，波羅的海地區有農民暴動，芬蘭也有濃厚的反俄情緒，波蘭也有從未停止過的復國運動。

不論如何，1906 年俄羅斯帝國成立了上、下議院，上議院為「國家議會」（Council of State），下議院為「國家杜馬」（State Duma）。[91]1906 年 4 月 7 日，俄羅斯舉行第一次由民選產生的杜馬議會。同年 4 月 23 日，尼古拉二世公布〈俄羅斯基本法〉（The Russian Fundamental Law of 23 April 1906，簡稱〈基本法〉），即俄羅斯的憲法。〈基本法〉確定沙皇有至高無上的專制權力，另外沙皇和上、下議院共同行使權力，且沙皇有立法的倡議權和批准權，外交及人事任免等權力也都由沙皇獨攬，換言之，沙皇在行政、立法上都還是有絕對的主導權。人民的權利義務方面，規定俄羅斯公民男性必須服兵役和納稅，並承認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居住遷徙自由、財產權、集會自由、宣傳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權。[92]雖然這些法令不夠完善，且還是讓沙皇掌握大權，然而〈基本法〉確實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項突破，逐漸擺脫君主專政的制度，且促成俄羅斯朝向議會體制。

不過，由於俄羅斯帝國的作為還是無法讓國內其他勢力滿意，例如社會革命黨（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就拒絕參加杜馬選舉，並且鼓勵農民沒收地主

---

[90] 如鄉土議會大多數代表和自由聯盟（Union of Liberation）合組憲政民主黨（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古馳寇夫在〈十月宣言〉後組成的十月十七日聯盟（Union of October 17，也就是「十月黨人」），以及希望恢復君主專制的俄羅斯保皇黨（Russian Monarchist Party）、俄羅斯會社（Russian Assembly）等。

[91] 上議院計有 196 名議員，主要由沙皇指派，或是由東正教、鄉土議會、貴族、大學、商業機構中選出；下議院則根據階級和財產有不同的選出方式，城市以人民直選的方式，鄉村則是間接選舉。由於上議院缺乏民選基礎，且都屬於保守派，因此在俄羅斯憲政的地位並不重要。

[92] 賀允宜，**俄國史**，頁 489-493。

的土地，造成地方上的危機。沙皇因此認為，杜馬是國家的亂源，決定將其解散。他下令 1907 年 2 月再舉行第二次選舉，而在新杜馬選出前，尼古拉二世則依照〈基本法〉繼續治理國家，他讓內政部長斯托里賓（Pyotr Arkadyevich Stolypin；俄文：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接任部長會議主席。斯托里賓接任後，用強硬的手段對付革命者，[93]不過這種高壓方式也確實讓革命運動稍緩。此外，斯托里賓還致力土地改革，首先，他取消農民公社，讓農民和其他人民一樣有居住遷徙自由。接著，他建議沙皇釋放皇家私人土地和國家土地，並讓銀行低利貸款給農民，以解決耕地不足和分配不均的問題。第三，他用經濟利益的誘惑，發起大規模移民計畫，把歐俄地區的人民遷往西伯利亞和中亞草原區。這些土地改革計劃都受到大地主和沙皇的支持。尼古拉二世在 1906 年 11 月 9 日頒布〈農民得遷離土地公詔令〉(Ukaz of 9 November 1906, On Peasants Leaving the Land Commune, Obshchina)，規定農民停止繳納因獲得農田而必須給政府的「贖金」，可將集體土地申請轉為私有，以及可將分散的土地兼併，和擁有自由遷離土地公社的權力。斯托里賓土地改革可說是相當成功，他希望農民可以朝向自給自足的富農階級發展。[94]然而這卻讓社會革命黨相當不滿，因為這讓他們失去對農民的影響力，反而成為社會革命黨想極力剷除的人物。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93] 例如斯托里賓會用絞刑來對付革命分子，用來絞刑的繩索被當時的人們稱為是「斯托里賓的領帶」，這種毫不留情的做法也讓他威名遠播。
[94] 賀允宜，**俄國史**，頁 496-499。

圖 3-3：斯托里賓像

（圖片來源：“Столыпин, 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Академик*, <http://dic.academic.ru/dic.nsf/ruwiki/1689>）

斯托里賓的高壓政策，讓革命運動減少，社會秩序慢慢恢復，改革成功讓農民得到發展、工商業也持續成長。然而，正當國內局勢穩定、經濟好轉的情況下，尼古拉二世又想要恢復君主專政。[95]此外，原本支持斯托里賓的杜馬議員，也因為改革成功損害到他們地方上舊有勢力的利益，開始變得不配合，至於革命份子，也因為斯托里賓的高壓統治而無法原諒他。這讓斯托里賓執政受到嚴重挑戰，後來因為一次議案出乎他意料之外未被通過，意志消沉，最後遭到暗殺身亡。[96]在斯托里賓被殺後，杜馬漸漸失去它的功能，最後根本無法監督或和政府合作，再加上國內又開始動盪不安，拉斯普廷崛起，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羅曼諾夫王朝最終還是踏上了滅亡之路。

[95] 如本文第二章第一節所述，尼古拉二世堅持「傳統道德」才是俄羅斯應該要遵循的道路。

[96] 根據俄羅斯政府的調查，斯托里賓是被玻格洛夫（Dimitri Grigoryevich Bogrov；俄文：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огров）所殺，波格洛夫是猶太裔人，曾加入社會革命黨，但也有人認為玻格洛夫是政府密探，暗殺斯托里賓是政府策劃的。請參考：賀允宜，前揭書，頁 505-506。

中華帝國方面，由於甲午戰爭證明自強運動的失敗，加上西方的侵略、剝奪和滿清不斷喪權辱國的刺激下，中華帝國的知識份子開始普遍意識到帝國原本的制度必須改變。帝師翁同龢的崇儒思想亦有所改變，向光緒皇帝引薦康有為。[97]甲午戰爭失敗後，在北京參加科考的各省舉人，得知馬關條約的內容是要割台灣與遼東半島，並須賠款兩萬萬兩後，群起激憤，1888 年由康有為與梁啟超為首發動「公車上書」，作為一種請願運動，在京城帶來很大的迴響。之後，光緒廿四年（1898 年），光緒命令大臣在總理衙門召見康有為，詢問變法大計，[98]之後，光緒索取康有為所寫的《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記》等書，戊戌變法也應運而生，其主要內容可以分成四類：[99]首先，在教育改革上，所有教學機構改為兼習中學和西學的學堂，鼓勵學子出國遊學，廢除八股文取士，以實學實政為主；在經濟建設上，希望擺脫農業為主的經濟，鼓勵工商業，但也致力於發展農業，試圖用現代化的方式生產，以求增加產值；在軍事建設上，改用西洋訓練的方式練兵，裁減綠營，設立「武備大學堂」，不再重視傳統的騎射等傳統訓練；最後，政治改革上，廢除不必要的機構，以提升效率，並開放言論空間，例如創立京師報館，允許報紙直言弊端。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97] 雖然翁同龢在自己的日記與其他場合曾經否認康有為是他力薦的，但根據後人的考證與辯證後發現，翁同龢確實和康有為熟識，並且確實推薦康有為給光緒皇帝。翁同龢後來強力否認，可能是要避免戊戌變法失敗後受到波及的自保方式。請參考：賴盈如，「翁同龢對光緒皇帝之教育」，頁 83-87。

[98] 詢問者共有翁同龢、李鴻章、榮祿、廖壽恒、張蔭桓等五位大臣。

[99] 筆者在此多參考郭廷以的分類。請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361-362。

圖 3-4：康有為像

（圖片來源：「康有為」，**中文百科在線**，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lid=128285>）

不過，由於力求變法的康有為等人，以為只要光緒皇帝的支持便可順利推行，然而光緒本身的權力並不足，慈禧為主的勢力依然是鞏固存在的。在康有為等人的大改革政策下，會嚴重受到影響的守舊勢力也非常多。例如，廢八股就會讓「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100]的前途茫然，這些傳統知識份子難以接受原本應該享有的權利被剝奪，此外只能教授中學的傳統書院也勢必受到打擊。另外，為了提高效率廢除許多政府機關，也讓許多官員失去工作，這些團體和守舊勢力使得變法不如理想。不久，慈禧和其勢力發動政變，光緒被囚禁，其他為新派的重要人物，除了康有為和梁啟超外，幾乎都被捕獲罪，改革宣告失敗。

光緒所支持的戊戌變法，雖然以失敗收場，但此次改革對之後的歷史演進脈絡，還是帶有正面的影響。例如，在政治思想上，知識份子擺脫原有的科舉制度、

[100] 郭廷以，前揭書，頁 364。

八股文章等限制，開始進行思想解放，曾經參加公車上書的舉人，回到各自的故鄉後也有推動新政的作用。在經濟制度上，中華帝國開始重視工商業，不再是「重農抑商」的政治方針，獎勵拓展商業及興建工業，另外，也促進鐵路和郵政的發展。社會制度上，滿清鼓勵旗人「習四民之業」，並准許滿漢通婚，對於民族融合帶來正面幫助，此外，社會開始有議論時政的風氣，學會、學堂、報館、書局等社會組織開始興起，自此大清帝國已經可以結社論政，打破以前的限制。

三、改革成效比較

可以看出，不論是俄羅斯帝國或是中華帝國，在面臨政局不穩和對外戰爭失敗的情況下，都試圖進行改革，雖然整體而言改革幾乎都是以失敗結束，但不可否認兩國執政者都有試圖讓帝國重新振作。

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是全面性的，改革基本上都還算有不錯的成效，然而最核心的農奴解放卻是失敗收場，不論是貴族或是農民都沒有因此而改善生活情況，反而加重經濟負擔和社會不穩。至於中華帝國在相近的時間點則是進行自強運動，但是主要只著重在軍事武力上的改革，其他改革未被重視。至於尼古拉二世在帝國崩潰前的改革，則是以制度和人權改革為主，但實際上尼古拉二世本身並不希望做改變，只是當時局勢迫使他必須同意進行改革，因此一旦尼古拉二世有機會，就會收回原本的改革，導致改革失敗。同樣的，中華帝國另一次的改革也是執政階級不願真的改革，雖然戊戌變法是光緒皇帝大力支持的改革，但握有更多權力的慈禧太后並不希望改變國內各項制度的提議，加上政權上的問題，使慈禧發動政變讓光緒皇帝所推行的戊戌變法失敗。

然而，必須承認，每一次改革都還是帶給兩個帝國一定的變化。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不但改變了農奴制度，在財政、行政、司法、軍事、教育等項目也有許多重大改變，例如使國家收入增多、地方自治、司法獨立、軍隊人數提升、大學教育較為自治等。自強運動，雖然重點在軍事，但除了提升武力以外，設廠的關

係也為之後工業化建立一些基礎，並且開始興建一些現代化的基礎設施，有利於之後的改革。然而，尼古拉二世的改革和戊戌變法的成效卻比較小，雖然尼古拉二世的改革，開始改變立法權和人權，但因為執政者問題而使改革中斷。同樣的，戊戌變法雖然是大規模的改革，和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一樣屬較為全面性的做法，但卻也因為部分上層階級無法接受，一樣使改革停擺。不過即使如此，尼古拉二世時期的改革和戊戌變法都提升國內人民的民主意識，知識份子確實有更多的空間去宣傳其思想，為之後的革命帶來一定的影響。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表 3-6：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改革成效之比較

	內容	背景	成效
亞歷山大二世改革	以解放農奴為主（農業改革）； 建立國家銀行和國庫制度（財政改革）；反貪污和國家自行徵稅、地方自治、地方官員選舉（行政改革）；司法獨立（司法改革）；軍隊改徵兵制（軍事改革）；大學自治權提升、開放平民入學（教育改革）	克里米亞戰爭失敗	解放農奴失敗，其餘頗具成效
自強運動	以富國強兵為主（軍事改革）； 學習西方外交（外交改革）；派學生前往西方學習（教育改革）;興辦廠房(工業改革）	鴉片戰爭失敗	軍事改革失敗，其餘成效有限
尼古拉二世改革	重視基本人權（人權改革）；成立國家議會（立法改革）	日俄戰爭失敗	尼古拉二世收回權力，改革失敗
戊戌變法	廢除八股文和科舉制度(教育改革）；鼓勵工商業發展（經濟改革）；軍隊採用西式訓練（軍事改革）；裁減行政機構（政治改革）；開放言論自由（人權改革）	甲午戰爭失敗	慈禧等反對勢力發動政變，改革中斷而失敗

（表格：筆者自製）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探討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內部因素和改革成效，並進行比較。有關內部因素，依照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四種面向做探討。政治方面，俄羅斯帝國屬於專制國家，其軍事化和官僚化的程度相當高，主要任命貴族為官員，沙皇擁有極大的政治權力；中華帝國也是專制的國家，皇帝是完全不受法律限制的君主，重要官員的產生，可能由皇親國戚擔任，或是從科舉、捐納功名的士人中選出。軍事上，俄羅斯帝國貴族原本為沙皇服兵役，後來取消貴族的義務，於 1874 年改行徵兵制，軍事上統一為沙皇管理；中華帝國方面，原本大清帝國特有的八旗制度漸漸失去作用，以漢人為主的綠營也隨之腐敗，起而代之的是地方的鄉勇，名義上還是屬於皇帝的管轄，但地方色彩濃厚。至於在經濟結構上，俄羅斯帝國是農業經濟，儘管亞歷山大二世廢除農奴制度，可是實際的經濟情形依然沒有明顯改善，土地貴族或地主需要依靠國家的力量才能生存；中華帝國也屬於農業經濟，但中華帝國的農民有許多是向地主承租土地，或是自己擁有一片不多的土地，自己生產和製造所需的物品，可說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在社會結構上，俄羅斯帝國的特點在於農民為貴族服務，貴族為沙皇、國家服務，而僧侶（教士）因為其宗教地位極高，因此也特成一個等級；中華帝國的特點則為仕紳、地主與一般人民之間的關係，以及仕紳和君主之間的關係。

因此，研究發現，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內部因素確實有無法適應國際環境發生大改變的情形。[101]將兩國比較後可以發現，同樣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在西方工業革命後，無法在經濟實力上與之抗衡。俄國和中國的國民生產毛額（GDP）遲遲無法追上西歐國家即可為證。加上俄國社會流動並不頻繁，長期的農奴制度亦帶來限制，使其工業化進展受阻；中華帝國的社會，則因為重視農業、輕視工商業，以及傳統知識份子僵化，而不願接受外來事物，造成推展工業化和改革上

[101] 本文將國際環境歸為外部因素，於下一章節再做探討。

的困難。除此之外，本章也觀察到，由於兩國軍事方面無法滿足作戰需要，僅僅平定國內紛亂都已屬勉強，更遑論要去對抗工業革命後的西方列強。這是促使帝國加速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必須承認，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雖有其內部的問題，但執政階級確實有試圖改革，不論是出於自願或是被迫的情形。亞歷山大二世的大改革、自強運動、尼古拉二世時期的改革和戊戌變法，確實都為俄國和中國帶來不同的變化，這些細節本章已經詳談，不再贅述。重要的是，這些改革除了亞歷山大的改革有許多成效外，其餘的改革（包含亞歷山大的解放農奴運動）都可說是失敗的。除了帝國的內部問題影響改革外，在位者無法認清國際現實與無法真正了解人民需要也是讓改革無法成功的原因。這也證明兩個帝國的專制政體必須改變。但如同本文第二章所言，尼古拉二世和慈禧太后都不是願意放棄專制政體的人物，因此內部因素依然無法完全消除，改革也無法獲得真正的成功。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四章　俄羅斯與中華帝國的外部因素與人民反抗之比較

本章重點在於探討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政權崩潰的外部因素，以及兩國人民的反抗活動，並進行比較。筆者歸納出較重要的外部因素，將其分為「對外戰爭」和「思想衝擊」二層面來探討，並分別敘述兩國外部因素的相似處及相異處。關於對外戰爭，俄羅斯帝國方面，從克里米亞戰爭開始就出現政治動亂，其後的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也都帶來革命浪潮；中華帝國方面，則自從鴉片戰爭以降，國力日漸衰落，其後的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更是重創帝國實力。關於思想衝擊，俄羅斯帝國方面，自從知識份子階級形成以來，就開始有自由的思想傳入，並帶來許多西方的思維；中華帝國方面，早在歐洲地理大發現後，歐人來到中國時，就已經將西教、西學傳入，之後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也都帶給中華帝國很大的衝擊，讓中華帝國的知識份子重新思考自己本國思想和制度的缺陷。至於人民反抗活動，本文認為，人民反抗帝國是內外因素的共同影響而造成。然而，本文也認為，只有內部因素無法引發人民反抗，更重要的是還需要外部因素做為人民起身反抗的關鍵。若俄國和中國沒有對外戰爭，人民頂多只會有零星的動亂，對帝國通常威脅不大；若沒有思想衝擊，那麼即使當前執政者滅亡，也只是將原本的帝國替換成另一個帝國。是以本文將人民反抗之議題和外部因素歸為同一章。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節　對外戰爭之比較

影響俄羅斯帝國政權的對外戰爭，最早可追溯到西元 1853 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其後是 1904 年的日俄戰爭和 1917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三場戰爭都顯露出俄羅斯帝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帝國內部需要改革的問題。至於中華帝國方面，滿清晚年面對的對外戰事比起俄國要多得多。然而對其政權帶來不穩的關鍵對外戰爭，筆者認為是鴉片戰爭[1]、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由於有部分認為俄國和中國開始不穩的關鍵戰役，分別是克里米亞戰爭和鴉片戰爭，[2]而筆者也相信如此，因此第一子節先比較這兩場戰爭。第二子節則比較日俄戰爭和甲午戰爭，其最大共同點在於兩國也正好都對日本作戰失敗，並也證實之前的改革是失敗的。最後，第三子節則比較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八國聯軍，除了都是帝國對多國的戰爭之外，也是造成帝國更加混亂的關鍵戰役。加上上述各戰爭的分類時間點較為接近，因此做此區分。

一、克里米亞戰爭與鴉片戰爭

克里米亞戰爭爆發的原因，與當時沙皇尼古拉一世激進的外交政策很有關聯。例如對鄂圖曼土耳其方面，尼古拉一世也積極支持反對伊斯蘭教和推翻土耳其的運動，認為透過這些行動俄國就有向黑海和地中海擴張的機會。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俄國當時幫助同樣信仰東正教的希臘，支持其獨立運動來對抗土耳其，造成俄國和鄂圖曼土耳其關係的緊張。[3]

1847 年，在耶穌的出生地伯利恆（Bethlehem），當時屬於鄂圖曼土耳其的

---

[1] 鴉片戰爭共有二次，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於 1840 年至 1842 年，英國常稱之為「第一次英中戰爭」（First Anglo-Chinese War），第二次鴉片戰爭（Second Anglo-Chinese War）則又稱為英法聯軍之役（Anglo-French expedition to China）。

[2] 如從斯科克波的著作中便可以得知她認為俄羅斯帝國從克里米亞戰爭便可以看出問題，茅海建也認為鴉片戰爭是中華帝國崩潰的開始。請參考：斯科克波，**國家與社會革命**，頁 105-107；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頁 23。

[3] Евген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 Тарле, *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 Книга на сайте: <http://bookmate.com/r#d=Tb9AKIkz>, стр.9-12.

領土，那裡有一座「聖廟」，聖廟的屋頂有顆銀星裝飾，可是那顆銀星突然不翼而飛，法國的天主教教士認為是希臘的東正教的教士偷走的，因此引發了爭端。其後，俄國因為要求鄂圖曼土耳其同意俄國能夠保護土耳其境內的東正教徒，卻因為涉及他國內政而未被鄂圖曼土耳其接受，加上土耳其有英國和法國的支持，態度相當強硬，致使尼古拉一世決定對其出兵。而在俄土雙方展開西諾普海戰（the Battle of Sinope）後，俄國將土耳其艦隊全毀，英、法認為俄國太過殘忍，隔年 3 月 28 也向俄國宣戰。由於雙方實力相當，導致彼此都傷亡慘重，尤其是之後的塞巴斯投波戰役（Siege of Sevastopol），更讓雙方付出慘痛的代價。雙方最後因損失過重，加上尼古拉一世逝世，繼任的亞歷山大二世繼位，於 1856 年才停戰。[4]

這場戰爭帶給俄羅斯帝國最明顯的後果，就是軍事實力嚴重受挫，並暴露出其軍事制度有很大的缺陷，如行政效率不佳、運輸補給落後、武器老舊低劣等。然而，這場戰役帶給俄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衝擊面更大。因此促使亞歷山大二世的大力改革。[5]

至於中華帝國方面，第一次面臨影響政權的對外戰爭，可說是鴉片戰爭，共有兩次。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中華帝國和大英帝國因為鴉片貿易問題所引發的戰爭。早在十六世紀，歐洲人就透過海路到達中國，之後開始有貿易、傳教等活動，[6]不過中西之間文化和制度差距甚大，其中外國商人難以忍受「規禮」，即除了關稅外，還用各種名目榨取稅金，此外還有海關人員的勒索，濫徵情形嚴重。[7]到了 1759 年後，中華帝國為了要進行管制，使廣州成為唯一的通商港口，但勒索等情形更加嚴重，讓外國商人相當不滿。此外，債務、兇案等等事件也時常出現，但中華帝國的處理方式也常常讓外國商人覺得不公平。十八世紀末期，由於鴉片

[4] 由於此次克里米亞戰爭是第一次現代化的戰爭，造成的傷亡也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死傷人數最多的戰爭。俄國在此役傷亡人數為 45 萬人，法國 8~9 萬人，英國 2.5 萬人，土耳其較難以計算，但粗略估計約有 20~40 萬人傷亡。

[5] 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6] 大清帝國原為防範明鄭政權和海盜騷擾而有的海禁，在 1685 年解禁。

[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41-45。

進口、茶葉出口的比例增加，英國希望能解決中英之間貿易的限制，並希望促進中華帝國和西方彼此的了解，派遣使節，但都被中華帝國所拒。[8]很明顯，中華帝國並沒有認為需要針對貿易問題進行改革，然而大英帝國則已難以忍受。到了十九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大致完成，國力又增強許多，又遇上中華帝國的鴉片問題，[9]兩國逐爆發戰爭。

早在嘉慶時期，就已經有禁煙的想法，認為鴉片一來傷害人民健康，二來使中華帝國內部的白銀短缺，因此在 1796 年起將鴉片視為禁品，但走私情形依然嚴重。到了道光即位後，才命林則徐強制杜絕鴉片。

1839 年，林則徐開始嚴格執行禁煙，當時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將英人帶來的鴉片全數清繳，但為被迫交出，並不情願。林則徐將這些鴉片於虎門銷毀，即著名的「虎門銷煙」。之後，又發生英國水兵打死九龍華人的事件，林則徐要求交出兇手，但義律堅持自己審判，林則徐於是封鎖澳門，不讓英人登港。後來義律感到處境困難，想要和談，林則徐要求義律交出鴉片和兇手，並要求義律具結，不過義律只肯接受船隻搜查，答應兇手再查明，並按照英國律例審判，但不願意具結。雙方妥協似乎不太可能，時有衝突，最後 1840 年林則徐決定對英封港，困英船在海上，不久英國也決定對中國用兵。

英國出兵主要是希望給中華帝國的中央壓力，因此並未攻打廣州，而是攻佔定海，之後繼續北上，原本主戰的道光皇帝感到威脅，心理產生動搖，加上義律和英國海軍司令伯麥（G. Bremer）說是林則徐等人騷擾、傷害在中國的英國人民，所以要來「昭雪申冤」，道光於是命琦善和英談判，並將林則徐等人革職。不過由於和談內容難以達成共識，琦善想故意拖延時間，讓義律決定先戰後商，

[8] 1793 年馬嘎爾尼（George Lord Macartney）到達北京請願，被乾隆請回，1816 年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到達天津再次表達英國訴求，又被嘉慶逐回，兩位都是因為跪拜禮儀和皇帝發生衝突。

[9] 鴉片在十六世紀時傳入吸食的方法，並很快流行全國。而由於英國自中國大量進口貨品，形成嚴重入超，在當時歐洲流行的重商主義，認為有害於英國利益，後來發現鴉片可以有大量銷路，於是開始大量將鴉片銷往中華帝國。

1841 年攻佔虎門的砲台，琦善被迫讓步，簽下〈穿鼻草約〉，[10]但並未被道光皇帝接受，又想繼續戰爭，英國於是攻佔虎門，最後廣州附近要地全被占領，負責戰事的奕山於是簽下〈廣州和約〉，[11]義律於是退兵。不過大英帝國中央認為義律並沒有達成任務，否定〈穿鼻草約〉，換上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為全權代表，要求中華帝國必須接受英國所有要求，否則不停戰。英軍迅速到來，加上武器實力懸殊，英國軍隊最後直逼南京，大清帝國雖力求反攻但都失敗，被迫求和，簽訂〈南京條約〉（又稱〈萬年和約〉），允諾國交平行，割讓香港給英國，增開口岸，[12]各項賠償共計二千一百萬元。除此之外，英國擁有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租界和片面最惠國待遇，對中華帝國主權傷害甚重。

第一次鴉片戰爭，使得中華帝國門戶大開，而鴉片走私問題又再度出現，另外也有人口販賣的問題，對中華帝國的經濟和國力都帶來傷害。至於社會層面，中華帝國人民普遍仇視英國，另外，也有漢人伺機反抗滿人為政治中心的大清帝國，例如太平天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

第二次鴉片戰爭，主要是英國方面希望修約不成，並在一次導火線下再度爆發的戰爭。〈南京條約〉訂立後，英國可以讓鴉片正式進入中國，但其他工業產品則出口有限，英國認為是口岸只有五處所導致，希望可以再增加通商港口。此外，傳教只限通商港、吸食鴉片沒有正式成為合法和認為中華帝國答應的國交平等只是有名無實，也都是造成英國不滿的原因。英國試圖修約，但由於中國方面認為將有損其利益，因此未能成功，加上中華帝國認為英國態度不佳，而英國認為中華帝國有仇外情緒，[13]彼此衝突逐漸醞釀。另一方面，法國也想擴張在中華帝國的傳教工作，加上此時正好和英國共同對抗俄羅斯帝國，[14]所以也支持英國

[10] 〈穿鼻草約〉內容主要為割讓香港、賠償、國交平行（國與國之間平等往來）、恢復廣州貿易等等。
[11] 和約內容主要為中華帝國給英軍贖城費六百萬元，並賠償夷館損失三十萬元，英國自廣州撤軍。
[12] 即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口岸作為貿易港。
[13]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廣州出現強烈的仇英情緒，與英國人的衝突時常發生。
[14] 即 1854 年至 1856 年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

在中國的利益。正好 1856 年發生了英籍船隻「亞羅號」在廣州被捕，[15]以及 1857 年法國教士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因越界傳教被捕致死，給予英國和法國出兵的機會。此外，美、俄兩國在遠東的勢力也漸強，在外交上支持英法的行動。1857 年英法聯軍開始進兵廣州，隔年一月廣州失陷，之後繼續北進，此時大清帝國急於議和，希望能保有天津，和英、法、美、俄等國分別簽訂〈天津條約〉。[16]

不過中華帝國不久即想改約，尤其是北京駐使一條，讓中華帝國感到威脅。1859 年，英國大使卜魯斯（Frederick Wright-Bruce），受令要在北京設館，並有英國船艦在上海，法、美公使也前來中國，大清方面告知公使兵船應停北塘口，大使需由北塘上岸入京，但卜魯斯堅持要從大沽上岸，雙方交火，英船挫敗而回。英、法兩國隔年於是再度對中國出兵，從北塘進入，最後攻陷北京，燒毀圓明園，當時的咸豐皇帝甚至出走熱河。最後英、法和中華帝國續增條約，中國必須為大沽事件道歉，履行〈天津條約〉，賠款英法各八百萬兩，並須還法國天主教產，英國則有九龍司地方併入英屬香港。

此次戰爭帶給中華帝國更多的傷害，除了主權問題外，還帶來經濟上和社會上的損失。經濟上，中華帝國失去關稅自主權，全面開放，讓白銀流出更加嚴重；社會上，允許自由傳教，教士可以在中華地國內擁有地產，以及領事裁判權，都使得外國人和信奉西教的人民成為特權階級，和地方產生衝突。鴉片貿易合法，更是讓中華帝國國力下滑的重要因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帝國利用此次事件順利自中華帝國取得大片領土。自從鴉片戰爭爆發，適逢克里米亞戰爭，俄羅斯帝國以幫助中華帝國打擊大英帝國的名義，派軍民航行黑龍江，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後，俄羅斯則全力向遠東擴張，1858 年和當時的黑龍江將軍奕山談判

[15] 被捕原因為廣州官員認為亞羅號上面有盜匪。

[16] 條約以英國為代表，其主要內容為：一是實質上的國交平等，中英互派有權的大使常駐兩國的首都，並以泰西禮節（泰西為當時對西方的稱呼）面見大清皇帝；二是開放更多港口通商，以及英人可以到內陸遊歷，長江一帶再開放口岸；三是領事裁判權，與英人有關的案件，都由英國官員查辦；四是稅務問題，約定在上海協商；五是保護傳教，並能自由傳教，不受港口限制；六是保持英國最惠國待遇；七是條約以英文為準，並且不可稱英國為「夷」；八是需盡力消除海盜；九是約定每年在北京換約；十是賠償英國損失和兵費。

交界，最後簽訂〈瑷琿條約〉，俄羅斯帝國獲得黑龍江以北的土地，烏蘇里江以東由中俄共管，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中俄共同航行。不久，又在〈天津條約〉簽訂後，要求勘界，雙方為邊界爭執數月，最後確定原定的黑龍江以北為俄國領土外，烏蘇里江以東也歸屬俄羅斯帝國，中華帝國於此次損失相當廣大的領土，嚴重傷害其主權和經濟實力，然而此次戰爭也更讓中華帝國不得不面對外部壓力，開始尋求改革，自強運動就是中華帝國的一次改革嘗試。[17]

可以發現，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第一次面臨的對外戰爭儘管起因不同，但都是失敗收場，而且暴露出國家和內部的問題。首先，在軍事上，克里米亞戰爭可以看出俄羅斯軍事制度的落後，而鴉片戰爭則是清楚看到中國武力遠不及英、法等國，雖然這兩個戰爭都沒有造成帝國政權的危機，但也讓帝國執政階級感受到強大壓力，開始試圖改革。例如亞歷山大二世開始大改革時代，而中華帝國則試圖效法西方器物，進行自強運動。另外，戰爭也開啟了知識的交流，不論俄羅斯帝國或中華帝國內部都有新的知識傳入，但不同的是俄羅斯帝國的知識份子主要想吸收西歐的各種思想，而中華帝國的知識份子著重在西方科技上的學習。

二、日俄戰爭與甲午戰爭

日俄戰爭，同樣也是俄羅斯帝國不斷向外擴張所造成的結果。由於當時俄國在西部擴張受阻，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德國皇帝的鼓勵下向遠東擴張。事實上，俄國在遠東擴張前期可說是非常順利，1860 年取得海參威（又稱弗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俄文：Владивосток），1891 年開始建造西伯利亞大鐵路。與此同時，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也變成帝國主義國家，開始向東亞的朝鮮和中國擴張。兩國在利益上出現衝突，自然難以避免爭端。

早在 1891 年，尼古拉二世當時還是皇太子，在西伯利亞鐵路開工儀式時，順道訪問日本，就在大津遭到日本人津田三藏襲擊，被稱為「大津事件」。也因

[17] 關於自強運動，請參考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為如此，尼古拉二世對日本的印象一直不好。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沙皇因為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將損及俄國在遠東的利益，與德皇威廉二世要求日本歸還中國遼東半島，致使兩國的恩怨越來越大。之後，日本因戰勝中國成為朝鮮的保護國，俄國則因為和中國保持友好，在中國赤塔建立到海參威的中東鐵路，並簽屬〈中俄密約〉。1897 年得到中國旅順及大連，隔年再租借遼東半島和旅順港，1900 年俄國又因八國聯軍進佔中國東北，1901 年的〈辛丑合約〉俄國再得中國滿洲。至此，俄國遠東利益和日本東亞的利益已經牴觸，日本則在 1902 年和英國同盟，雙方衝突一觸即發。[18]

1904 年 1 月 6 日，俄國表面上照會日本，表示俄國可以不在東北境內妨礙日本「現在享有的利益及特權」，但兩天後尼古拉二世卻宣布「在遠東各州進行總動員，並宣佈滿洲進入戰時狀態」，有意迫使日本訴諸武力。[19]另外，由於〈辛丑和約〉規定俄國應從中國東北撤軍，但俄方故意不從，加上日本有意擴張勢力至東北，於是在同年 2 月 10 日兩國正式宣戰。

開戰後，俄國在旅順的海軍被日本封鎖，日本獲得黃海的控制權。不久，旅順港失守，俄國和日本轉而以陸戰為主。不過，在遼陽失守、瀋陽大戰戰敗後，俄國的陸戰戰役可說是完全失敗。但俄國並不想就此投降，俄方派出波羅的海艦隊，意圖扭轉局勢。然而，由於發生「多格海岸事件」（Dogger Bank incident）[20]，加上英日同盟的關係，波羅的海艦隊一度被鎖在地中海，中間還停留月餘之久，途中艦上軍隊聽聞俄國陸戰已敗，加上長途跋涉，士氣低落，最後與日本在對馬海峽遇上，艦隊幾乎全滅。此戰重創俄羅斯帝國的軍事實力，國內的經濟和社會情形也更加動盪。俄國於是在 1905 年接受美國的調停，結束這場戰爭。

---

[18] 事實上，日俄雙方一開始都有想盡可能避免戰爭。1902 年 8 月，日本駐華公使栗野慎一郎向俄國政府遞交照會，建議各自劃分東北亞地區的勢力範圍，但後來談判破裂。日本希望能在朝鮮擴張實力，進而取得中國東北利益，所以只願意給俄國鐵路方面的特殊利益；俄國則是希望以中國東北為基地，向朝鮮發展，雙方談判自然不可能成功。

[19] 崔丕，**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吉林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221, 222。

[20] 多格海岸事件，又稱「北海事件」，是日俄戰爭期間，俄羅斯波羅的海艦隊誤將在多格海岸的英籍漁船，當作是日本海軍，對其開火，造成英籍漁民傷亡。此事件也差點造成俄國和英國爆發戰爭，所幸雙方透過外交方式解決衝突。

日俄戰爭帶給俄國的後果，最直接的是簽訂的〈朴茨茅斯和約〉中，俄國將旅順、大連交給日本，交付中國東北鐵路權給日本，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利益，並同意兩國自滿洲退兵。然而，除了俄國在東北的利益轉交給日本外，更嚴重的後果在於此戰役失敗造成俄國國內反政府和反日運動日益嚴重。

中華帝國也和日本有軍事上的衝突。中國的自強運動在軍事上所做的改革，實際上是希望自保，除了防範西方列強外，還希望防範因維新運動而崛起的日本。然而中日之間最後因朝鮮問題，[21]而引發甲午戰爭。

十九世紀後期，朝鮮內政出現分裂，政治動亂，統治階級有親中派和親日派的勢力，以及有排外的東學黨，和朝鮮政府關係緊張，1894 年東學黨起義，親中派和親日派分別向兩國求援，中日兩國分別出兵平定東學黨的運動，等到朝鮮戰事穩定後，日本因對朝鮮擁有野心，不願退兵，中華帝國雖自知實力不敵日本，但基於國家的安全，仍不免一戰。1894 年 7 月，雙方發生豐島海戰，日軍大勝，並在海戰之前就已先占領朝鮮漢城，劫持朝鮮國王李熙，之後陸戰也是由日本取得勝利，9 月 16 日，雙方在海上發動主力戰，互有死傷，而中國受創較重，失去了 4 艘船艦，[22]自此日軍可以自由進出朝鮮半島。

然而戰事並未因此平息，日本方面希望繼續向中華帝國本土進攻，開始從鴨綠江進入中華帝國領土，不久遼東半島幾乎被攻佔，旅順、大連等北洋海軍軍事重地亦失手，中華帝國求和不成，[23]日本海軍最後殲滅北洋艦隊，並進攻台灣和佔領澎湖。最後，1895 年，大清帝國授命李鴻章全權談判，日本也已有意和談，雙方簽訂〈馬關條約〉，內容主要為中華帝國承認朝鮮自主（實際上是歸於日本），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以及賠款二萬萬兩。[24]不過由於遼東半島關係到其他西方國家的利益，在俄國、德國和法國三國的干涉下，日本最後被迫交還遼東半島，

[21] 朝鮮原為中華帝國的藩屬國，中華帝國尤其重視朝鮮，原因在於其中關係到中國東北（統治階級滿族的故鄉）和首都北京的安全。
[2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315-316。
[23] 日本不同意議和，一方面為大清帝國派遣談判的人因權力不足未被日本接受，另一方面日本希望先給予中華帝國更嚴重的挫敗以獲得談判的優勢。
[24] 賠款數目相當龐大，超過當時中華帝國全年收入的二倍。

中華帝國以三千萬兩贖回。

甲午戰爭帶給中華帝國嚴重的打擊，對其政治、軍事、社會、經濟都有廣大的影響，首先，由於賠款過重，中華帝國經濟無法起色，也無法有更多經費來做改革，人民生活也更加困苦。其次，北洋海軍的滅亡，軍事實力受創，並且更為外國所輕視，加速西方列強對中華帝國的侵略。第三，戰後失去台灣，普遍讓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並且失去軍事上的重要戰略地位。此外，中華帝國戰敗後，西方列強和日本開始在其領土劃分勢力範圍，[25]俄羅斯帝國另外和中華帝國訂立同盟，共同視日本為敵，然而俄國真正目的在於獲得在中國東北建立鐵路的權利。美國雖然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希望各國利益均沾，並得到各國同意。但事實上其內容只是要各國勢力範圍有均等的貿易機會和公平的待遇，各國的勢力範圍依然存在。[26]另外，這項政策只是滿足西方列強的利益，對中華帝國的政治主權並沒有太大的幫助。[27]

甲午戰爭後，由於上述的影響，確定自強運動是失敗的。此時中華帝國急於改變現狀，主要有希望繼續從原有合法政府下做改革的維新人士，如康有為及梁啟超等人的維新派，和對原有政府完全失去信心的革命人士，如孫逸仙與黃克強等人的革命派，以及純粹厭惡外國勢力的排外人士，如義和團。維新派試圖發起維新運動，希望能真正讓中華帝國進行改革，革命派則認為唯有推翻政府，才有真正改革的可能，而義和團則是將長年受外國侵犯的仇恨擴大，希望進行報復。分別帶給中華帝國不同的影響。

和俄羅斯的日俄戰爭做比較，可以發現兩國在對抗日本的戰爭都是失敗的，並且都帶給帝國莫大的損失。兩國和日本發生衝突的原因，都是因為朝鮮問題而起，但必須注意的是，俄羅斯帝國是希望擴張領土所導致，而中華帝國是希望守住原有的藩屬國所導致，不過共同點都是和日本的利益發生衝突而戰。這兩個戰

[25] 例如德國擁有山東，俄國擁有中華帝國從東北到新疆的北方，日本有中國東北的一部份和福建，英國則在江蘇、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四川、西藏等地都有其勢力。
[2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338。
[27] 但在義和團事件後，門戶開放政策增加各國保證中華帝國行政領土完整的原則，讓中國免於被列強瓜分，確實有維持中華帝國主權的作用。

爭在戰敗後所帶來的影響，也有許多相似之處，首先，這兩個戰爭都導致帝國開始出現危機，地方上出現革命，例如俄羅斯的 1905 年革命，和中國的孫逸仙等人革命勢力的累積。軍事上帝國也受到嚴重傷害，尤其是在海軍方面，俄羅斯帝國的太平洋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被殲滅，中華帝國在自強運動所自豪的北洋海軍，也被日本軍艦殲滅。經濟上，兩國都蒙受損失，但以中國面臨的損失較為慘重，俄羅斯主要是遠東利益轉讓給日本，即朝鮮和中國東北的利益，而中國則是除了放棄朝鮮利益外，還割讓了台灣、澎湖等地給日本。此外，這兩個戰爭也讓兩國的知識份子強力要求改革，並讓革命勢力快速崛起，兩國在之後都出現了立憲派和革命派的勢力，這些在本文第三章已有探討。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八國聯軍

第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簡稱一戰），可說是壓垮俄羅斯帝國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戰爆發的原因，主要是歐陸各國彼此形成敵對陣營，最後在一次 1914 年的塞拉耶佛事件（Sarajevo Incident）引爆雙方的戰爭，由德國、奧匈帝國、土耳其、保加利亞組成的「同盟國」，對抗由英國、法國、俄國和義大利組成的「協約國」，這場戰爭也使得俄羅斯帝國內部更加動盪，最後導致二月革命，讓羅曼諾夫王朝走入歷史。

1877 年的俄土戰爭，讓俄羅斯與奧地利交惡，導致德國召開柏林會議，重新協議巴爾幹半島上各國的勢力均衡。協議後，由於俄羅斯利益受損，也改變它對德國的態度，轉而向法國友好。德國得知後，和奧匈帝國協議，1879 年訂立「兩國同盟」（Dual Alliance），規定任一國遭受俄國攻打，另一國必須全力協助，以防止俄羅斯的侵略，之後 1882 年義大利的加入，成為「三國同盟」。然而 1891 年時，德國擔心義大利轉而投靠法國，急於讓三國同盟續約，此舉反而促使俄、法兩國緊張，反而讓兩國關係更加密切。1894 年雙方簽訂〈法俄聯盟軍事協議〉（The Franco-Russian Alliance Military Convention），協議的簽訂也讓法國脫離德國

對其的「圍堵政策」。此外，由於歐洲局勢的變動，英國得放棄外交上原本堅持的「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加上英國與法國解決在非洲殖民地衝突的問題，1904 年簽訂〈英法友好協約〉（The Entente Cordiale），俄羅斯帝國則由於在日俄戰爭後對英國的威脅減少，兩國也在 1907 年簽訂了〈英俄友好協約〉（The Anglo-Russian Entente）。[28]至此，歐洲分成了「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和「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兩大敵對陣營。

兩方陣營爆發大戰的導火線，是奧匈帝國的皇儲斐迪南（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及其妻子於 1914 年 6 月 28 日在塞拉耶佛（Sarajevo）被暗殺所引起。[29]由於兇手是塞爾維亞的革命份子，奧匈帝國認定塞爾維亞事背後的支持者，決定出兵塞爾維亞。[30]不過其實俄羅斯早已決定，若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出兵，俄羅斯一定會對奧匈帝國宣戰。7 月 28 日，奧匈帝國宣布對塞爾維亞作戰，尼古拉二世也在隔日發動總動員，最後，根據前面所述的兩方陣營各自立下的約定，德國、法國、英國、土耳其也跟著加入戰局。於是，原本的地區性戰爭，成為一場全面性的世界大戰。

俄羅斯加入戰局後，國內民眾普遍支持，但軍事行動的調動上卻缺乏一致，尼古拉二世先是部分動員，之後卻在連國防部長也不知道的情況下又變成總動員。賀允宜認為，尼古拉二世隨時改變主意又不告知官員的性格，是導致俄羅斯在這場戰爭失敗的重大原因之一。[31]除此之外，這場戰爭對俄羅斯而言只能短期作戰，長期戰爭會有運輸和補給等問題，像軍火武器上，就有士兵無法取得槍枝的問題。

---

[28] Fiona K. Tomaszewski, *A Great Russia: Russia and the Triple Entente, 1905-1914* (United State: Praeger, 2002), pp.43-66.

[29] 斐迪南會被槍殺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他不贊成奧匈帝國的「雙元君主國」（The Dual Monarchy）體制，希望在即位後將其改成「三元主義」（trialism）制度取代，也就是除了日耳曼民族和馬札爾民族外，斯拉夫民族的地位也是平等的。原本斐迪南認為如此制度可讓國內的斯拉夫民族認同奧匈帝國，避免其脫離祖國，但這項舉動不但受到匈牙利的馬札爾人反對，極端的斯拉夫民族份子，也認為此舉阻礙他們想獨立建國的運動，因此斐迪南反而成為被暗殺的對象。

[30] 事實上，奧匈帝國境內的斯拉夫民族一直有想與塞爾維亞合併的運動，因此兩國的關係時常有衝突發生。

[31] 賀允宜，**俄國史**，頁 525。

[32]不過，俄羅斯帝國初期的戰事還算順利，在和法國的夾擊下，讓德國兩面受敵。並且在法國的要求下，俄羅斯動用更多軍力，入侵東普魯士，迫使德國得調動西邊的軍力，讓法國免於受德軍太大的威脅，而這也是法國在對德國的馬恩之役（The Battle of Marne）能勝利的重要原因。然而，德國在此時換上興登堡將軍（Paul von Hindenburg）為東戰場的總司令，德軍開始反擊，其中「坦能堡之役」（Battle of Tannenberg）[33]重挫俄軍的士氣，陣亡及下落不明者多達七萬人，被俘的人數也多達十萬人。之後又再擊敗瑞能坎普將軍的軍隊，至此俄國從東普魯士退出。不過在對奧匈帝國上，俄羅斯突破奧匈帝國的防線，布魯斯羅夫將軍（General Alexi Brusilov；俄文：Генерал Алексей Брусилов）讓奧匈帝國軍力損失慘重，並且讓俄羅斯取得西南戰區的勝利，再次威脅到德國。到 1914 年底，東西線戰事都陷入膠著狀態。

德、俄兩國都因為戰爭膠著而得以喘息，不過，由於 1914 年 10 月，鄂圖曼土耳其海軍在德國的掩護下砲擊敖德薩港口（Port of Odessa），讓俄羅斯本來可以從聯盟補給的物資受到嚴重阻礙，這使得 1915 年的俄羅斯帝國，經濟更加受創，國內政局也更加混亂。此外，德國認為要擺脫膠著的戰爭狀態，必須先全力攻打俄國，之後再回西線對法作戰，俄軍於是在沒有準備、士氣低落、補給不足的情況下戰敗。德國的猛攻，也造成俄羅斯國內政治、軍事和士氣都受到嚴重打擊。此時俄國內部有民間團體主動幫助國家的危機，例如杜馬聯合俄羅斯的企業家和富商，在 1915 年 5 月組成「保證提供現役軍隊大砲措施協調特別會議」（Special Council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Measures to Ensure the Supply of Artillery to the Active Army）。尼古拉二世由於情況緊急，允許杜馬和民間組織參與政府事

[32] 1914 年 12 月，俄羅斯總動員的人數約有 655 萬 3 千人，但當時的步槍只有 465 萬 2 千支，還在製造的有 27 萬 8 千支。彈藥上也有相同的問題。請參考：賀允宜，前揭書，頁 526。

[33] 俄國當時攻打德國有兩個主力，一個是瑞能坎普將軍（General Pavel Karlovich Rennenkampf；俄文：Генерал Павел Карлович фон Ренненкампф）往德國西邊的柯尼斯堡（Konigsberg）攻打，另一個是薩木索諾夫將軍（General Aleksandr Vassilievich Samsonov；俄文：Генерал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Самсонов）由波蘭向德國南方進攻，像是一個鉗子那樣夾著德國。興登堡將軍最後決定冒險全力攻打薩木索諾夫將軍的部隊，結果大勝俄國，薩木索諾夫將軍也在該戰役失敗後自殺。

務的權力，國內改革派的人士因此認為杜馬未來可以組織政府，俄羅斯帝國最後將朝憲政的道路前進。然而，事實上這僅是尼古拉二世被迫暫時讓步的決定，對他而言，戰局好轉後就會對杜馬和民間組織收回這項權力。

1915 年 8 月，尼古拉二世任命阿列克西耶夫將軍為總司令，但實際上是他本人在控制戰局，他前往戰場督戰，由皇后和其信任的拉斯普廷處理國家事務，這讓朝中大臣和部分皇室成員相當不滿。[34]除此之外，杜馬在 7 月時重組議會，[35]議會內容主要提出希望能組織責任性政府、尊重杜馬立法權、讓波蘭獨立、給予芬蘭、烏克蘭自主權等議案，獲得大多數的代表通過與行政官員的支持，可以說朝野都希望俄羅斯帝國能改成議會式政體，然而尼古拉二世卻為了守護君主專制，9 月下令杜馬解散，並拒絕改革要求。此時正是俄羅斯帝國內部最紛亂的時刻，尼古拉二世親自督戰和讓杜馬解散，是其導致帝國毀滅的重要原因。這二項舉動讓原本支持沙皇的改革派和官員們失去希望，尼古拉二世也把許多重要官職替換成皇后和拉斯普廷建議的人選，之後批評聲浪四起，其中米留寇夫（Pavel Nikolayevich Milyukov；俄文：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發表演說，刻意指控皇后和部長主席斯托莫（Boris Vladimirovich Stürmer；俄文：Борис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тюрме）有通敵的嫌疑，最後流言四起，許多人民認定皇后和斯托莫出賣俄羅斯，要把俄國獻給德國皇帝威廉二世。[36]米留寇夫的演說，也被認為是俄國二月革命的導火線。[37]

至於中華帝國，則有八國聯軍促使帝國崩潰，其戰爭發生原因主要是在中華帝國的各國公使，受到中華帝國內部排外團體的暴力行動而請求各國派兵救援，最後引發大清帝國對外國列強宣戰的事件。如前文所述，長年受到外國的壓迫，

---

[34] Милюков,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Февраль 1917-го: крах монархии,»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Номер 2 (2007),** стр.172-173.

[35] 第四屆杜馬曾在 1915 年 1 月，被沙皇下令休會，並承諾戰局穩定後會再復會，同年 6 月，沙皇決定讓杜馬復會。

[36] 皇后和斯托莫事實上並非如米琉寇夫所說的，是俄羅斯的間諜，或是意圖想讓德國取得俄羅斯，米琉寇夫事後也承認這點，然而他認為此時必須引發群眾的憤怒情緒，以對抗專制的俄羅斯帝國，才能拯救俄國人民。

[37] 有關二月革命細節，請參考本章第三節。

加上經濟上無法和外國競爭，導致中華帝國部份人民將國內面臨的問題都歸咎於外國勢力的進入。此時，在山東等地有一群是帶有中國傳統民間信仰的宗教團體，並且會練習拳術，稱為「義和拳」，他們認為透過信仰和練拳可以「降神附體，口誦咒語，金刀不入，槍砲不傷。」[38]之後義和拳漸漸流行，並且利用其勢力反對西教，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反教事件，這些團體後來被稱作「義和團」[39]。義和團的排外運動越來越大，外國人士希望大清帝國能夠平定運動，而許多大清帝國的官員採取縱容義和團的方式，讓各國公使相當不安。1900 年，各國公使要求慈禧下令剿滅義和團遭拒，開始向自己的國家求援，同年六月，義和團湧入北京、天津，以「助清滅洋，替天行道」為口號，大肆毀西洋教堂、教民住宅和販售洋貨的商店，並破壞許多現代化的機構和設施。此時大清帝國也已無法控制義和團的行動，外國軍隊也已經與義和團發生衝突。最後，以慈禧為首的領導勢力，決定對所有前來平定義和團的軍隊宣戰。

大清帝國對外宣戰前，義和團就已經控制北京和天津，宣戰後，清軍和義和團共同攻打天津租界，北京城也是主要戰場。1900 年 8 月，聯軍攻破北京，慈禧和光緒逃往西北，中華帝國人民死傷慘重，北京分別在各聯軍的控制之下，天津、東北也隨之淪陷。然而在地方上，中央的命令未被接受，各省督撫多和外國約定互相保護，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他們自行和外國約定，外國兵船不進入長江，內地的外國人由兩位總督保護，上海租界由外國人自己保護。互保的區域實際上共有十三省，顯示大清帝國中央已無力控制地方，但這些地方官員仍保持和中央的關係，認為只是暫時的中立狀態。

之後，聯軍和大清帝國議和，於 1901 年簽訂〈辛丑和約〉，共有十二條大綱，為聯軍各國所達的共識，再由慈禧批准。其中最重要者，當屬賠款一條，由於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的補充，要求各國維持中國行政領土的完整，因此此次並未

[3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375。
[39] 當時給予這些人「義和團」的名稱，事實上就是大清帝國承認此為「鄉團」，即合法的民間保衛家園的團體。

有割地等條件。惟所需賠償各國的金額高達四萬萬五千萬兩，約為當時中國五年的總收入，加上利息和其餘賠款，總數達十萬萬兩以上。[40]如此鉅款，成為中華帝國無法負荷的經濟負擔。此外，聯軍要求繼續駐紮軍隊至隔年，被破壞的軍事設施不得重建，兩年內不允許製造軍火的材料進口，並且要求禁止仇視外國人，如有縱容的官員立即革職等。這些條件的目的都在於要讓中華帝國的人民完全屈服，減少中華帝國的抵抗力量。確實，在八國聯軍之後，天津及北京的部分居民開始由「仇外」變成「媚外」，改以從事對外相關行業，如翻譯、通事等職務為榮。

將此二戰爭做一比較，可以發現兩國的戰爭原因是完全不同的，但都是一次同時對抗多國的戰爭。其戰爭帶來的最大問題，是國內經濟的動盪，例如俄羅斯甚至出現人民飢荒，中國則是人民為了支付賠款而稅金加劇，造成人民無力負擔。軍事上，俄羅斯發生頻繁的叛變，而中國被限制軍事的發展，對於政權的穩固帶來強烈的威脅。最後，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俄羅斯帝國崩潰，而八國聯軍則是凸顯中華帝國中央和地方已經分離的事實，有利於革命人士的活動，並讓兩國多數的人民都明顯不再支持專制政權。

綜合上述的戰爭，將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對外戰事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兩國都因為對外戰爭失利，而使國內的軍事實力受挫，經濟、社會也更加動盪，進而帶來政治上的打擊。然而不同的是，俄羅斯對外戰爭基本上是主動的，例如克里米亞戰爭和日俄戰爭都是為了擴張領土而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事實上也是俄羅斯支持同樣屬於斯拉夫民族的塞爾維亞，並且這些戰爭的引發，或多或少也是執政者有意轉移焦點，避免人民過於在意國家內部的問題。中華帝國方面，對外戰爭則多是屬於被迫的，主要是為了守住固有的國土或藩屬，或是維護其傳統的文化與制度。但不可否認，對外戰爭的失敗都促使兩個帝國內部尋求改革，例如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或是大清帝國的自強運動，尼古拉二世事實上也在日俄

[40] 郭廷以，前揭書，頁 395。

戰爭後與立憲人士達成部分妥協，而光緒皇帝也在甲午戰爭後開始進行戊戌變法。此外，戰爭的失利也帶給帝國許多新的思潮，這個議題將在下一章節做細部探討。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表 4-1：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對外戰爭之比較

	主要起因	對帝國政權的影響	對帝國軍事實力的影響	對帝國經濟情形的影響	思想衝擊的影響	引發的重大事件
俄羅斯帝國：克里米亞戰爭	領土擴張衝突（破壞歐洲勢力平衡）	無重大威脅	暴露軍事制度缺陷	無重大影響	知識份子階級形成，帶入各種思潮	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
中華帝國：鴉片戰爭	貿易問題（關稅、鴉片）	無重大威脅	發現自身武力落後	白銀流失更嚴重，賠款使人民更窮，割讓香港	部分知識份子開始希望學習西方器物和科技	自強運動
俄羅斯帝國：日俄戰爭	朝鮮和中國東北問題（遠東的利益衝突）	出現威脅，地方革命四起	軍事受挫，太平洋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被毀	損失遠東的既有利益	知識份子尋求內部改革	1905 年革命
中華帝國：甲午戰爭	朝鮮問題（保護藩屬國）	出現威脅，革命派漸漸崛起	軍事實力受挫，北洋海軍滅亡，暴露軍事制度缺陷	損失朝鮮作為藩屬，割讓台灣	部分知識份子希望學習西方制度，立憲派和革命派興起	戊戌變法孫逸仙等人革命活動開始
俄羅斯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	歐洲兩大勢力衝突、保護塞爾維亞	帝國專制崩潰	軍事實力重挫，官兵叛變頻繁	國內經濟問題更加嚴重，有嚴重飢荒問題	人民普遍希望停戰，原沙皇退位	1917 年二月革命
中華帝國：八國聯軍	義和團仇外情緒	中央與地方關係分離（地方中立）	軍事實力重挫，並被限制軍事發展	巨額賠款，人民無力負擔	立憲派沒落，革命派興起	一系列革命（包括之後的辛亥革命）

（表格：筆者自製）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節　思想衝擊之比較

由於思想衝擊無法確切的用事件或時間區分，本節粗略將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的近代思想衝擊分為兩次，以 19 世紀中葉為分界點。俄國第一次的思想衝擊約在 18 世紀末期開始出現，而 1836 年的「西化派」和「斯拉夫派」思想爭辯，可說是思想衝擊的一次高潮。中國雖然早在 16 世紀就和西方有所接觸，並得知西方的一些知識及思想，然而真正讓中國知識份子意識到西方思想的重要性，卻是在 19 世紀前期的時候。19 世紀後期，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又有一次重大的思想改變，俄國的知識份子帶來更多元的西方思想，而中國也開始萌生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想。本節最後將這些思想衝擊一起比較。

一、初次思想衝擊

近代俄羅斯帝國思想的傳入，仰賴於俄國的知識份子，大約在十九世紀初才漸漸形成的一個階級。俄羅斯帝國原本是以貴族和農民為主，工人和商人數量不多，而農民又多是文盲。1762 年以前，貴族們有服軍役的義務，然而在沙皇頒布了〈貴族解放令〉後，貴族有選擇是否要從軍的自由，這就使得一部分的貴族選擇去受更多的教育，漸漸成為知識份子階級。換言之，這些貴族出身的人們，到了國外留學（通常是法國），回國後帶給俄羅斯帝國自由的思想。回國的俄國知識份子，在俄國組成「小組」（Circles），是一種類似法國沙龍（Salon）的組織，討論一些法國社會主義相關書籍，和以黑格爾為主的著作，並批判國內政治。[41]

到了 1836 年，俄國哲學家恰達耶夫（Pyotr Yakovlevich Chaadayev；俄文：Пётр Яковлевич Чаадаев）發表了一篇文章〈哲學書簡〉（Philosophical Letters），批評俄羅斯帝國的落後，而農奴制就是阻礙國家進步的元兇，認為俄國應該向西方學習。在這之後，出現支持其思想的「西化派」，和與之對應的「斯拉夫派」，

[41] 周雪舫，**俄羅斯史**，頁 97。

[42]兩方針對俄羅斯帝國未來應採取的路線，有激烈的爭論。西化派主要認為，東正教有其缺陷，其神秘主義、禁慾主義和絕對虔誠並沒有辦法拯救俄羅斯。[43]俄羅斯必須要學習西方文明，並且要啟蒙和教化人民，才有可能進步，還應該要和西歐國家一樣，沒有農奴制度，並將自由主義、理性主義、資本主義等思想帶進俄國。斯拉夫派則認為，俄羅斯帝國有著自己獨特的道路，相信東正教是良善的宗教，對俄國是一定有利的。另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是和諧的關係，與西歐並不一致，所以俄國沒有必要完全學習西方。但實際上斯拉夫派也是反對農奴制度和反官員貪污的，他們也同樣主張俄羅斯人民要有言論自由。[44]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兩方都希望帝國是採取溫和的改革，並支持君主立憲制。在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爭論下，開始推動俄羅斯帝國思想的發展，帶給帝國強大的思想衝擊。

關於中華帝國方面，外來的思想一樣帶給帝國衝擊，並且也成為之後的革命思想。原本中華帝國自從漢朝以後，思想大體上就是獨尊儒術，明清之際，更是採用八股取士及大興文字獄，極力挾制知識分子的思想。不過，西人東來，帶來了知識與新科技，並且在中華帝國面對幾次對外戰爭後，主動或被動地去接受了西方帶來的思想衝擊。

早在十六世紀，就有歐人經由海路到達中國，[45]而西方科技進步，中華帝國事實上也早有所聞。1552 年西班牙人沙勿略（St. Francls Xavier）代表耶穌會來到中國廣州，其後還有義大利人羅明堅（Michael Ruggiero）在 1579 年進入中國內地，以及和他同是義大利人的利瑪竇（Matteo Ricci），奠定了耶穌會在中國傳教的基礎，耶穌會教士同時也為中華帝國帶來西學，例如曆法、數學、物理、地理等科學知識，另外也帶來許多西方的器物，例如報時鐘、西洋樂器、世界地圖（《萬國輿圖》）、火器、大砲等等。利瑪竇甚至還和滿清的官員徐光啟合譯《幾

[42]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Николюки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Москва: Интелвак, 2001), стр.276.

[43] 如尼古拉二世就是相信拉斯普廷的神祕主義力量，並且認為自己必須透過禁慾主義和虔誠的信仰才能使俄羅斯帝國得救。

[44] 周雪舫，**俄羅斯史**，頁 99。

[45] 1514 年（明朝正德九年）葡萄牙人到達中國海口，是歐洲人第一次藉由海路到達中國，之後西班牙、荷蘭、英國人也陸續前來。

何原本》、和李之藻合譯數學相關的書籍。還有之後的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艾儒略（Jules Aleni）分別傳授光學和力學等知識。除了西方知識與器物外，耶穌會的人來中國主要目的是為了傳教，而利瑪竇將基督教融入中華帝國傳統社會中，例如認為祭天和「上帝」就是敬耶和華，而祭祖和祭孔則是追思，並非偶像崇拜，這種作法能夠普遍讓大眾和皇族接受。其中康熙皇帝就很喜歡這些西方來的傳教士，有一次康熙高燒，服用西方教士提供的藥，立即而癒，加上康熙本身就好學，特別給予這些西洋教士特別的地位，允許他們傳教並擔任國家要職。也是在康熙的時候，康熙命西洋教士繪製了著名的《皇輿全覽圖》，是第一張經過測量而繪製的中國地圖，於 1717 年完成繪製。西方傳來的新知識和器物，帶給中華帝國很大的衝擊和驚豔。甚至有人能擺脫傳統中原為世界中心的思維，寫文章極力讚賞西方的知識與制度：

「太西諸國原不同於諸蠻貊之固陋，而更有中邦所不知者。……天載之義，格物之書，象數之用，律曆之解，莫不窮源探委，我中土之學問不如也。……自鳴之鐘，照遠之鏡，舉重之器，不鼓之樂，莫不精工絕倫，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荷戈之士，皆萬人敵，臨陣勇敢，誓死不顧，巨砲所擊，皆使堅城立碎，固壘隨移，我中土之武備不如也。……以如是之人心風俗，而鄙之為夷狄，吾惟恐其不夷也。」[46]

不過，耶穌會的這些傳教士，由於涉及政治議題，也常常讓許多中華帝國的官員相當反感。早在明清之際，南方的耶穌會教士就支持南明的復國運動，而北京的教士則想擁護滿清政權。此外，由於西方教士帶來的曆法較為準確，威脅到原本修改曆法的中國官員的地位，再加上西方教士獲得中華帝國皇帝欽賴後，也常常給予政策上的建言，自然引起更多朝臣的不滿。但讓西學一度在中國中斷的

[46] 此為中國朱宗光所寫，當時寫做「太西」，但更常見的用法是「泰西」，是當時對西方各國的稱呼。請參考：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32。

關鍵原因之一，是教士後來彼此因為教義問題產生內訌。原本利瑪竇到中國時，發現儒家思想是不容更動的，所以將祭天當作是敬耶和華，祭祖和祭孔是追思。但對中華帝國原有的理學和道學，以及從印度傳來的佛教，都有所批評。[47]另外，利瑪竇對中國傳統信仰的解釋，當時就沒被所有教士接受，後來與耶穌會意見常常相左的多明我會（Dominicans）也前來中華帝國，趁機攻詆耶穌會在中華帝國傳教時在教義上的解釋，最後教皇規定不可祭祖、祭孔，敬天與上帝等字樣也都不可用，只能使用「天主」之字樣。加上前來告知教皇命令的使節態度不佳，康熙大怒，傳諭「今後如不遵利瑪竇的規矩，斷不准在中國住。」[48]西教大受打擊，之後雍正即位，痛恨西洋教士干預宮廷政爭，開始有禁教之意，到乾隆以後西洋教士漸漸絕跡。而無法在中國傳教，教士前來教授西學的意願也變少，西學也因此中斷。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由於 1846 年傳教弛禁，中華帝國重新開放西教，耶穌會再度興起，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教士也前來傳新教，比天主教新穎、活潑，帶給中華帝國許多西方文化，不過天主教歷史較久，新教的影響力大致限於通商港口附近。不論如何，西教的再度開放重新為中華帝國帶來許多近代西方文化，使得中華帝國在面臨內憂外患下，想藉由學習西方使自身便強大。由於此次戰爭，中國已經有研究西事者，並有想增強武力的念頭，例如魏源主張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自強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思想中誕生的。[49]但必須注意的是，此時中華帝國認為西方強勢的只是器物和科技，中華帝國傳統思維還是沒有太大的變化，這也是自強運動堅持「中體西用」的原因。

與俄羅斯的情形作比較，可以發現俄羅斯帝國的知識份子階級形成不久，並且許多都有在國外留學的經驗，能夠帶給俄羅斯本土思想上的衝擊，很快出現維護本土的斯拉夫派以及要求學習西方的西化派之爭，對於俄羅斯的思想發展帶來

[47] 耶穌會教士稱佛教所言的天地是無稽之談，理學和道學所說的「天即理」是虛無、空洞的，這讓理學家相當不滿，而康熙原本就宏獎理學，自然對耶穌會教士的論點有所不悅。
[4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37。
[49] 有關自強運動，請參考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多元的助益。中華帝國方面，由於都是在國內環境所培養出來的知識份子，知識長期處於封閉狀態，並且受到科舉八股文取士的影響，並沒有辦法接受太多外國的思潮。即使利瑪竇等人以傳教的名義帶給中華帝國許多新的事物，但關心的知識份子只佔其少數，並且由於之後外國傳教士涉及宮廷內部的黨爭，以及傳統知識份子的利益，讓中華帝國一度禁止西教的傳入，造成中國的思想故步自封一陣子。

二、19 世紀中葉後的思想衝擊

1850 年代，俄羅斯帝國出現新生代的知識份子，但在時空背景的不同影響下，新生代的知識份子的思想和其上一代並不一致。[50]如果前面所提的知識份子是自由主義者，那麼新生代的知識份子就是革命者。[51]不論是斯拉夫派或是西化派，都是希望溫和的改革，但新生代認為改革速度太慢，他們急於改變，希望透過激進的革命手段來達成俄羅斯的改革。

此時又有新的思潮傳入俄羅斯帝國，首先是大約在 1860 年代的虛無主義，虛無主義反對一切的傳統和權威，一切都必須經過實證的科學才可信，重視實物的實用性，反對迷信和宗教等看不見又不知真偽的事物。[52]另外，受到虛無主義的一些影響，民粹主義也隨之傳入俄國，同樣反對依賴宗教來達到幸福，認為應當幫助農民獲得土地和自由，使農民意識到自己的需要，並應當發動革命來達成。換言之，民粹主義者支持透過暴力的手段來使人民獲得自由和幸福，認為只要革命成功，俄羅斯帝國就能走向社會主義的社會。[53]時值 1861 年沙皇頒布〈農民解放令〉，造成農民的暴動，讓這些民粹主義者認為其思想是可行的。在 1860 到 1870 年代，民粹主義者都是支持革命活動，可分為「小組」、「到民間去」和

[50] Stuart Ramsay Tompkins,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Mak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United Stat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7), p.40.
[51] 周雪舫，**俄羅斯史**，頁 117。
[52] 張建華，「俄國近代政治恐怖主義的源流」，**史學月刊**，第 1 期（2007 年），頁 91。
[53] Donald W. Treadgold, “Russian Radical Thought, 1894-1917,” in Theofanis George Stavrou ed., *Russia under the Last Tsar* (United Stat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1), p.69.

「恐怖主義」三個階段，到了 1880 至 1890 年代，則改為反對革命，認為應該回到溫和改革的路線。

首先，民粹主義者巴枯寧[54]（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俄文：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反對一切國家制度，希望用暴力的方式推翻舊政權，對於民粹主義份子帶來很深的影響。在 1860 年代末期，俄羅斯帝國內部的民粹主義者先是成立「小組」，主要對年輕的學生宣傳思想，之後在 1870 年代初也試著對工人和農民傳播思想，但成效並不大，甚至引起工人和農民的懷疑。1874 年後，這些接受巴枯寧等人思想的學生，帶著熱情「到民間去」，認為要去了解農民，進行思想的宣傳。他們「穿上農民的衣服，模仿農民的語言，充當助產士、工匠、鞋匠與農民共同生活。」[55]但反而受到農民的猜忌，通知政府人員逮捕，過幾年就結束這種活動了。然而，由於政府對這些革命者相當嚴厲，讓這些革命成員改以暗殺活動作為報復，他們仍然相信農民終究會產生暴動，因此持續向農民宣傳其思想。[56]

與民粹主義有關連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傳入。1869 年巴枯寧首先翻譯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之後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翻譯版本也在俄國出版，引起民粹主義者的熱烈討論，民粹主義者認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並不同意馬克思的唯物論。但不論如何，這樣的討論讓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俄國發展，加上由於民粹主義者的恐怖行動，讓新上任的沙皇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Alexandrovich Romanov；俄文：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高壓查緝，使這些革命份子逃亡國外。此時，普列漢諾夫[57]（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

---

[54] 巴枯寧是俄國的哲學家與革命家，受黑格爾的影響很深，其自身的思想也帶給俄羅斯知識份子廣泛的影響。

[55] 周雪舫，**俄羅斯史**，頁 122。

[56] 1881 年革命份子甚至暗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然而繼任的亞歷山大三世採取更高壓的手段來對付革命份子，此外，原本革命者期待的農民暴動也沒有因此發生。

[57] 普列漢諾夫也被稱為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早期曾加入民粹主義組織，但後來感到民粹主義者的恐怖行動無法使革命成功，加上被俄國政府查緝而逃往國外。之後接觸馬克思主義並重新翻譯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普列漢諾夫的思想也讓許多俄國知識份子改而接受馬克思主義。請參考：”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Академик,* <http://dic.academic.ru/dic.nsf/enc_philosophy/937/ ПЛЕХАНОВ> (17/7/2013).

俄文：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批評民粹主義，認為其放棄以農民為革命力量是錯誤的，他也強調「歷史的向前發展是靠群眾的參與，個人英雄無法改變歷史發展的總方向。」[58]另外，由於俄羅斯解放農奴，工人數量開始增加，逐漸也形成一個階級。但由於受到的待遇並不好，工人們成立組織，希望能改善生活和工作的環境。到了 1880 年代後期，開始和馬克斯主義接觸，為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奠下基礎。

中華帝國方面，到了甲午戰爭後，中華帝國的知識份子普遍開始尋求自強運動失敗的原因，才進而認為中華帝國制度本身需要重新建構，改制的聲浪漸漸形成。此時出現了以君主立憲為思想的立憲派，和認為必須推翻舊政權才能改革的革命派，立憲派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最為有名，革命派則有孫逸仙[59]等人的領導。立憲派主要思想為，根據中華帝國當前腐敗的部分加以改革，君主也應當給予人民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力，並且任用新的人才，廢除不必要的機構。至於革命派主要思想為希望建立民族、民主的國家，並認為專制政權是不可能解決中國當前的困難，必須推翻原有的制度，仿效西方的制度，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換言之，康有為領導的立憲派自上而下的改革，孫逸仙領導的革命派是自下而上的改革。[60]兩派的思想都深深受到西方思想的衝擊，並且也都帶給當時知識份子深遠的影響。其後立憲派的思想主要表現在戊戌變法上，而革命派的思想主要影響辛亥革命和之前的革命運動。[61]

三、思想衝擊比較

將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所面臨的思想衝擊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兩者在許多層面上是不相同的。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於俄羅斯帝國的思想傳入是主動的，即在知識份子階級形成後，留學國外的知識份子將國外的思想帶入國內宣傳，並且沒

[58] 周雪舫，**俄羅斯史**，頁 126。
[59] 孫文（1866-1925），號中山，字逸仙，廣東香山人，對外接觸機會多，在香港畢業。由於甲午戰爭失敗，加上李鴻章不理會其改革意見，使孫逸仙認為只有革命才能改變中國的局勢。
[60]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353。
[61] 有關戊戌變法，請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辛亥革命請見本章第三節。

有受到外國宗教的影響，甚至還有開始質疑宗教等思潮；反觀中華帝國的思想傳入，可以說都是被動的，尤其早期都是西方教士主動前來傳教，才連帶將西方的器物、科技、思想慢慢一併帶入國內，直到自強運動開始才有將知識份子階級送往國外，但也是為了應付西方的強勢而被迫做的選擇。當然，這必須考慮的地理因素的限制，但這種差異確實讓兩個帝國的思想衝擊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

此外，俄羅斯帝國的新思潮，都是在探討俄羅斯當時不合理的各項制度，從農奴制到專制制度都是其致力研究、討論的事物；而中華帝國的知識份子，前期只在意物質層面的革新，到了甲午戰爭後才漸漸有越來越多知識份子關心國內的各項制度。

然而，兩個帝國在面臨思想衝擊時，國內都有想維護原本傳統思想的派系，例如俄羅斯帝國的西化派和斯拉夫派之爭，中華帝國也有中體西用的理論，不過必須注意的是，俄羅斯的斯拉夫派還是支持廢除農奴制度和建立君主立憲制，而中國的中體西用則是希望盡可能保有原本的制度，所需要學習西方的僅是船堅炮利等物質面的事物。到了帝國晚期，兩國都出現立憲派和革命派之爭，這也和兩者受到的思想衝擊有絕對的關聯。有趣的是，兩國的立憲派最後都因為執政者不願意真正地放棄專制統治，漸而支持或同情革命派，使革命派的勢力大增，對之後的帝國崩潰帶來決定性的作用。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表 4-2：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思想衝擊之比較

	本國與外國初次思想衝擊	19 世紀中葉後的思想衝擊
俄羅斯帝國	西化派、斯拉夫派之爭（未有定論），傳入自由主義、理性主義、資本主義等思潮，主張君主立憲	虛無主義、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新思潮傳入，立憲派與革命派競爭
中華帝國	利瑪竇等人傳教與帶來西方科技，教士與傳統知識份子之爭（禁教，傳統派勝利）； 自強運動時主張中體西用	甲午戰爭後才有立憲派與革命派的競爭，民族、民主、自由思想傳入

（表格：筆者自製）

第三節　人民反抗之比較

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晚期都面臨數次的人民反抗活動，造成社會動盪，以及政局的不穩，其中兩個帝國後期正好都有二次大規模的事件。首先，俄羅斯帝國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先是面臨 1905 年的革命，[62]接著在 1917 年的二月革命讓俄羅斯帝國完全崩潰。中華帝國方面，則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在 1851 年至 1864 年間面臨的太平天國，[63]以及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反對清朝和立憲派的一系列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最後在辛亥革命的勝利正式結束帝國的統治。[64]本章先分別敘述兩國的第一次大規模人民反抗活動，並進行比較。接者探討最後壓垮帝國的第二次人民反抗活動。

一、1905 年革命與太平天國

俄羅斯帝國第一次面臨危及政權的革命，即 1905 年的俄羅斯革命。十九世紀末，俄羅斯政黨林立，主要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的政黨、以民粹主義為思想的政黨和支持君主立憲的政黨等，這些政黨對俄羅斯帝國而言都是革命政黨。換言之，俄羅斯國內各政黨都強烈希望俄羅斯可以改革。當時正好是俄羅斯帝國向遠東擴張的時候，與日本方面有利益上的衝突，加上國內革命、罷工等運動越來越多，俄羅斯帝國決定透過對外戰爭來轉移人民的焦點，[65]並且認為戰爭勝利可以阻擋俄羅斯內部的革命力量。然而，由於對日戰爭的失敗，以及之後發生的「血

[62] 俄羅斯 1905 年革命的時間點事實上是從 1905 年到 1907 年之間，爆發原因主要是對政府長期不滿所導致的反政府行動，並受到日俄戰爭失利所引爆。

[63] 1850 年末，洪秀全等人在廣州金田發動對抗大清帝國的起義運動，並在 1851 年至 1861 年間稱國號為「太平天國」，但在 1861 年有段時間改稱「上帝天國」，1861 至 1864 年間又改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本文為求容易理解所述，不論時間點均稱太平天國，不特別區分。

[64] 辛亥革命有廣義和狹義的定義，狹義的辛亥革命，代表西元 1911 年（中國農曆辛亥年）發動的武昌起義，一直到清朝宣統皇帝宣布退位，中華民國 1912 年正式建年為止。廣義的辛亥革命，則指十九世紀末到辛亥年間，中華帝國內部發生的一系列以推翻專制統治為目標的革命運動。本文所言的辛亥革命採用廣義的定義。

[65] 周雪舫，**俄羅斯史**，頁 143-144。

腥星期日」事件，[66]反而讓俄國人民更加不信任政府，而且戰爭所引起的經濟問題，也讓人民更加不滿。各地革命運動越來越激烈，甚至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社會革命黨，也發動許多暗殺行動，導致俄羅斯帝國很多重要人士遭到暗殺，包含官員、軍警、地主、商人和神職人員等等，1907 年時，平均每天有 18 人遭暗殺身亡。[67]加上各地時常發生暴動，讓俄羅斯帝國的政權出現危機。

不過，長期對外戰爭，加上國內動亂嚴重，迫使俄羅斯帝國加速改革。這次戰爭導致尼古拉二世在 1906 年制定〈基本法〉(類似憲法)、成立國家杜馬(Duma；俄文：Дума）[68]、立法議會與施行多黨制。1906 年 4 月，威特籌措 9 億盧布的借款，以重建俄羅斯帝國的財政。同年 5 月，斯托里賓為了防止恐怖攻擊，引進新的司法制度，允許迅速逮捕和審判犯人，之後也讓暗殺活動有減緩的現象。[69]

中華帝國方面，由於其財政本身就有其缺陷，貪腐情形嚴重，地方動亂的情形一直都存在著。外國商人前來販賣鴉片後，更是讓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銀價高居不下，民生經濟出現困難，而鴉片戰爭，更是讓國內財政更加惡化。太平天國出現的背景，也和民生、社會經濟有很大的關連。洪秀全是廣東人，原本是準備科考的傳統知識份子，一次偶然的機會得到一本引基督教聖經並解說其教義的書。後來洪秀全遭遇一次大病，病後稱自己是耶穌基督的弟弟，天父上帝要他拯救世人。1843 年，[70]他於是和志同道合的馮雲山創立「拜上帝會」，開始進行宗教和政治上的宣傳，認為必須揚棄孔儒思想，並且驅逐「韃虜」，在廣東、廣西壯大勢力，以吸收農民為主，並有軍事上的建構和訓練，使其成為兵民合一的國家。到了 1850 年 7 月，拜上帝會號召成員到廣西金田，之後開始有對抗清軍的軍事行動，並在隔年建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軍隊稱為「太平軍」，領導階層也很有組織，除了知識分子洪秀全、馮雲山，還有工農階級楊秀清、蕭朝貴，紳士地主韋正、石達開、胡以晃，和鄉勇秦日剛。由於太平軍有堅定的宗教

[66] 有關此事件請參考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67] 蕭文煜，「恐怖主義與晚期俄羅斯帝國民粹派革命運動之研究(1861-1917)」，頁 81。
[68] 即俄羅斯國會，杜馬一詞後來也成為俄羅斯聯邦會議下議院的名稱。
[69] 有關改革細節，請參考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70] 即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隔年。

信仰，行軍頗能約束軍隊，是支意志堅定、強而有力、又受人民愛戴的隊伍。[71]很明顯，太平天國是帶有宗教理論和民族主義所建構而成的君主專制國。

由於大平天國制度嚴明、軍隊堅強，面對紀律鬆散、實力空虛的清軍，幾乎可說是勢如破竹，1853 年攻下武昌、南京，最後在南京建都，改名「天京」。之後甚至嘗試「北伐」和「西征」，希望能夠直搗大清帝國的政治中心、擴張版圖，不過主要由於兵力不足，而未能成功。

此外，由於太平天國的信仰是以基督教為基礎而發展的宗教，[72]加上制度嚴謹，西方各國普遍能接受太平天國的存在，甚至有以為太平天國終將取代大清帝國者。然而由於太平天國是個極度封建的政體，又保有傳統中華帝國以自己為重心的思維，例如外國人前來建立外交關係時，都將其認定是「天下萬國皆來降」，天王擁有世界宗教和政治的最高地位。[73]因此外國人對太平天國與大清帝國的戰事，多保留中立態度。並且由於太平天國拋棄孔孟思想，說是「妖書邪說」，搗毀傳統廟宇，說是「異端邪教」，引起中華帝國傳統知識分子不滿，漸而形成一股對抗的勢力。不過要打擊太平天國，勢必需要有可以抗衡的武裝力量，然而正如本文第三章所述，大清帝國的軍隊早已無力抵擋。

此時，以曾國藩領導的湘軍在這時為大清帝國發揮重大的作用。在 1853 年太平軍試圖向湖南擴張的時候，曾國藩受命在湖南團練，建立地方的武裝力量，稱為湘軍，由於曾國藩率領的軍隊確實能和太平軍抗衡，漸而取代綠營的軍事地位，加上曾國藩以保護傳統文教之名而戰，受到大清帝國統治階層和中華帝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愛戴。[74]在抵擋住太平軍的攻勢之後，湘軍開始「東征」，雙方互有勝負。然而不久之後太平天國內部因為政治鬥爭發生內訌，嚴重打擊太平天國

[7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105。
[72] 太平天國的宗教信仰稱為「上帝教」或「洪教」，是在基督教教義加上洪秀全等人的思想而形成，最後太平天國的領導階層都被神格化，領導階層也自認是神或神的代表。
[73] 郭廷以，前揭書，頁 114-115。
[74] 然而曾國藩只批評洪秀全等人蔑視傳統禮教和荼毒百姓，刻意迴避洪秀全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此外，曾國藩攻破太平天國首都「天京」時，也殺害許多城內百姓。

的國力，[75]加上外國認為太平天國比大清帝國更難以溝通，因此英、法、美等國仍承認大清帝國為合法政府。例如英國不允許大清帝國或太平天國的戰事進入上海，1862 年太平天國執意攻打上海，外國人於是和大清帝國聯合，甚至成立了「洋槍隊」和太平軍對抗，[76]加上曾國藩的軍隊勇猛，太平天國則自從內亂後軍紀越來越渙散，洪秀全性格則越來越乖僻，不信任部屬，反而更熱衷於自己建構下的宗教，足可預見其終將失敗。1861 年大清帝國的軍隊先攻下安慶，1863 年湘軍包圍首都天京，隔年洪秀全服毒自殺，太平軍幾乎瓦解，殘部也在之後數年被消滅，中華帝國解決了一次危機。

與俄羅斯的 1905 年革命做比較，可以發現，兩者存在許多相異處，但都和國內經濟問題有關，而又因為戰爭後擴大帝國內部的經濟問題，如俄羅斯在日俄戰爭失敗後爆發更多經濟問題，而太平天國則有鴉片戰爭後，中華帝國白銀流失更加嚴重的問題。不過以人民反抗的規模而言，1905 年革命規模較小，雖然各地都有革命，但都不足以和帝國對抗。太平天國的規模則相當龐大，涉及中華帝國多個省份，並且軍事力量足以和帝國抗衡，一度威脅到帝國的存亡。兩者革命思想及方式也存有相當不同的特點，1905 年的革命，含有民粹主義的思想，並以暗殺的方式作為主要的革命手段，這種作戰方式難以對帝國產生真正的威脅。然而，太平天國依靠的是宗教力量和民族主義作為其信仰，但並沒有脫離其封建和專制的思維，即使太平天國真正獲得勝利，那也只是讓中華帝國轉變成民族國家，其政治制度還是君主專制，帝國只是改變執政階級，而非崩潰。雖然後來兩次人民反抗運動都被平定，但不論是俄羅斯在 1905 年的革命，或是中國十九世紀中後期的太平天國，都顯示出兩個帝國的統治出現問題，並且帶來嚴重的政治危機。

---

[75] 太平天國至少發生四次內訌，第一次是太平天國的楊秀清有意取代洪秀全，後來被韋正、秦日鋼等人殺害，但支持楊秀清者有二萬多人，其中可能包含石達開；第二次即石達開被韋正追殺而逃；第三次為石達開率兵回討，而洪秀全也想解決韋正和秦日綱；第四次是洪秀全開始不信任外臣，石達開於是出走，太平天國失去重要的軍事統帥。詳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130-132。

[76] 太平軍事實上內部也有外國人幫忙戰事，但多屬於投機性質，且必須完全聽命於太平天國的領導層，太平天國中後期出現不少外國逃兵。

二、二月革命與辛亥革命

俄羅斯帝國在面臨 1905 年革命後，又在 1917 年面臨了二月革命，而這次確實讓俄羅斯帝國崩潰，改而成立臨時政府，終結了俄羅斯君主專制的政體。

尼古拉二世在位的後期，就已經出現許多希望沙皇退位的言論，就連尼古拉二世本人都聽說過這些傳言。[77]當時主要有「十月黨人」等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人士，希望能夠將君主專制改變成君主憲政體制，因此他們並非希望俄羅斯沒有沙皇，而是希望能夠替換掉尼古拉二世，另外找一個能夠接受憲政的君主來當他們的新沙皇。他們也很擔心有革命份子想摧毀君主制度，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人認為君主制度有其存在必要，因此他們希望盡快能發動政變，讓俄羅斯朝向君主憲政的道路前進。十月黨人的領袖古馳寇夫（Alexander Ivanovich Guchkov；俄文：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就希望尼古拉二世能夠將其皇位傳給兒子阿列克謝，皇子成年前由米開爾（尼古拉二世的弟弟，Mikhail Aleksandrovich；俄文：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輔政，但計畫未能實行。[78]另外，也有人提出則希望先讓皇后遠離彼得格勒，不讓其涉及政治，再讓皇位交由尼古拉二世的叔叔尼古拉耶維奇（Nikolay Nikolayevich；俄文：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但被尼古拉耶維奇拒絕。

不過實際上更加嚴重的問題，是俄羅斯人民的民生問題。第一次大戰，俄羅斯帝國對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影響人民的食物和燃料的供應，同時生產力也急速下滑，因為許多人力前往應付戰事。此外，俄羅斯由於幅員廣大，運輸上出現嚴重問題，戰爭時必須運送武器，無法完全讓運輸網路都運送民生物品，且造成過於頻繁和超重運輸等問題。例如俄羅斯火車頭耗損的情形相當嚴重，大戰初期火車頭共有 20,271 座，但 1917 年初，僅剩 9,210 座。[79]1917 年 3 月 8 日（儒略

---

[77] 賀允宜，**俄國史**，頁 547。

[78] "Гуч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Мо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http://www.ros-istor.ru/node/154>, (20/7/2013).

[79] 賀允宜，前揭書，頁 549。

曆 2 月 23 日），由於天氣寒冷，俄羅斯帝國的鐵路網路癱瘓，彼得格勒的民生物資出現供應問題，有許多人在社會主義者的領導下示威遊行，主要訴求是男女平等，但也有人喊著「給我們麵包」的口號，隔天依然有許多遊行者出現，這時開始有人喊著「打倒君主專政」或是「停止戰爭」等口號，不過由於維持秩序的騎兵都沒有進行鎮壓，避免與民眾發生衝突，因此並沒有爆發大規模的革命。然而，彼得格勒聚集的人數越來越多，到了 3 月 11 日，維持秩序的軍人，看到一大群工人強行奔來，想開槍阻止，導致許多人傷亡，被稱作是「第二個血腥星期日」[80]。示威運動的衝突升高，最後連軍隊裡都有許多人叛變，他們認為寧可違抗軍令也不要槍殺自己的人民，3 月 12 日，駐守在彼得格勒的 16 萬名官兵，有一半以上參與兵變。情況一發不可收拾，連皇后都已經認為非讓步不可。尼古拉二世聞訊想趕回首都，中途卻因為鐵路被佔領，只好往北方戰區找茹茲斯基將軍（Nikolai Vladimirovich Ruzsky；俄文：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узский），但茹茲斯基本來就對沙皇有所不滿，也支持杜馬議會，認為君主專制早已過時，因此之後幾天尼古拉二世幾乎都是被軟禁在車廂裡，等候杜馬議會主席前來，告知他國內局勢的變化，最後被迫宣布退位。[81]

1917 年二月革命爆發原因，主要可歸因於當時俄羅斯帝國國內政治意識蓬勃發展，其中革命思想越來越被廣為接受。另外，政府體制本身的缺陷，暴露出俄羅斯帝國的無能，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羅斯深陷其中，國力更加衰落。在經濟問題上，俄國國內的通膨與糧食短缺問題日益嚴重。種種現象都讓帝俄的人民不再信任沙皇，導致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俄羅斯帝國正式走向歷史，取而代之的是俄國臨時政府，臨時政府由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政治聯盟所組成，屬於一種民主革命。

至於中華帝國方面，1880 年以後，孫逸仙等人開始想要尋求政治革新，首

[80] 1917 年 3 月 11 日正好也是星期日。

[81] Эдвард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Радзинский, *Цари. Романовы. История династии,* Книга на сайте: <http://www.e-reading.biz/bookreader.php/1022070/Radzinskiy_-_Cari._Romanovy._Istoriya_dinastii.html#label349>, (Litres, 2013).

先在 1894 年成立「興中會」，作為革命的起點。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開始和革命人士有所接觸，並漸漸轉而支持革命，其言論帶動很多迴響。八國聯軍後，許多中華帝國內的漢族視滿族統治階級為「外族」，開始有強烈的排滿情緒。1903 年有黃興等人成立的「華興會」和蔡元培等人所的「光復會」，另外，1907 年在日本東京也組織「共進會」，皆是屬於重要的革命組織。此外，革命黨人極力透過報紙和知識分子的宣傳，希望能建立民族國家，頗能得到國內人民的同情。

1906 年到 1911 年間，革命黨人發動多達 11 次革命，主要是在長江流域（3 次）和廣東（6 次）發起，但都以失敗告結，其原因主要是革命黨人實力不足，以及各路領導者的目標分散。之後，革命黨決定應該先在長江流域各省同時發動革命，建立政府，再開始北伐。

1911 年 5 月，立憲派所冀望的內閣成立，但因為內閣組成多為原本的皇族，並不符合立憲派所說的「君主立憲」，使得許多原本的立憲派人士轉而支持革命。同時，中華帝國開始實施鐵路國有政策，希望收回原本由民間投資的鐵路，以鞏固中央集權，但普遍不被地方接受，在四川有民間發起「保路運動」，和大清帝國的軍隊發生嚴重衝突，給了革命黨有利的機會，開始和清軍交戰。大清帝國為了鎮壓四川的保路運動，開始調動軍隊，但反而有利於革命黨的行動，因為大清帝國的軍隊中，不少人士和革命黨是有關係的。[82]同年十月九日，在漢口革命黨人為革命做準備，卻因為事跡敗露許多機關被捕獲，這時蔣翊武決定在武昌發動起義，十月十日，武昌被革命軍攻下，時值中國傳統紀年辛亥年，被視為辛亥革命的開始，此後革命黨人漸漸累積實力，並且有集中的領導。不久，長江流域各省也發動起義，並分別宣佈獨立，共計 14 省。[83]

大清帝國為了防止革命擴大，任命當時實力強勁的袁世凱，希望他可以擺平亂事，不過袁世凱明白革命軍普遍受到人民支持，而大清帝國則不再得民心，加

[82] 例如大清帝國決定約 8,000 名士兵留守武漢，但大約有一半的人和革命黨有關係，且武漢變的空虛，給予革命黨發動革命的機會。

[83] 分別為：湖南、湖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貴州、江蘇、浙江、廣西、廣州、安徽、福建、山東，共 14 省。但山東在袁世凱的態度轉變下，復又取消獨立。關於各地的戰爭細節，請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460-464。

上袁世凱本身是漢人，認為即使幫助大清帝國，之後也未必能有所利益，於是採取兩邊要挾的方式。這導致大清帝國和革命黨人都極力想攏絡袁世凱，最後以革命黨人推薦袁世凱為民國總統，使袁世凱接受革命黨人的訴求。於是大清帝國在自知無法抵抗的情況下，決定交出政權，先是由載灃解除「攝政王」的名位，溥儀（宣統皇帝）宣布退位，但中華民國政府將給予優待，宮廷內依然是大清帝國，屬於國中之國，是當時一種妥協的方式。而大清帝國宣布由袁世凱組成臨時共和政府，再由原本革命黨建立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追認，自此中華帝國可說實質上已經滅亡。

二月革命和辛亥革命，是真正導致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崩潰的關鍵戰役。必須提到的是，兩國革命的爆發前，都有對外戰事，例如俄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則是對西方各國宣戰。同樣的，兩國都因為戰爭不利而使國內經濟和社會更加動盪，給予革命人士相當有利的機會，人民和原本支持立憲的知識份子大多轉而支持革命黨。但兩國本質上有些微的不同，其中最明顯的差異，是俄羅斯帝國原本就屬於多民族國家，加上統治者就是該國最大的民族，因此在二月革命時，並沒有以建立民族國家為口號，而是以希望解決經濟問題和建立民主政權為號召；中華帝國則因為統治階級為少數民族，因此辛亥革命除了以建立民主政權外，還有提出建立民族國家為口號，這使得中國內部的主體民族更容易去支持革命黨，所以事實上兩國人民的革命力量，中華帝國是較強大且具威脅的。然而，這卻不影響兩個帝國最終走向滅亡的命運，這與兩個帝國的正規軍隊有很大的關係，例如俄羅斯方面，有許多軍隊最後選擇站在人民這邊，共同反抗沙皇，而中國方面也有許多軍隊，因為民族本身屬於主體民族，紛紛倒向革命黨，致使帝國無力反抗革命勢力，兩國的皇帝最後都只能選擇退位結束政權。最後，兩國都因為人民反抗運動的成功，成立了具有民主性質的臨時政府。

表 4-3：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人民反抗之比較

人民反抗活動	起因	規模	特點	結果
1905 年革命	日俄戰爭戰敗，國內經濟問題更加嚴重，群眾示威被鎮壓	相對較小，且各地都有零星的革命行動，力量較弱	從 1905 年一直持續到 1907 年，帶有民粹主義思想，以暗殺方式為主	暗殺活動因為執政者高壓統治而漸漸平息，帝國漸漸恢復秩序
太平天國	以宗教為號召，在地方漸漸形成強大的軍事力量，繼而反抗原統治者	有一定規模，佔領帝國內部許多重要城鎮，形成國中之國的局勢，威脅到中央	以宗教和嚴謹的制度領導群眾，帶有民族主義思想，但未擺脫君主專制的型態與封建思想，並大肆破壞原傳統文化和思想	雖一度威脅帝國存亡，但最後被平定，以失敗告結
二月革命	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國內經濟問題更加嚴重，人民面臨飢荒危機	規模較大，但事實上中央有機會阻止規模擴大，不過最後在許多軍隊叛變的情況下使反抗規模擴大	政治上以民主為號召，經濟上強烈要求停戰，以使國內穩定	俄羅斯帝國崩潰，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建立含有民主主義的臨時政府
辛亥革命	八國聯軍戰敗後，人民經濟無力負擔高額稅賦，感受到原執政者的腐敗	集結各路革命派的人士，規模越來越大，且受許多人民支持	以民族、民主主義為號召，但由於革命派實力無法輕易打敗其他勢力，以和袁世凱達成協議才推翻中華帝國	中華帝國崩潰，建立含有民主主義的臨時政府

（表格：筆者自製）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探討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崩潰的外部因素，以及兩國人民反抗的活動。在外部因素上，本章已經確定對外戰事和思想衝擊是影響兩個帝國崩潰的重要因素，而這些外部因素結合第三章所言的內部因素，導致兩國的人民出現大規模的反抗運動。

對外戰爭的比較上，本章已經說明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的異同。首先，因為尋求領土擴張和支持東正教徒的獨立運動，俄羅斯和土耳其等國爆發克里米亞戰爭，而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讓俄羅斯感受到自身制度的缺陷，其中以軍事制度的問題最為執政者關心，但國內的經濟、社會問題也同樣受到關注，促使俄國改革，並有大量的西歐思想開始傳入，此時帝國內部還算穩定。到了日俄戰爭後，證明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是失敗的，俄國國內人民開始有反抗運動，雖然還是有許多人支持沙皇，但也尋求用君主立憲的方式來取代專制政權。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暴露出俄羅斯帝國沒有想改變原有的體制，加上國內經濟與社會動盪，導致立憲人士漸漸轉而支持革命，最後迫使沙皇退位。

至於中華帝國方面也有相似的命運。如本章第一節所言，中國因為對外貿易問題而爆發鴉片戰爭，同樣也在對外戰爭失敗後感受到自身軍事實力的不足，尋求軍事和科技上的進步。此時中華帝國內部雖然有面對太平天國的壓力，但在太平天國被平定之後，政權勉強穩定下來，並也開始積極改革。不過，到了甲午戰爭後，亦證明自強運動的失敗，國內革命聲浪漸漸興起，值得注意的是，和俄羅斯帝國一樣，中華帝國也是有許多人支持以君主立憲來代替君主專制。可是在八國聯軍失敗後，完全重挫中華帝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社會動盪不安，加上執政者不願真正施行立憲制度，致使許多立憲派也轉而支持革命黨，最後皇帝也是在被迫的情形下退位，中華帝國也同樣難逃崩潰的命運。

然而，兩個帝國在細部上有很大的不同，在對外戰爭上俄國多屬主動，而中

國是被動的。思想衝擊上，俄羅斯的知識份子原本就尋求各層面的制度改革，而中華帝國一開始只想學習物質面的改革，甲午戰爭後才普遍思考制度面的問題。這可能和俄羅斯的知識份子階級形成時間較晚，並且在地緣上鄰近西歐國家有關係，可以較容易接觸和接受外來的思想。至於中華帝國方面，知識份子階級存在的時間久遠，加上地理上離西歐國家較遠，且自古以來交流甚少，因此難以輕易接受外來思想。然而，想保留傳統文化和制度的心態，兩國的情形是相似的，例如俄羅斯帝國有西化派和斯拉夫派之爭，中華帝國則有堅持中體西用的言論。

最後，在人民反抗的活動中，可以發現俄羅斯帝國人民的反抗與經濟問題最有關連，若能解決經濟問題，俄羅斯帝國面臨崩潰的危機將會大幅縮小，如同布爾什維克黨人士所言：「革甚麼命，你只要給工人一磅麵包，這個運動就馬上煙消雲散。」[84]反觀中華帝國的人民反抗活動，經濟問題雖然也是主因之一，但還帶有民族主義的思想在其中，使得革命更容易被人民接受。而俄羅斯帝國原本就屬多民族的國家，在反抗活動中不太可能出現以建立民族國家作為運動的號召。曾有中國的革命份子說：

「在俄國，君主和人民都是斯拉夫人。人民只因為受不了專制政治的毒害，便願意犧牲成百萬的生命以追求自由……但我看到我的國家時，我更是情緒激昂。因為，它不但有像俄國一樣的獨裁政體，而且兩百年來，我們都生活在外來蠻族的踐踏之下。」[85]

本章將兩個帝國崩潰的外部因素進行比較後，以宏觀的觀點來看，發現兩國確實有許多相似之處，但若以微觀的觀點來看，又可找出許多相異之處，這些異同在本章的各章節已有說明。筆者認為，探究帝國崩潰的原因本身是相當大的議題，以宏觀的觀點應該比微觀的觀點更為恰當。而由於俄國和中國內外因素的共

[84] 賀允宜，**俄國史**，頁 551。
[85] 艾瑞克・霍布斯邦 著，賈士蘅 譯，**帝國的年代：1875-1914**，頁 403。

同影響下，導致人民群起反抗，此為帝國崩潰的必然結果。專制政權不願順應時局和民心，必然會使人民反抗，終而滅亡。如同霍布斯邦形容俄羅斯帝國的崩潰：

「如果要問當時人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需要革命且必定會發生革命，答案無疑是沙皇治下的俄國。……除非能說服沙皇推行由上而下的政治大改革，否則唯一能改變國家的方法便是革命。」[86]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86] 同前註，頁 424。

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了解俄羅斯帝國與中華帝國崩潰的原因，並且希望能比較兩國發生崩潰原因的相似處及相異處。然而，帝國崩潰的原因是複雜且多面向的，本研究僅能試圖找出兩個帝國崩潰原因的主要脈絡。誠如郭廷以所言：「任何民族的命運，胥決之於其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力，亦即決之於文化。」[1]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由於都無法適應當時國際環境的改變，在當權者無法適當處理的情況下，加上其帝國內部因素，導致兩國都面臨崩潰的命運，分別在 1917 年和 1912 年正式垮台。

本研究認為，兩個帝國的崩潰，是由於在位者人格特質、帝國內部因素，與面臨的外部因素交互影響所造成。俄羅斯帝國的尼古拉二世，是個堅持傳統道德觀的人，因此他認為下位者本來就應當服從上位者，而專制政權是自古以來就有的「美好道德」，所以不可能輕易接受民主思想；此外他虔誠信仰宗教，這使得他相當依賴自己的直覺，認為他做的決定就是上帝要他做的，就連人民反抗他也只認為是上帝給予的磨難；並且，尼古拉二世非常重視家庭，這使得比起官員，在政策決定中他更相信皇后亞歷山德拉，這些都是他無法適應變革的原因。中華帝國方面，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都是影響帝國崩潰的在位者。光緒皇帝自小受到慈禧的威嚇，但在成年後力圖反抗，因此有繼懦弱又倔強的性格，不過這也讓光緒有時候會不懼慈禧，陳述自己的意見；另外，光緒相當願意接受新事物，且不受傳統秩序束縛，因此他很願意接受戊戌變法的建議，並且也很願意放棄君權；光緒的眼光比起其他兩位，也都來的遠大，且較為理性，例如義和團之亂時，光緒自知中國不敵西方，勸阻勿向西方宣戰。至於慈禧太后，則是太以自我為中心，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並且其他人都要按自己的意思做事，不相信其他人；另外，也熱衷於追求權力，其中垂簾聽政就是最明顯的表現；最後，慈禧也是個相當迷

[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2。

信的人，除了忌諱相當多以外，也是她相信義和團實力的原因。可以發現，尼古拉二世和慈禧太后的性格，不利於改革的推行，也難以應付外部因素的變化。光緒皇帝或許能夠讓帝國免於崩潰，但由於其權力不夠大，且無力控制局勢，因此同樣無法推行改革。

關於內部因素，筆者以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四大面向做探討與比較。政治方面，俄國和中國的傳統政治制度都屬於專制的中央集權官僚制，皇帝都同時握有高度的權力，無法適應現代西化的需要，雖然兩國都有機會轉型成君主立憲的國家，然而兩國都未能成功改變；至於軍事方面，兩國在武器裝備上都落後於西方國家，且軍事未能現代化，其中俄國整體實力比中國強，但是在日俄戰爭中證明，其最重視的海軍也無法和維新後的日本抗衡；經濟方面，兩國都是農業為主的國家，在面對工業革命後的西方國家缺乏競爭能力，尤其俄羅斯帝國的農奴制度，誠如賀允宜評論：「它存在時，是維持俄羅斯政治、經濟、社會傳統的基石；十九世紀時被廢除，又成了各種動亂的主要因素。」[2]中華帝國的農民雖然是較為自由的一群，但是受到傳統思維，不利於推展工商業的發展；社會方面，俄國社會流動不頻繁，不同等級的人是處於不同的世界，無法了解彼此所需，中國則是宗法制的家庭觀、輕視工商業的傳統，以及知識份子僵化使得無法快速回應外來的變化，但中國事實上社會流動是比俄國自由許多的。

外部因素方面，本文著重在對外戰爭與思想衝擊兩個面向。將兩國比較後可以發現，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每次的對外戰爭，都對國內的經濟和社會層面帶來重大影響，甚至影響到政治層面。雖然克里米亞戰爭和鴉片戰爭並沒有為兩個帝國帶來政治動亂，但經濟和軍事力量確實受到創傷；而日俄戰爭和甲午戰爭，除了讓帝國有莫大的經濟損失外，還導致政治和社會不安的情形，並證實帝國的武力無力抵抗外國的攻擊；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八國聯軍，則更是重挫帝國原本的內部結構，不但經濟上無法維持人民基本生存，社會上也使人民家破人亡，

[2] 賀允宜，**俄國史**，頁 154。

加上帝國同時對多國戰爭，消耗不少原有的軍力，促使國內人民反抗運動成功，而帝國也隨之崩潰。至於外來思想方面，俄國和中國都可以粗略的劃分兩次思想衝擊，不過俄國在知識份子大量出現後，就開始傳入西方的思想，而中國一直要到鴉片戰爭之後，即 19 世紀中葉以後才開始大量接受外來的思想。但不論如何，兩個帝國會崩潰，與思想衝擊有著絕對的關係，若俄國和中國人民沒有接觸到外來思想，很可能只是替換一位元首和統治階級，實際上國家依然會是帝國專制型態的國家。換言之，導致俄羅斯和中華帝國崩潰的原因，不能只歸咎於內部因素，還需要外部因素的交織來產生。在這裡筆者和斯科克波的看法一致，斯科克波認為：

「法國、俄國和中國的社會革命，是因為有具體的政治危機，出現在國家舊有政權中的結構和情況下而產生。……而當國家舊有政權開始無法適應國際局勢帶來的挑戰時，革命危機就會發生。」[3]

不過必須承認，不論俄羅斯帝國或是中華帝國，在國家內部面臨外部衝擊時，在位者都有試圖做改革。首先，俄羅斯帝國方面，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算是較為成功的改革，例如在行政、司法、軍事、財政等議題都做了改革，歷史也多半給予正面的評價，然而最重要的農奴問題卻沒有真正解決；尼古拉二世時期的改革，則可以發現在位者並沒有真心地想要聽從人民的聲音改變，證明人民在專制的政體下只能依賴執政者的覺醒才能改變現狀，執政者只想握緊權力，是無法改革成功的；中華帝國方面，自強運動一開始被認為成功完成軍事改革，但甲午戰爭隨即證明自強運動的失敗；至於戊戌變法，雖然是希望做全面性的改革，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等多方面的議題，但和俄國一樣，受到執政者的阻礙而未能順利推展。可以說，帝國改革失敗，除了內、外因素外，亦可以歸咎於在位者的人

[3] Skocpol, Theda, *State &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7.

格特質。

總而言之，在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響下，加上帝國改革的失敗，導致兩國都引發人民群起反抗，最後使帝國崩潰。關於人民反抗的部分，俄國分別面臨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的二月革命，中國則分別在 19 世紀中葉面臨太平天國運動，在 1912 年面臨辛亥革命，最後導致兩國的滅亡。

回到研究的重心，本研究認為，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崩潰原因可以簡述如下：

一、俄羅斯帝國：經濟社會動盪，統治者主戰且改革無誠意

由於尼古拉二世的人格特質無法讓其改變專制，加上原本帝國內部政治上就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沙皇擁有一切權力，軍事實力上無法對抗西方，經濟受到農奴制的影響，也無法追上西歐國家，社會結構也不利於社會流動。在碰上外部因素的變化，如克里米亞戰爭、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都證明帝國內部無法適應外部因素。帝國雖然希望尋求改革卻也未能成功，亞歷山大二世的解放農奴運動失敗，可能與俄國內部結構有關，而尼古拉二世改革的失敗，是和其人格特質有關。此外，國內知識份子也從國外帶來思想衝擊，除了有自由的思想外，也開始有虛無主義、民粹主義和馬克斯主義的宣傳，在內部因素無法適應外部變化的情況下，國內經濟和社會動盪，人民要求改變體制卻無法得到回應，開始起身反抗帝國政權，最後使得帝國崩潰。

二、中華帝國：軍事經濟不如西方，戰爭失敗凸顯統治無能

光緒皇帝沒有足夠的權力，而慈禧太后的人格特質不利於專制政權的改變，以及帝國原本就存在內部因素，如政治上屬中央集權官僚制，皇帝擁有極大的權力，軍事上都是傳統兵器，沒辦法抵禦西方的船堅炮利，經濟上以農業立國，在遇到工業革命後的西方各國缺乏競爭力，加上鴉片貿易更使國內經濟空虛，社會上雖然階級流動較為容易，但受到傳統約束，工商業初期並沒有良好的發展。在碰上外部因素的變化時，如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都使帝國無力對抗

西方各國，並使國內經濟和社會動亂加劇。雖然帝國曾試圖改革，但自強運動並不注重制度問題，只重視軍事力量的發展，加上軍事改革也不夠全面，改革宣告失敗，而戊戌變法雖然試圖做全面性的改革，但受到慈禧的阻饒一樣宣告失敗。人民最後起身反抗帝國政權，在袁世凱的支持下，使得帝國同樣面臨崩潰。

至於兩國崩潰原因的異同，依照議題可區分為：

一、 在位者人格特質：

（一）尼古拉二世和慈禧太后：堅持專制思想，固執不聽建言

兩人都是堅持專制的道路，並且較為相信自己的直覺，不願聽從他人意見；然而尼古拉二世受到宗教影響，認為自己統治是種對人民的義務，而慈禧卻是因為熱衷權力，認為握有權力才有安全感。

（二）尼古拉二世和光緒皇帝：掌權者不願改變，欲改變者無實權

尼古拉二世和光緒的相同點是低的。尼古拉二世重視傳統道德，而光緒卻是不在意傳統價值；宗教上尼古拉二世相當虔誠信仰，然而光緒雖然接觸過西教，卻沒有真正信仰；最後，尼古拉二世重視家庭，但光緒大婚都是由慈禧決定，對家庭並不重視。但尼古拉二世擁有實權，光緒皇帝則處處受制於慈禧太后。

二、 內部因素：

（一）政治結構：權力集中於一人，機關能力有限

俄國和中國都是中央集權官僚制，和地方關係上也都是中央給地方高度自治權，再派人監督，行政權、司法權、監督權都有特定的機關負責；不過俄國的立法權屬於沙皇，國務會議擁有立法諮詢權，而中國立法和行政機關可說是重疊的；此外，俄國任命官員的方式，主要是從貴族或菁英中挑選，而中華帝國雖然有滿漢二元制，但基本上是透過科舉考試的方式來選出人才，比起俄國較為公平。

（二）軍事結構：缺乏經費改革，武器落後

俄國和中國都是以陸軍為主的國家，而武器裝備都落後於西方國家，這與兩國經濟問題有很大的關係；不過俄國比中國更注重海軍，而且武器裝備上還是比中華帝國優良；至於兵制上，俄國於 1874 年後，由募兵制改為徵兵制，中國則是分成使用族兵制和世兵制的八旗軍和使用募兵制的綠營軍，而以募兵制為主要來源。

（三）經濟結構：農業為主，工業落後

俄國和中國都是農業為主的大國，工業發展緩慢而落後；不過俄國主要是生產糧食作物，外銷也是以糧食作物為主，並且有農奴制所衍生的問題，中華帝國除了生產糧食作物外，也兼生產經濟作物，在西方人前來以前，是使用朝貢貿易體系，但在西方人來了之後，和俄國一樣進入國際市場，經濟限制上，俄羅斯的限制主要來自於農奴制，而中國的限制主要來自於傳統對工商業的限制政策，兩者都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

（四）社會結構：貴族擁有特權，農民貧窮無權

俄國和中國的社會結構相似度低。首先，俄國主要有貴族、僧侶、城市和農民四個等級，而中國主要是貴族、地主和仕紳，以及以農民為主的人民兩大階層；社會流動上，俄羅斯的流動較小且困難，中國的社會流動大且較為容易；家庭結構中，俄國是小型家庭為主，中國是宗法制家庭為主；地區流動上，中國的流動較為俄國容易；宗教上，俄國主要信奉東正教，宗教單一，中國宗教較為多元，以道教、佛教和民間信仰為主。

三、 外部因素：

（一）對外戰爭：戰爭失利，凸顯問題

克里米亞戰爭和鴉片戰爭，雖然都帶給兩個帝國經濟和軍事上的損傷，但並沒有危及政權，不過克里米亞戰爭的起因是俄國想要進行領土擴張，而中國則是貿易問題；日俄戰爭和甲午戰爭，兩國都是對日本作戰，並

且都戰爭失利，引起國內經濟和社會動亂，促使帝國改革，不過俄國和日本爆發戰爭是因為朝鮮和中國東北利益的問題，而中國和日本的戰爭是因為想維護在朝鮮宗主國地位的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八國聯軍，都是同時對抗多國的戰爭，對兩國的經濟和社會都造成更大的動亂，促使兩國革命的發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國確實有力量能夠和西方抗衡，而中國缺乏實力對抗西方，並且中央和地方是分離的狀態。

（二）思想衝擊：民主自由思想傳入，動搖傳統政權合法性

雖然俄國和中國都有自西方傳入許多思想，然而卻有許多差異。首先，初次思想衝擊上，俄國的知識份子階級形成不久，主動留學西歐，帶回來許多自由的思想，而中國的知識份子由於形成已久，加上較為封閉，難以接受太多西方的思想，只認同西方的科技和器物；19 世紀中葉後，俄國知識份子帶來更多元的思想，如虛無主義、民粹主義和馬克斯主義等，而中國此時帶入的是民族、民主和自由等人權思想。這些思潮都撼動了帝國政權的正當性。

四、　帝國改革：

（一）亞歷山大二世改革與自強運動：主要改革內容皆失敗

兩個改革都是受到戰爭失敗而發起，亞歷山大二世改革是以農業改革為主，其餘改革為輔，自強運動則是以軍事改革為主，但其主要改革都是失敗結束。

（二）尼古拉二世改革與戊戌變法：統治者改革無誠意

一樣也是受到戰爭失敗而發起，尼古拉二世的改革主要以立法和人權改革為主，戊戌變法則是全面性的制度改革，但都因為執政者的問題而使改革終止。

五、　人民反抗：

（一）1905 年革命與太平天國：經濟問題引起社會動亂

兩個人民反抗的最大共同點是國內經濟問題所造成。然而，1905 年的革命較為分散且規模較小，主要是透過暗殺的方式達成，雖然對帝國有造成政局的威脅，但不至於讓帝國崩潰；太平天國規模則相對較大，且一度威脅到帝國的存亡，透過宗教的號召，建立一支有系統的軍隊。不過，1905 年的革命就已經有受到當時思想衝擊的影響，而太平天國只有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實際上還是追求成立一個新的帝國政權。

（二）二月革命與辛亥革命：規模龐大，以民主為號召

此二次反抗活動背景都是因為國內經濟和社會出現嚴重動亂，反抗規模都較以往來的大，並且都以追求民主為號召。不同的是，二月革命還訴求立即停止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辛亥革命還有民族主義的訴求，此外，二月革命是除了人民以外，統治階級也有許多人希望沙皇退位，然而辛亥革命統治階級還是希望能夠維護政權，是因為握有重要兵權的袁世凱最後決定支持革命黨，才迫使皇帝退位。不過兩個反抗運動確實都是造成帝國崩潰的主要原因。

然而，由於本研究的議題和研究限制，本文關於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在位者人格特質，僅能分析與帝國崩潰最有關係的在位者，事實上，其他時期的在位者亦有其重要性。若將兩國歷代的在位者全部比較，可以發現尼古拉二世雖然有不利於維護帝國的特質，但並非是最無能和最不愛護人民的沙皇；同樣的，光緒和慈禧也是有所作為的在位者，他們都嘗試用不同方式讓帝國抵抗外來的變化，只是上述的因素綜合起來而未能成功。換言之，若他們所處的時局，外部因素沒有大變化，很可能他們都是可以順利治理國家的人物。此外，本研究所說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只針對筆者認為最關鍵的因素做討論，實際上內部因素還可擴及到文化、教育、地方差異、地形氣候、自然資源……等諸多議題，外部因素同樣也至少可以再深入探討國際情勢、區域關係等議題。另外，在探討人民反抗活動和革命議題時，革命政黨和革命團體也是相當值得重視和注意的議題。不過本

研究為了避免研究之問題失焦，也希望用宏觀的觀點來觀察俄國和中國的崩潰原因，因此僅能針對筆者認為最為關鍵的因素做討論。上述的議題還有待於後續研究做延伸及補充，可作為此議題之後的研究方向。

此外，本研究由於僅研究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崩潰原因，而事實上卻也是有帝國轉型成功的國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時間段相近的日本帝國，實際上應該還有其他可以比較的國家。但礙於時間有限，筆者無法將其他國家一併分析、比較，日後若有對此議題有興趣者，亦可以嘗試將其他國家納入比較之中，相信會使歷史比較研究的領域更加寬廣，為研究帶來更多的貢獻。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參考書目

一、中文：

專書：

王日根，**光緒 VS 明治天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

李齊芳，**中俄關係史**（台北：聯經，2000 年）。

李邁先，**俄國史（上卷）**（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

吳春秋，**俄國軍事史略**（北京：知識出版社，1983 年）。

吳浩然，**慈禧的政治學**（台北：國家圖書館，2007 年）。

吳湘湘，**俄帝侵略中國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76 年）。

林宇杰，**光緒帝**（台北：名田文化，2005 年）。

金易、沈義羚，**我在慈禧身邊的日子**（台北：智庫，2001 年）。

周雪舫，**俄羅斯史**（台北：三民書局，2007 年）。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年）。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台北：遠流，1998 年）。

崔丕，**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吉林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 年）。

郭武平，**俄羅斯的政黨政治**（台北：五南，1999）。

賀允宜，**俄國史**（台北：三民書局，2004 年）。

廖代茂、楊會國 編著，**中華百年祭：經濟**（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 年）。

劉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國現代化研究(1861-191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鍾倫納，**應用社會科學研究法**（香港：商務，1992 年）。

戴逸、張世明 著，**18 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軍事卷**（北京：遼海出版社，1999 年）。

譯本：

Alan C. Isaak 著，朱堅章 主譯，**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台北：幼獅文化，1990年）。

Anatole Leroy-Beaulieu 編，劉增泉 譯，**帝俄和俄羅斯**（台北：國立編譯館，2000 年）。

大衛・麥肯齊、麥克爾・科倫 著，蔡百銓 譯，**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 年）。

艾瑞克・霍布斯邦 著，賈士蘅 譯，**帝國的年代：1875-1914**（台北：麥田出版，1997 年）。

哈特穆特・凱博 著，趙進中 譯，**歷史比較研究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理查・馬里厄斯、梅爾文・佩吉 著，黃煜文 譯，**如何寫歷史**（台北：五南，2010 年）。

斯科克波 著，劉北成 譯，**國家與社會革命**（台北：桂冠，1998 年）。

摩爾 著，拓夫 譯，**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台北：桂冠，1991 年）。

德齡 撰，秦瘦鷗 譯，**瀛台泣血記**（香港：百新書店，1954 年）。

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米羅諾夫 著，張廣翔 等譯，**俄國社會史（上卷）：個性、民主家庭、公民社會及法制國家的形成（帝俄時期：18 世紀至 20 世紀初）**（北京：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年）。

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米羅諾夫 著，張廣翔 等譯，**俄國社會史（下卷）：個性、民主家庭、公民社會及法制國家的形成（帝俄時期：18 世紀至 20 世紀初）**（北京：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年）。

韓書瑞、羅友枝 著，陳仲丹 譯，**十八世紀中國社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期刊論文：

王兆徽，「民粹主義的形成與演變：十九世紀後半俄國社會運動評述」，**東方學報**，第 2 期（1978 年），頁 1-7。

李齊芳，「夙命天譴的俄國大革命」，**當代**，第 43 期（1989 年），頁 98-110。

段昌國，「社會分解下的沙皇王權與政治參與：1861-1905」，**空大人文學報**，第 9 期（2000 年），頁 113-130。

張建華，「俄國近代政治恐怖主義的源流」，**史學月刊**，第 1 期（2007 年），頁 90-97。

葉林生，「論光緒」，**社會科學**，第 3 期（1981 年），頁 60-70。

趙士國、劉自強，「中俄兩國早期工業化道路比較」，**史學月刊**，第 8 期（2005 年），頁 111-117。

學位論文：

陳仁勇，「慈禧太后與晚清改革」，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年）。

陶維達，「清季洋務運動的改革思潮（1861-1894）與越南改革思潮（1863-1895）之比較」，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

鄭仲烜，「清朝皇子教育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賴盈如，「翁同龢對光緒皇帝之教育」，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蕭文煜，「恐怖主義與晚期俄羅斯帝國民粹派革命運動之研究(1861-1917)」，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網路資料：

「康有為」，**中文百科在線**，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lid=128285>（2013 年 10 月 19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日）。

「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1871-1908)」，**清朝紀真**，

<http://ns100.newsbook.net/~yiuyeeling/page05.htm> （2013 年 10 月 19 日）。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二、英文：

專書：

Anderson, Maureen, Anne Low, and Ian Keese, *Retrospective Year 11 Modern History,* (Australia: Jacaranda, 2007).

Ascher, Abraham, *The Revolution of 1905* (United Sta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Black, Cyril E., *The Transforming of Russia Society* (United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Blum, Jerome,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ted Sta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Kahah, Arcadius, *Russian Economic Histor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ted Stat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9).

Mackenzie, David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United States: Wadsworth, 1993).

Perkins, David 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United State: Transaction, 2013).

Robinson, Geroid T.,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A History of the Landlord-Peasant World and a Prologue to the Peasant Revolution of 1917* (United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

Skocpol, Theda, *State &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Steinberg, Mark D. & Vladimir M. Khrustalev, *The Fall of the Romanovs: Political Dreams and Personal Struggles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United St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Tomaszewski, Fiona K., *A Great Russia: Russia and the Triple Entente, 1905-1914*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United State: Praeger, 2002).

Tompkins, Stuart Ramsay,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Mak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United Stat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7).

書籍中論文：

Fuller, William C., Jr., "The imperial army," in 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Ⅱ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530-553.

Hagen, Mark von, “The Limit of Reform: The Multiethnic Imperial Army Confronts Nationalism, 1874-1917,” In David S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 & Bruce W. Menning ed., *Reforming the Tsar’s Army: Military Innovation in Imperial Russia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Revolution*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34-55.

Treadgold, Donald W., “Russian Radical Thought, 1894-1917,” in Theofanis George Stavrou ed., *Russia under the Last Tsar* (United Stat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1), pp.69-86.

Zelnik, Reginald E., “The Peasant and the Factory,” in Wayne S. Vuchinich ed., *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United Sta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58-190.

網路資料：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Turns 175 (Picture of the Day),” *Britannica,* <http://www.britannica.com/blogs/2010/11/the-empress-dowager-cixi-turns-175-picture-of-the-da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nglish Online,*

<http://www.english-online.at/history/russian-revolution/russian-revolution-and-civil-war.htm> (19/10/2013)

Dennison, Tracy & Steven Nafziger, “Micro-Perspectives on 19th-century Russian Living Standards,” *Economics at Williams College,* < http://web.williams.edu/Economics/wp/nafzigerMicroLivingStandards_WilliamsWorkingPaper_Nov2007.pdf> (29/8/2013).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三、俄文：

專書：

Баха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Николай II,* (Москва: АСТ-ПРЕСС, 2000).

Николю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Москва: Интелвак, 2001).

Павлов, Дмит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секретные операции на суше и на море* (Москва: Материк, 2004).

期刊論文：

Милюков,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Февраль 1917-го: крах монархии,»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Номер 2 (2007), стр. 171-183.**

電子書：

Тарле, Евген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 Книга на сайте: <http://bookmate.com/r#d=Tb9AKIkz>,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50).

Хрусталев, 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Романовы.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Вели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Книга на сайте: < http://bookmate.com/r#d=iqCz99Z5>, (Litres, 2013).

Радзинский, Эдвард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Цари. Романовы. История династии,* Книга на сайте: <http://www.e-reading.biz/bookreader.php/1022070/Radzinskiy_-_Cari._Romanovy._Istoriya_dinastii.html#label349>, (Litres, 2013).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網路資料：

«АЛЕКСАНДР II НИКОЛАЕВИЧ,»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http://www.pravenc.ru/text/АЛЕКСАНДР%20II%20НИКОЛАЕВИЧ.html> (19/10/2013).

«Витте 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Академик,* <http://dic.academic.ru/dic.nsf/es/11108/Витте> (19/10/2013).

«Гуч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Мо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http://www.ros-istor.ru/node/154>, (20/7/2013).

«Столыпин, 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Академик,* <http://dic.academic.ru/dic.nsf/ruwiki/1689>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Академик,* <http://dic.academic.ru/dic.nsf/enc_philosophy/937/ПЛЕХАНОВ> (17/7/2013).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Российский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портал,* <http://museum.edu.ru/catalog.asp?cat_ob_no=12615&ob_no=12774> (17/7/2013).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